

中外研究叢書
國與革命



E. W. Pi

1929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
仲文遺贈
國立北平圖書館

國
家
與
革
命

N. Lenin 原著
中外研究學會翻譯

上海中外研究學會印行

國家與革命

目次

著者的聲明

序言

第一章 階級社會與國家

第一節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第二節 特殊的武裝隊伍和監獄等等

第三節 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

第四節 國家的衰亡與暴力革命

第二章 國家與革命——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的經驗

第一節 革命之前夜

國家與革命 目次

571.1
347-3
(454)

26463

國家與革命 目次

第二節 革命的總結

第三節 一八五二年馬克思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

第二章 國家與革命·巴黎公社的經驗

第一節 公社社員的偉大在什麼地方？

第二節 拿什麼來代替一旦被破毀了的國家機關？

第三節 議會主義的消滅

第四節 國民統一的組織

第五節 寄生虫式的國家之破壞

第四章 恩格爾斯補充的說明

第一節 「居住問題」

第二節 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第三節 給塔培爾的信

第四節 愛爾福特綱領草案的批評

第五節 一八九一年爲馬克思著的「法國內戰」一書而作的序言

第六節 恩格爾斯對於廢止德謨克拉西的見解

第五章 國家衰亡之經濟基礎

第一節 馬克思對於本問題的提出方法

第二節 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

第三節 共產社會的初期形態

第四節 共產社會的最高形態

第六章 被機會主義者所糟蹋的馬克思主義

第一節 樸列哈諾夫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第二節 攷茨基與機會主義者的論戰

第三節 攷茨基和班納科克的辯論

國家與革命 目次

國家與革命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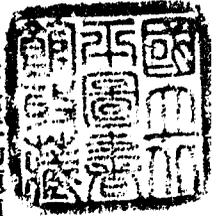
著者的聲明

這本小冊子是在一九一七年九月間寫好的。我當時還預備好了第七章的題目，即「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經驗」，但是，因為被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的政治危機所「妨礙」，我簡直一行字也沒有寫過。這個「妨礙」實在是一件值得快活的事，這章的出版自然要遲得多；然而與其作文章來論革命的經驗，不如實地做「革命的經驗」更爲有益。

著者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於彼得格勒

著者的聲明



序言

國家這個問題，在現時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的政治關係上，都含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帝國主義戰爭加速而且增強了由壟斷的資本主義，變為國家的壟斷資本主義的過程。與有無上威權的資本家的集團日益密切相聯合着的國家，其所加諸勞動羣衆的異常嚴重的壓迫，現在也日益嚴重起來了。那些先進的國家——我們這裏是指着牠們的「後方」說的——都變成工人們的軍事徒刑的監獄了。

延長的戰爭造成了空前未聞的災難和恐怖，使民衆的地位困苦得忍無可忍，同時民衆的騷擾也就變本加厲了。很明顯的，國際的無產階級革命已在長成起來，牠對於國家的關係這個問題，已成爲有重要的實際意義的問題了。

在這幾十年比較和平發展的時期中所積成的機會主義分子，在全世界許多合法的社會黨裏面，造成了社會愛國主義派的統治潮流。這個潮流當中的角色，在俄國的

有：樸列哈諾夫 (Pechanov) 巴脫萊沙夫 (Potresoff) 勃萊雪哥夫斯卡 (Breshkovskaya) 路彭諾維契 (Rubanovich) 以及外觀上比較不明顯的如：采雷太爾 (Tseretelli) 威爾諾夫 (Tchernoff) 以及他們的同儕等等一類人；在德國的有：謝得曼 (Shedemanz) 李謹 (Lesien) 達微特 (David) 諸人；在法國和比利時有：列拿特爾 (Renandel) 黑特 (Guesde) 萬台威爾 (Vandervelde)；在英國有：辛特曼 (Hyndman) 和費邊社 (Fabians) 一派人等等；這一類人都是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行為上實在都是社會愛國主義者。這一批「社會主義領袖們」的特點，是在他們不僅對於「自己的」民族資產階級之利益，而且對於「自己的」國家之利益都表示卑躬屈節的適應。因為大多數所謂大的列強，已經把無數的弱小民族剝削並奴役得好久好久了。帝國主義戰爭無非就是分割和重分這一種贓物的戰爭。從一般的資產階級，特別是從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壓迫之下以謀勞動羣衆之解放的鬥爭，如果沒有對機會主義者所持關於「國家」的偏見作激烈鬥爭，便不會成功。

國家與革命

四

首先我們要研究馬克思和恩格爾斯對於「國家」的學說，特別要充分講到這種學說之被機會主義者所忘却了和曲解了的部分。其次我們再要特別的來研究曲解馬克思學說的主要的代表致茨基——在今番世界大戰中政治主張上完全破產的第二國際（從一八八九年至一九一四年）最著名的首領致茨基。最後我還要講到俄國一九〇五年，特別是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經驗中之最主要的教訓。

這後一次的革命，很明白的，現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初間）牠的第一個階段正在結束了；可是一般的講來，整個的這次革命，祇可視為由帝國主義戰爭所引起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鏈條中之一環而已。因此，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對於「國家」的關係問題，不僅是含有實際的政治意義，而且因為這個問題，是向民衆說明在最近的將來，他們應該怎樣謀自己從資本的奴役之下的解放，所以牠又含有爲目前十分迫切所需要的一種意義。

著者 一九一七年八月

國家與革命

馬克思對於國家的學說與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務

第一章 階級社會與國家

第一節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馬克思學說之在今日，正與歷史上數見不鮮的被壓迫階級解放運動的領袖們，和革命思想家們的學說一樣，遭遇到相同的命運。大革命家常常舉生受着壓迫階級的虐待；他們的學說常常引起了壓迫階級切骨的痛恨，極端的仇視和瘋狂似的造謠與中傷。可是當他們死了之後，却又常常把他們奉爲無傷害的偶像，頌揚他們，並且在他們名字之上授以光榮的聖圈，來「安慰」被壓迫階級；實際上便是刪去了和貶降了他們的革命理論的本質，磨滅了他們銳利的革命的鋒銜，以欺騙被壓迫階級的羣衆。

現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者，在「製造」馬克思主義的工作中，是一致合作的。他們非特忘記了，而且拋棄了並曲解了馬克思主義之革命的面目，和革命的本質。他們第一步的行動，就來頌揚那資產階級所能接受，或認為可以接受的部份。所有的社會愛國派，現時都變成「馬克思主義」者了（這並不是笑話呀）。資產階級的學者昨天還是破壞馬克思主義的專家，今天却漸漸談論起「德意志民族」的馬克思來了。在他們以為這個馬克思訓育好了組織很完美的工人階級，去參加規掠式的戰爭。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既然馬克思主義之被曲解蔓延到了聞所未聞的地步，此時我們第一個任務，便是恢復馬克思關於「國家」的理論之真相。因此，我們便不能在馬克思和恩格爾斯的著作中盡量地摘取很多的文句來做證明。自然，過於冗長的摘錄對於行文上不免累贅，而且也難於通俗，但是這種摘錄，終究是不能免的。馬克思和恩格爾斯的著作中，論及國家問題的全部分（或最重要的部分）必須盡可能的充

分摘錄出來，以便讀者對於科學社會主義之創造者的理論及其發展，得到一個獨立完整的概念。同時，我們更得黑白分明地，證明現時佔優勢的攷茨基派對馬克思和恩格爾斯學說之種種曲解，而使之一目了然。

我們現在先從恩格爾斯著作中傳播最廣的「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一書開始引證罷。這部書的第六版是一八九四年在雪都脫加爾（Duffield）出版的。

恩格爾斯在歷史分析的撮要中這樣說：

「所以國家絕不是從社會外加于社會的一個強力，也絕不是如黑智兒所肯定的「道德思想之實質」，「理性之外形和實質」，牠是社會發展到了某個階段時的產物；牠是社會到了本身有不可解決的矛盾，和不可調和的衝突而又無法擺脫時的體現。而且爲使這種矛盾，使這些經濟利益衝突的各階級不致相互破滅，爲使社會不致破壞於沒出息的鬥爭當中，於是一種表面上似乎站在社會之上而實際則用以緩和衝突，而使這些衝突不致超出「秩序」範圍之外的力量，就成爲必

須了。這個由社會產生而超出於社會之上且逐漸與社會脫離的一種力量，便是「國家」』（德文第六版一一七至一一八頁）

這一段話已經把馬克思主義對於國家之意義及其歷史的任務之基本觀念，很明切地描寫出來了。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國家的出現，是以階級矛盾在客觀上的不可調和性為斷的；何時何地有這種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同時同地便有國家，這種階級矛盾之不可調和性的程度有多高，則國家發展的程度亦有多大。

反之，國家之存在就證明了階級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

對馬克思主義之種種曲解和修改，却正在這個最重要的基本觀點上發生的；這種曲解和修改，有兩條主要的路線：第一，資產階級尤其是小資產階級的學者，因為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逼得他們不得不承認，國家祇是在有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那些地方才會出現，他們因此就來「修正」馬克思的理論，說國家是調和各階級衝突的機關。但是就馬克思的意思來說，如果階級調和是可能的，則國家既不會發生，亦不

能存在。而俗學的資產階級的大學教授和一般政治家（他們還往往摘引馬克思的著作來做參攷呢），則以為馬克思的意思是說：國家就是階級調和的工具。就馬克思的意思說，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別一個階級的統治機關。牠的目的，是在「秩序」的建立，而這個秩序是要使這種壓迫成為合法，並且使牠鞏固起來，同時即以緩和階級間的衝突。反之，小資產階級政客們的意見，以為建立「秩序」就是調和階級間的衝突，而不是一個階級對另一階級之壓迫。所謂緩和階級間的衝突，在他們的意思以為就是調和，而不是消除被壓迫者反對壓迫者的鬥爭方法。比方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中，關於國家之真義及其作用這個問題，已經很嚴重的發生，而且認為羣衆直接行動的實際問題時，所有社會革命黨人和少數派都一齊墮落到資產階級所謂「國家」是階級調和的機關的理論上去了。

這兩派政客們的無數決議和論文中，都為這種純資產階級性的簡陋的階級調和理論所滲透了。國家是一個階級的統治機關，而且不能和牠的對抗階級調和的機關，

這一點是那些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黨人所永不會了解的。從他們對於「國家」的認識上看來，正可以很明顯的證明社會革命黨人和少數派絕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這是我們多數派常常指明的），而是名義上近乎社會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

在另一方面，攷茨基派之修正馬克思主義，比較更爲巧妙了。在理論上他們並不否認國家是一階級的統治機關，也不否認階級矛盾之不可調和性。但是他們忘記了或抹煞了下面的話：如果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如果牠是站在社會之上而逐漸與社會脫離的一個力量，那末，很明顯的，被壓迫階級之解放，不但非有暴力革命，而且非把統治階級所設立而使國家與社會分離的政府機關破壞，是不可能的。這一種結論，在理論本身上，已十分明白，這是馬克思從革命問題之具體的歷史的分析上所下的一種論斷，是我們在下面要很確切來研究的。而攷茨基所「忘記」了和修改了的（我們以後還有詳盡的說明），也正是這個結論。

第二節 特殊的武裝隊伍和監獄等等

恩格爾斯繼續說：

「國家與古時宗法社會（部落社會或氏族社會）的組織之不同點，第一便在牠是依照地域來區分其治下之庶民的。」

這樣的一種區分，我們看來似乎是很「自然的」，可是牠之發生却曾對宗法社會部落社會的舊組織有過了長期的爭鬥。

「國家的第二個特徵，便在牠是一種公共權力的建立，而這個權力是組織成爲一種武裝力量，並且這權力和民衆本身，不會是一個東西的。這個特殊的公共權力是必須的，因爲自從社會分裂成階級之後，民衆自動的武裝組織，已經成爲不可能的事了。這個公共權力是在每一個國家裏都存在着。牠不僅包含着武裝的人，而且還有物質上附帶的設施，如監獄以及其他種種壓迫人的設施。這些都是宗法社會部落社會所沒有的。」

恩格爾斯闡明了命名爲國家的那個「力量」——由社會產生出來，超出於社會之

第一章 階級社會與國家

上而又逐漸與社會脫離的一種力量——之概念。這個力量大部分所包含的是什麼呢？牠包含特別的武裝隊伍，在這個武裝隊伍的人們之下，有監獄等等組織是受他們指揮的。

我們有權可以說那是『特別的』武裝隊伍，因為每一個國家所特有的公共權力，是與武裝人民『並不直接相符合』的，也就是說與人民『自動的武裝組織』並不相符合的。

恩格爾斯正像其他一切革命思想家一樣，盡力的引起一般有階級覺悟的工人們，來對於一般流行的俗學之輩所認為最不值得注意，最平凡，而為人們堅固的（或者可以說是化石似的）偏見所虔奉為神聖的那個事實，加以注意。常備軍和警察是政府力量之主要工具；但是，除了把這種力量當作主要工具之外，還有什麼別的方法呢？

在十九世紀末年，大多數歐洲人的眼目中看來（這班人是恩格爾斯會經常常向之

講解的，他們在這個時期當中從來沒有經過，也沒有親眼看過一次偉大的革命，是眞以爲除了上述的工具之外便不能再有別的方法了。他們根本不會了解「人民自動的武裝組織」是怎麼一回事。

西歐和俄國的學究先生們，對於「超出於社會之上而與社會脫離的特別的武裝隊伍（警察和常備軍）之組織的必要，是從何而發生的？」這個問題，要想借斯賓塞或米哈羅夫斯基的什麼「社會生活之複雜」，什麼「社會職能之分工」一類的話，來答覆牠。

這樣的說法似乎是「科學」的，而且很有效地迷惑了一般常人的知覺，掩蔽了最重

要的基本事實——社會分裂成爲不可調和的敵對階級這一個基本事實。

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個分裂，「人民自動的武裝組織」固然在其組織的複雜程度上，在其高度的技術程度上，可以同那種僅僅以木棍爲武器的猿猴隊伍之原始組織，或同那種原始人類聯合起來組織的氏族社會有所區別，但是這樣的組織（即人民自動的

武裝組織——譯者）已成爲不可能的了。

這樣的組織之所以成爲不可能，是因爲社會到了文明時代，牠已分裂成爲敵對的，而且是不可調和的敵對階級了。這種階級之『自動』的武裝，便會引起牠們之間的互相的武裝鬥爭來，因此國家這個組織就此產生了，寓形於特殊的武裝隊伍的一種特殊力量也就此造成了；同時，每一次破壞國家機器的革命，始終表現給我們看：統治階級之如何企圖恢復爲牠御用的特殊的武裝隊伍，被壓迫階級之如何努力以圖創造一個性質相類似的新組織——一個不是爲剝削階級，而是爲被剝削階級所御用的新組織——等等的情形。

恩格爾斯在上面的一段議論中，已經從理論上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就是：『特殊的武裝隊伍』與『人民自動的武裝組織』之間的關係問題；每次大革命終于把這個問題很實際的，很明顯的，而且以羣衆行動大規模的形式，映進了我們的眼簾。我們以後將看見這個問題在歐洲和俄國革命之經驗中是怎樣具體地表演出來。

但是我們現在且再把恩格爾斯的話來研究一下。

他指示着說，有些地方（譬如在北美有好多處是這樣）這個公共權力是薄弱的（他這裏所講的祇是關於資本主義社會之幾個少數例外，和北美洲幾處地方在帝國主義的前期時代的情形，那些地方是被自由的移民統治着的），但是一般的講來，這個權力終是日趨強固起來的：——

「……上面所述及的公共權力，是隨着國家中的階級矛盾之劇烈，隨着鄰近國家之長大與其人口之增多，而強固起來的。我們只須把現在的歐洲拿來觀察一下，就看到階級鬥爭和階級間互相爭優勝的競爭，把那個公共權力增長到了極高的程度，以至於牠竟赫赫然有鯨吞全社會甚至鯨吞國家自身的危險了……」

這一段文字還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時候寫的，是一八九一年六月十六日恩格爾斯所作的一篇最後的序言。此時資本主義轉變到帝國主義——托辣斯之全力統治，鉅大銀行之至高威權，以及大規模的殖民地政策之實現等等——還祇是初在法

爾西開始起來；而在北美和德意志，牠的力量甚至還要薄弱一點。從那時起，所謂「爭優勝的競爭」便有了長足的進步，特別是最後到了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之初，全世界乃被那些「競爭中之優勝者」——巨大的掠奪者的幾個強國——所分割了。從此海陸軍備便可怖的擴大起來；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爲了英德兩國之互爭世界霸權和瓜分贖物的強盜戰爭，致使全社會所有的力量幾乎全部被掠奪無厭的國家權力所「吞沒」，並引起了全社會的奇災大禍。

恩格爾斯一八九一年時，就能夠指出「爭優勝的競爭」是數大列強之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可是到了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當這種競爭業經多次加劇而產生了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那班社會愛國派的鄙漢們，就利用「保護祖國」，「保護共和國和革命」等等一類的鬼話，來遮掩他們祖護「自己的」資產階級之掠奪的利益了！

第三節 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

爲要保持一種超出於社會之上的特殊的公共力量，賦稅和國債便成爲必需了。

關於這一點，恩格爾斯曾經這樣寫着：

「官吏們掌握了公共的權力和徵稅權，他們便形成了駕乎社會之上的一種社會機關。從前人們對於部落社會（氏族社會）的社會機關的那種自由自願的敬意，在現在的一般官吏們看來，已經是不夠的了，就假定他們能夠獲得這種自願的敬意的話。」

對於官吏之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也經訂立起來了。「區區」一個起碼的小警察員，他的「威權」要大過一個氏族社會的代表，可是假使一個文明國家的軍事首領，一見了氏族社會的族長所享受的那種「自然的，並不因威迫而發出來的社會的敬意」，他就將發生妬嫉的心理了。

這裏所講的問題是關於官吏們的特權地位，形成了國家政權的機關。現在值得注意的根本問題是：什麼使他們能夠超駕於社會之上呢？我們讀到下面，就會知一

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怎樣在實際上解決了這個理論問題，而一九一二年致茨基又怎樣反動的來抹煞這一個問題。

「……既然國家是由於控制階級矛盾之必需而發生，既然同時牠的產生又是這些階級間之衝突的結果，則就一般的道理講來，牠便是最強有力的，經濟上居於統治地位的那個階級的國家。這個在經濟上居於統治地位的階級，借助於國家的力量，因而在政治上也變成統治階級了，並且，藉此獲得了壓迫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方法。」

不僅古代的國家和封建國家是一種對於奴隸和農奴的剝削機關，就是：

「現代代議制的國家也不過是以資本來剝削雇用勞動的」一種工具而已。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我們每每遇到這樣的情形：當兩個鬥爭的階級在力量上雙方達到了平衡程度的時候，那時國家的政權對於這兩個階級，暫時的成爲一種相當的獨立機關，而且還當着這兩階級間的仲裁人了。……」

這種情形，可以舉十七和十八世紀的君主專制政體爲例，如法國的第一帝國和第三帝國時代的拿破崙主義，和德國俾斯麥當權的時代，都是這樣。

我們還可以說，這樣的情形，也就是現在俄羅斯共和國和克倫斯基政府。當克倫斯基政府已經開始迫害革命的無產階級之後，曾經有一段時間，蘇維埃因小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派之領導，已經變成沒有力量，而資產階級却也還沒有充分的力最能夠來解散蘇維埃。

恩格爾斯再繼續着說：

「在一個德謨克拉西的共和國裏面，財富可以間接的運用權力，而惟其是間接的，却更能夠發生力量，因爲第一可以藉官吏的直接賄賂的方法（例如美國）；第二可以藉政府與證券交易所之間的聯盟的方法，來施行其權力（如美國與法國）。」

到了現在，帝國主義和銀行的統治，已經在所有德謨克拉西的共和國中，十二分

巧妙的把這兩種方法發展了出來，以維護並實施這種財富萬能的方法了。舉例來說，譬如在俄羅斯民主共和國創立的頭幾個月當中，也可以說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少數派與資產階級結婚的「蜜月」期間，在聯合政府中巴爾欽斯基先生(M. Palchinski)對於一切約束資本家和防止資本家之掠奪行為，以及禁阻劫掠用於軍需的公庫等等行為的種種方法，都實行怠工：到了他退出內閣以後（自然用另一個完全與巴爾欽斯基相同的來代替的），巴爾欽斯基先生就從資本家方面獲得每年十二萬盧布乾傭的小「位置」以爲「謝禮」，試問這是什麼一種意義呢？直接的賄賂呢還是間接的？是政府同新提議的資本家們的聯盟呢，抑「僅僅」是一種友誼關係？威爾諾夫(Toleynoff)采雷太爾(Tseretelli)與奧克遜切夫(Avksentief)斯可比賴夫(Skobolef)——輩人的作用究竟怎樣？他們是那些劫掠公庫的百萬豪富的大資本家之直接同盟，抑僅僅是間接的呢？

可知「財富」萬能，在德謨克拉西的共和國中是更爲「鞏固」，因爲牠與資本主

義之惡劣的政治外形是沒有關係的。德謨克拉西的共和政治是對於資本主義最有利的一種政治形式，所以一旦資產階級握住了（全仗巴爾欽斯基，威爾諾夫，采爾太爾以及其他等輩的力量）這一種最有利的政治形式，牠就很穩固，很堅實地創設牠自己的政權，無論何種人物的更迭，以及機關或政黨的變換，都不足以動搖這個政權的。我們還應該注意到恩格爾斯十分肯定地稱普選權為資產階級統治的一種工具。

他說（很明顯的是從德國社會民主黨之長久經驗中所得的結論），普選權是「工人階級成熟之三個標誌」。牠在現代的國家中，不能而且將永遠不會再多給予一點別的標誌。

小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派，如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少數派，以及他們的同胞弟兄們——西歐的社會愛國派和機會主義者，他們對於這一種普選權都抱有「莫大」的希望。他們自己這樣想望，而且把一種錯誤的觀念——以為普選權在「現代的國家中」實在能夠代表大多數勞動羣衆的意志，而且能夠擔保實現這種意志的一種錯誤

觀念——灌輸到一般民衆的心坎當中去。

我們在這裏只能指出這一個錯誤觀念。而且只能指出來，使讀者注意到恩格爾斯這一種十分明顯確實和具體的申說，被那些「合法的」（就是機會主義的）社會黨在他們每一次的宣傳和煽動中都把它來曲解了。以後我們還要借用馬克思和恩格爾斯關於「現代國家」的意見，來對這一個觀念——被恩格爾斯輕輕駁斥掉的這一個觀念——之種種錯誤，加以更精細更詳盡的說明。

恩格爾斯在他最有名的一篇著作中，把他自己的意見做了一個簡要的結論，其詞如下：

「這樣說來，可知國家不是向來就存在的。從前有好些社會，確是沒有國家的。在這種社會裏簡直連「國家」和「國家的政權」這種觀念都是絕對沒有的。在經濟發展到了某一個階段的時候，在這種經濟的發展自然而然而使社會分裂成爲階級的時候，國家就因這一個分裂而成爲必要了。我們現在正在快步的

行近到一個生產發展之新階段上來了；在這個新階段上，那種階級不僅沒有再存在的必要，而且還成爲生產的直接障礙了。階級在將來之必歸於消滅，正與牠在過去之發生，一樣是不可避免的事。階級一經消滅，則國家也必然地隨之而消亡了。在一切生產者自由平等的結合的基礎之上，來重新組織生產的時候，社會便要把整個的國家機關擲到最適宜於牠的地方去——就是要把牠拋擲到古物陳列館中去，與那紡織車，黃銅斧一類的古董一塊陳列起來。」

這一段文字在現代社會民主派的宣傳作品當中是很難得遇到的，就使有時引用了這一段文字，他們也往往只是把它奉爲偶像一般的在它面前叩頭，就是說，他們僅僅是對恩格爾斯個人表示一種崇敬，而絕對不會去思索一思索到底所謂「把整個的國家機關拋擲到古物陳列館中去」這一句話的革命意義是何等深刻，何等廣大。

而且他們中間常常還有人甚至連恩格爾斯所命名的「國家機關」也絲毫不懂得的。

第四節 國家的「衰亡」與暴力革命

第一章 階級社會與國家

恩格爾斯關於國家「衰亡」(即自行凋殘之意——譯者)的言論，負有很廣大的盛名；這個言論是常常被人拿去做引證的，而且十分明顯地指出機會主義者通常偽造馬克思主義的本質何在；我們對於這一點應該加以詳細的討論。現在我把這段言論全部照錄在下面：

「無產階級取得了國家的政權之後，首先就把生產工具變為國有的產業。

但是因這一個動作，牠便消滅了牠自己無產階級的本身；因這一個動作，牠便消滅了一切階級的差別和階級間的矛盾，而且同時連國家也消滅了。在階級矛盾

當中進展着的一切舊社會——過去以及現今所存在着的一切社會——都必須有這一個國家，這就是說，都必須有一個剝削階級之組織，以便維持一切生產的客觀條件，尤其是以耕種力來迫使被剝削階級在現存的生產方法所決定的壓迫條件（如奴隸制，農奴制，工錢勞動制）之下，永遠地過活。國家是整個社會的合法的代表，是社會之綜合成爲明顯可見的一個集團；但是國家之所以成爲社會的代

表，祇是因爲牠是某一個階級的國家，而這個階級在某一個時期中是單獨的代表整個社會的。在古代有奴隸主的國家，因爲當時奴隸主便是國家唯一的公民；在中世紀時代有封建貴族的國家；而在我們這個時代有資產階級的國家。等到最後國家真正的變成社會之代表的時候，牠（國家）本身便成爲廢物了。一旦社會上沒有了壓迫階級，一旦階級的統治和由現代無政府的生產所造成的個人之生存競爭，以及由這種競爭所產生的衝突和極端的矛盾，都一起消滅了的時候——從那時起便沒有壓迫，便無須乎一個特殊的壓迫權力——國家了。當國家真正代表全體社會的時候，牠以社會的名義取得生產工具的所有權，便是牠的第一個行動，同時也便是牠（國家）本身最後的一個獨立行動。國家的權力對於社會關係之干涉，各處各地都將成爲不需要了，而國家權力的本身也將自行永眠了。：此時物品的管理機關和生產過程的指導機關便代替了治人的政府，國家並不是被「廢除」(abgeschafft)的，而是自行衰亡下去(absterbe)的。我們

應該站在這個觀點上來估量「自由人民的國家」這一句話——這句話曾經暫時的可以當作純粹煽動性的口號，可是牠從科學意義上講來畢竟是站不住的。所謂無政府主義的要求國家在今明兩日之內立當廢除的話，由此可以判定。」（見

恩格爾斯著的「反對杜林」一書，德文第三版三〇二——三〇三頁）

我們可以大膽肯定地說，從恩格爾斯這一番思想極豐富的理論上看來，在現代各個社會黨中所保存着的真正社會主義的思想，僅僅是依據馬克思所說的國家「衰亡」以與無政府主義的「廢除」國家的理論相區別而已。這樣的截斷馬克思主義，祇是把馬克思主義誣為機會主義，因為這樣的一個「解釋」，僅僅是留下了遲緩，平穩，和不斷的變遷的一種模糊混淆的印象，而抹煞了猛進的和狂風暴雨似的行動，抹煞了革命的行動，關於國家「衰亡」一般的流行的觀念，毫無疑義的是含有熄滅革命（即使他們不拒絕革命）的意思的。

但是，這樣的一個「解釋」是最粗魯的一種曲解馬克思主義，牠祇是有利於資產

階級，而在理論上是建築在忽略了恩格爾斯那段言論（我們已在上面完全引錄出來了的）中所指出的最主要的情形和理由之上的。

② 第一，恩格爾斯在他那段言論的開首幾句中，就說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的時候，牠便該「以同一的行動來破壞國家」。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一般人都沒有去深加思索。尋常一般人對於這句話或是完全不了解，或認為這是恩格爾斯的「黑智兒豎的弱點」。可是實際上在這幾句話當中已經簡潔而明白的把偉大的一次無產階級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之經驗表述出來了。關於這一次革命，我們在下面將另開一章來更詳盡的討論。實際上恩格爾斯在這裏所說的，是以無產階級革命來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至於他所說關於國家「衰亡」的話，是指着社會主義革命之後，無產階級國家之遺骸而言的。根據恩格爾斯的意思，資產階級的國家不是任其「衰亡」，而是要無產階級在一次革命的過程中來把牠「破壞」的。在這個革命之後，唯有無產階級的國家或「半國家」(Semi-state)才會「衰亡」下去的。

第二，國家是「壓迫的特殊力量」。恩格爾斯這一個華麗煌赫而且十二分深切的定義是完全明確的。從這裏可以推得到這個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少數富豪對千萬工人的「壓迫的特殊力量」，將來是必然要被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一個「壓迫的特殊力量」（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來替代的。所謂「破壞國家」的意義便在於此，所謂以社會的名義取得生產工具的那個「行動」的意義也就在於此。而且很明顯的，以另一個「特殊的力量」（無產階級的）來代替原來的一個「特殊的力量」（資產階級的），這樣的一種交替，自然是不能以「衰亡」的形式來實現的。

第三，恩格爾斯用「衰亡」——甚至於更特出些，換一個樣稱之為「永眠」（Einschlafen）——這一個字眼的時候，他十分明顯而確實地指着在「國家以全體社會的名義來取得生產工具的所有權」之後；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的革命之後的那個時期而言的。我們大家都知道，無產階級「國家」的政治形式在那時候是一種絕對完滿的德謨克拉西。但是在無廉恥的曲解馬克思主義的機會主義者之頭腦中，從來就沒

有想到恩格爾斯在此處所講到關於德謨克拉西的「永眠」和「衰亡」的理論。起初一看，這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是那些不能了解這一點的人，祇是因爲他們不曾思索到德謨克拉西也是一種國家，因此，一旦國家消滅，德謨克拉西自然也隨之而消滅的。祇有革命才能夠「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而一般入所有的國家，——就是最完滿的德謨克拉西——却祇能夠任其「衰亡」下去的。

第四，恩格爾斯提出了他那著名的前提，說「國家是會衰亡的」之後，他立刻就具體的解釋出來，說這個前提是用來攻擊機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在這當中，恩格爾斯首先從那個關於「國家衰亡」的前提中，演繹出一個結論來，這個結論的用意就是在攻擊機會主義者。

我們可以担保說，曾經讀過或聽到過國家「衰亡」的論調的一萬人當中，有九千九百九十人或是完全不了解的，或是沒有記得恩格爾斯從他那個前提中所得出來的結論，並不只是向無政府主義者攻擊。而在其餘的十個人當中，或許有九個人是不懂

得『自由人民的國家』這個口號之意義，也不了解爲什麼向這個口號進攻便是向機會主義進攻的理由。歷史就是這樣的記載出來了！一種大革命的學說就是這樣的被現代所流行的俗學派不知不覺地姦污了！關於攻擊無政府主義的理論，被人千萬次述之又述，而且用種種可能的手段來使之通俗，這樣纔使一般人頭腦中裝着一種攻擊無政府主義的偏見。可是講到關於攻擊機會主義者的理論時，他們却默然無聲而且『忘記』掉了！

『自由人民的國家』是七十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政綱中的要求和普遍的口號。

在這個口號當中，除了一種資產階級德謨克拉克西思想之誇大的描寫之外，便沒有一點政治的涵義。可是因爲這個口號是很『正當』的，指示着一種德謨克拉克西共和國的意義，所以恩格爾斯曾經『有一時』站在煽動的觀點上承認這個口號是正常的，但是實際上這個口號確是機會主義的。因爲牠不僅把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克西過分的加以粉飾，而且牠還表示着不曾了解社會主義對一般國家的批評。我們承認德謨克拉克西

的共和政治是資本主義時代最有利於無產階級的一種國家的形式，但是我們決不能忘記，即使在十分完滿的德謨克拉西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中，一般民衆的命運也終是維繫於工錢奴隸制之上的。再則，每一個國家都是對於被壓迫階級的一個「壓迫的特殊力量」，因此沒有一個國家是「自由的」或是「人民的」。馬克思和恩格爾斯在七十年代的時候，已經再三的把這一點向他們黨內的同志們申述過了。

第五，在同一部恩格爾斯的著作中，我們每一個人都還可以記得他對於國家「衰亡」的一番言論，同時還有一番言論是關於暴力革命的意義的。恩格爾斯在該著作中，把這種革命作用之歷史的估量，變成了對暴力革命之真實的頌揚，這一點自然是沒有一個人記得的。在我們現代的社會黨人中，對於這一種思想加以談論，或甚至加以思索，都是不容許的；而在日常民衆間的宣傳和煽動中，則這種思想簡直不發生任何作用，可是這種思想終歸同國家底「衰亡」是不能分離地溶合成一個和諧的整體的。以下就是恩格爾斯的意見：

「……暴力在歷史上還有另一個作用，就是革命的作用；據馬克思之意見，當一個舊社會懷孕着一個新社會的胎胞的時候，暴力便是這個舊社會的產婆；那種暴力是社會運動所藉以破毀腐舊死僵的政治形體，和從這種舊的死僵的政治形體中開掘出自己的道路之一種工具和方法——凡此一切，杜林（Dühring）先生一字也沒有提及。他僅僅在嘆息和呻吟聲中勉強地承認了應用暴力之可能，他覺得爲推翻創創的經濟制度計，暴力也許是有必要的，但是可惜，你如果一崩暴力——他這樣說——畢竟是不幸的事。因爲暴力常常會使用牠的人敗壞德性的。但是誰都知道，在每一次革命的勝利之後，道德上知識上的進步常常是極大的！而在德國發生一次暴力的衝突，果然這個暴力的衝突結果也許會壓迫到民衆身上來，可是至少終可以獲得這樣的利益：就是說，至少可以打破因三十年戰爭之失敗而滲透在國民意識中的一種奴隸性質。杜林那種暗淡而軟弱無力的借長式的思想，却敢提出到歷史上所永古稱名的最革命的政黨中來！」（見反

謝杜林一書，德文第三版第一九三頁。）

怎麼可以把對於暴力革命的頌揚——這是恩格爾斯在一八七八至一八九四年（就是說，至他死的那一年），曾經對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所屢次解釋過的——來與國家「衰亡」相混和而併合成爲一個理論呢？

平常這兩種理論每每藉折衷學派的力量來把他們併合起來，或被那種無原則的詭辯家強詞奪理斷章取義（藉以取惠於當代的統治者）的方法，來把牠們調和起來——而且在一百次當中有九十九次（就使不再多的話）終是把「國家衰亡」的觀念置諸特別注重的地位上去。以折衷主義來代替辯證法——這是現代正統的社會民主黨人，在其討論馬克思學說的著作中，所應用得最慣常最普遍的一種方法。這樣的一種代替自然不是新發明的；我們就在古希臘的哲學史上，也可以看得到的。把馬克思主義僞造成機會主義，把折衷主義來代替辯證法，這是欺騙民衆最妥當的方法；這樣的方法能夠給人以一種虛妄的滿足。牠似乎是顧及到各方面的，顧及到一切的發展趨

勢，以及一切的矛盾勢力等等；可是事實上牠並沒有供獻過任何的社會發展過程的革命觀念。

關於馬克思和恩爾格斯論及暴力革命對於資產階級國家之不可避免這一點，我們已經在上面說過，在以後的討論中我們還要更詳細的來示諸讀者。要是僅僅靠國家自然的『衰亡』，無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便不能來代替牠（資產階級的國家——譯者）；而按照一般的法則來講，唯有藉暴力革命之一法才能實現這一步。

恩格爾斯對於暴力革命的頌揚，是完全同馬克思屢次所宣佈的言論相符合的（請參閱『哲學之貧困』與『共產主義宣言』終尾幾段的言論，高聲公開地揚言暴力革命之必然性；馬克思在三十年前譯著有『一八七五年哥達綱領批評』一書，在這部書裏面他毫不姑息的對這個綱領的機會主義性加以鞭撻）——這一種頌揚，絕不是『熱情的衝動』，絕不是一種『飾詞』，也絕不是論戰中一種突出的詞句，用這一種關於暴力革命的觀點，而且唯有用這一種觀點來有系統的訓練民衆，是必要的，——馬克思，恩

格爾斯全盤學說的基礎，就在於此。現在盛極一時的社會愛國派和攷茨基主義者，對於這種宣傳和煽動的忽略，正是他們背叛馬克斯學說的所在。

不經過一次暴力革命，要以無產階級的國家來代替資產階級的統治是不可能的。可是無產階級的國家之消滅，也就是一切國家之消滅，則除了任其「衰亡」之外，便沒有別的道路。

馬克思，恩格爾斯在他們分別研究每一次革命的局面中，他們終藉分析各個單獨的革命經驗中之教訓，來詳細的具體的發揮他們所持的理論。對於他們這一部分的學說，無疑義地是一部分最重要的學說，我們現在就要來加以研究。

第二章 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的經驗

第一節 革命之前夜

成熟的馬克思主義之最初的著作『哲學之貧困』與『共產主義宣言』，正是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前夜出現的。由於這一個事實，所以在這著作中除了馬克思主義一般原則的敘述之外，還有多少是當時具體的革命情勢之反映。因此，我們來探究這兩部著作的作者從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經驗中所做出的結論以前，論及『國家』問題的一切說話，便比較很便利了。

馬克思在『哲學之貧困』裏說：

「……工人階級在牠發展的過程中，將創造一個沒有階級和沒有階級矛盾的社會以代替舊的資產階級的社會；就嚴格意義說，從此將再沒有任何政治權力，因為政治權力是資產階級社會中階級矛盾的正式表現」（第一八二頁）

我們拿這個國家隨着階級消滅而消滅的觀點之解釋，來和馬克思與恩格爾斯在幾個月後——即一八四七年的十一月——所著「共產主義宣言」中所有的解釋比較一下，這是必須的。

「……當我們研究到無產階級發展之一般的現象時，我們便可以看見社會中那種或明或暗的內戰，後由這種內戰變成了公開的革命，這是無產階級以暴力推倒資產階級來建立自己的統治。」

「……我們已經知道工人革命中之第一步是變（字義上即「提升」之意）無產階級為統治階級，也就是德謨克拉西的戰勝。」

「……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權漸次奪取資產階級的一切資本，將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到國家的手裏——就是集中到組織成爲一個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去；這樣做去，那總生產力就可以用最大的速度增加了。」（一九〇六年的德文第七版三一頁至三七頁）

這裏馬克思主義論到國家問題有一個最可注意而最重要的理想，即馬克思恩格爾斯在巴黎公社之後所開始寫述出來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想。

其次還有一個極有趣味的『國家』的定義，就是說：『國家就是無產階級組織起來成爲統治階級』的機關。這個定義是屬於馬克思主義的『被忘記了的思想』。

這個國家的定義，不僅在真正的社會民主黨之流行的宣傳和煽動的文章中，從來未曾解釋過一下，而且簡直被他們忘記了。因爲牠與改良主義完全不能調和，而且同一般的機會主義者的偏見，和資產階級所謂『德謨克拉西之和平發展』的那種幻想，是直接相衝突的。

一切機會主義者，社會愛國派和考茨基派一類的人們有一句口頭禪說：『無產階級需要國家』，而且肯定的說這是馬克思的教訓。可是他們『忘記了』附加的話，按照馬克思的意思，第一點，是說無產階級所需要的祇是一個正在凋殘下去的國家，就是說那組織起來之後便立刻開始凋殘下去，而且不能不凋殘下去的一個國家；第

二點是說，勞動者所需要的「國家」，就是「無產階級組織起來成爲統治階級」的那個國家。

國家是一種力量的特別組織，牠是以暴力來壓倒別一個階級的力量組織的。無產階級所要壓倒的是什麼階級呢？自然只是剝削階級，就是資產階級。勞動者需要國家，僅僅是爲要鎮壓那些剝削者的反抗，而且也只有無產階級才能領導這個鎮壓而使之實現。因爲只有無產階級是唯一的能夠革命到底的階級。只有無產階級能夠聯合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來作反資產階級的鬥爭，以至於把資產階級的政權完全推翻下去。

剝削階級需要政治的統治，爲的是要維持其剝削，也就是爲了極少數人自私的利益以反對全社會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被壓迫階級需要政治的統治，爲的是要完全消滅一切剝削，也就是爲了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以反對現代極少數的奴隸的主人們——地主和資本家。

小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派，夢想以階級調和來代替階級爭鬥，却自號爲社會主義者的人們，竟儼然幻想出了一個到社會主義的過程來。他們的意見以爲要實現社會主義，不必用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的方法，而祇要用和平的，使少數人屈服於明瞭自己責任的多數人之下的形式就可以。這種小資產階級的烏托邦和超階級國家的思想是互相連結而不可分離的。在實際上，這種烏托邦的結局是背叛了勞動階級的利益，這已經爲歷史所證明了的。例如法國一八四八與一八七一年的革命史，以及「社會主義者」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參加英法意以及其他國家資產階級的內閣的歷史事實，都足以證明這一點。

馬克思畢生盡力與這種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現在俄國的少數派和社會革命黨中復活着的「社會主義」——奮鬥。他一貫的應用他的階級鬥爭之學說以至於政權和國家之理論。

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完成；因爲只有牠才是能夠擔負這個責

任的特別階級，只有牠之生存的經濟條件，使牠具有能夠完成這個責任的那種力量 and 可能。當資產階級破壞了並拆散了一切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時候，同時他便聯合，團結而且組織了城市無產階級。只有無產階級——由於牠在大規模生產中的經濟作用——能夠領導一切被壓迫的勞動羣衆，這些羣衆受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往往較之無產階級有過無不及，可是他們却不能獨立地進行解放自己的爭鬥。

馬克思所用於「國家」社會主義革命那些問題上的階級鬥爭的學說，必然引導到承認無產階級之「政治的統治權」，承認無產階級之專政，亦即承認不讓任何人分享而直接建築於羣衆武裝力量之上的政權。只有無產階級變成統治階級，只有牠能夠把資產階級之兇猛的和必然的反抗鎮壓下去，而組織一切被剝削的勞動羣衆以圖經濟生活的新建設，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推翻資產階級。

無產階級必須有一個國家，這個國家是一切權力和暴力的集中組織，是用以鎮壓剝削階級的反抗，而引導廣大的人民羣衆——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來

從事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之建設。

馬克思主義培養了工人的政黨，同時也教育了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使牠能夠奪取政權，引導「全體人民」到社會主義，指揮和組織新的制度，並且使牠能夠在沒有資產階級和沒有反對資產階級的社會生活之建設事業中，成爲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的教師和領袖。反之，現在正得勢的機會主義，在離開工人羣衆的工人政黨中，培植了一般工資較優的工人代表，這些工人代表是能在資本主義之下「將就」過活，爲着一碗豆湯而賣去自己生來就有的利權的；這就是拒絕了反對資產階級之革命的人民首領的作用。

「國家」就是「無產階級組織起來成爲統治階級」的一個機關——馬克思這個理論，和他所有關於無產階級在歷史上的革命作用之理論，是不可分離連結在一起的。這個作用之實現，便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政治上的統治。

但是，既然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作爲反對資產階級的特殊力量的組織，很自然的會

發生這樣一個問題：不先打破和毀滅資產階級爲自己利益而設的國家機關，則創造這樣一個無產階級的特殊力量的組織，是否有實現的可能？共產主義宣言曾直接指示這個結論來，而馬克斯在總結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中革命的實際經驗時，所得的結果，也正是這個結論。

第二節 革命的總結

對於我們現在所講到的國家問題，馬克思在研究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的革命時，得到下面的結論。（見他的著作「拿破崙第三勃魯梅爾十八日政變記」 *1848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然而這個革命是徹底的。牠還正在經歷着艱苦的道路，牠還正在有系統地進行着牠的事業。到了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拿破崙第三完成政變的日子）那天，牠已經完成了牠的工作計劃之一半，現時牠正在進行後一半的工作

。牠開始獲得了議會的權力，以冀獲得推翻這種權力的可能。現在這個目的達到了，牠便設法完成「行政權」的獲得；牠把這個權力變成爲最簡單的名詞，並使之孤立，使之成爲攻擊的中心，並集中一切破壞這個權力的力量來反抗牠。當這個革命完成了後半部工作計劃的時候，那時歐洲將起來欣然大喊；老田鼠你捱得好呀！」

「……這個行政權有無數官僚和軍隊的組織，有種種複雜的人爲的政府機關，有五十萬軍官的軍隊和其他五十萬的武裝力量；這個可怕的寄生組織，好似密網一般籠罩着整個的法國社會，阻塞着牠逼體一切的毛孔，這樣的一個行政權是產生於君主專制時代，正當封建制度崩壞——由那個寄生組織所促成的崩壞——的時期，法國第一次革命促進了政權之集中，「但是同時却擴大了政府的權力範圍所屬機關，和僱用人員的數目。拿破崙就完成了這個「國家機關」，合法的保皇派和七月帝制除了擴大勞動的分工外，什麼新的成績都沒有做出來。」

「……最後，議會主義的共和派在牠反對革命的爭鬥中，已經自知不能不增加國家的財力和鞏固政權的集中，藉此以增強其壓迫的力量。所有革命都使這政府的機關更加完善起來，而沒有使牠破壞下去。那些相互更迭爲着取得統治權而鬥爭的政黨，都把這個巨大的國家機關的奪取，視爲主要的勝利品」——拿破崙第三勃魯梅爾十八日政變記——一九〇七年德文版九八至九九頁）

馬克思主義在這可注意的一段文字裏，較之在「共產主義宣言」裏又向前進了一大步了。在「共產主義宣言」裏，關於國家這個問題還每每用着抽象的最普遍的理和詞句來說明，可是在這裏，這個問題提出的方式已經具體，而且所有的一些結論也做得格外正確肯定而落實際了：過去一切的革命都是促使這個國家機關更臻於完善，可是現在我們必須打碎牠，而且徹底破壞牠。

這個結論，實在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之主要的本觀點，而被風行一時的正式的社會民主黨所忘記了的，恰恰也就是這個基本觀點，而且牠又被第二國際最

著名的理論家狄茨基所修改了（我們以下要說及的）。

在「共產主義宣言」上，陳列着許多歷史事變的一般的教訓，使我們認識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而且使我們得到一個必然的結論：無產階級如果不先獲得政權，不先得到政治上的統治，不把國家變為「無產階級組織起來成為統治階級」的機關，牠就不能推翻資產階級；並且這個無產階級的國家機關在牠完成之後，很快便會開始凋落，因為在一個沒有階級矛盾的社會裏，國家這一個機關是不需要的，並且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共產主義宣言」中，還沒有提到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上，來決定取怎樣的方式以改變資產階級的國家為無產階級的國家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便提出來並且解決了。忠實於他自己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馬克思，以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偉大的革命時中之歷史經驗，來做他學說的基礎。此處正如平常一樣，他的學說祇是實際經驗中所得教訓之結論，而這些實際經驗又是用深刻的哲學眼光和豐富的歷史智識來說明的。

把國家問題具體的提出來就是這樣：資產階級的國家，爲資產階級統治所必需的政府機關，在歷史上是怎樣發生的？在資產階級革命的過程中，和在被壓迫階級自然發生出來的運動的面前，國家是怎樣變遷，怎樣進化的？無產階級對於國家這個機關又有什麼任務？

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國家之集中政權，是產生於專制政體崩壞的時期。官吏和常備軍這兩種組織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特別表徵。在馬克斯和恩格爾斯的著作中，我們可以找到很豐富的材料，說明這兩個組織是千頭萬緒的與資產階級相聯繫着的。每個工人在他的經驗中，更能把這種聯繫證明得格外深刻和明顯。

工人階級是從他本身痛苦的經驗中來認識這一個聯繫；因此，工人階級便能很容易的學得，並且很穩固的認識這種聯繫之不可免的理論——對於這種理論，小資產階級的社會民主黨人或者很輕浮的盲目的拒絕牠，或者更輕浮的「大概的」承認牠，可是却不去找得與實際相適合的結論。

官吏階級和常備軍隊——是資產階級社會軀幹上的寄生蟲，牠是使這個社會破壞的內部矛盾所產生的一種寄生蟲；同時又是「塞住」這社會軀幹上之毛孔的一種寄生蟲。盛行於社會民主黨中的攷茨基的機會主義派，認為這種把國家當作寄生組織的觀念是無政府主義所僅有的特性。自然，這樣的曲解馬克思主義，對於那些污蔑社會主義至於藉口「保護祖國」來為帝國主義辯護的小資產階級的下流之輩，是很有益的，然而用不着疑惑，這究竟是絕對的曲解。

自從封建制度崩壞，歐洲成為許多資產階級革命的大舞臺時候起，這些官僚的和軍閥的機關便日見發展，完成和鞏固起來。特別是小資產階級被吸引到大資產階級方面去，而與之聯合；大資產階級盡量利用這些機關，把上層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等安頓到比較舒服安樂而尊榮的地位上去，藉此把他們抬到普通的人民之上。

我們試看一看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之後，在半年中所發生的一些什麼事：以前讓與黑色百人團(Black Hundreds)人的官吏職位，現在成為民主立憲黨，

少數黨和社會革命黨的賊物了。實際上沒有一個人想到任何嚴重的改造；他們努力把這種改造延期下去，『等候憲法會議』時來提及，而同時又把憲法會議漸漸延期直到戰事結束為止！但是對於瓜分賊物，佔據開員位置，以及搶奪政府祕書，將軍省長等等位置却都沒有延期，都沒有『等候憲法會議』！臨時政府內閣組合的把戲，實質上不過是全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行政機關中，上上下下分贓之表現而已。從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到八月二十七日，這六個月中的具體的實際的結果，毫無疑的，是什麼行政改良事業都延期了，官吏位置都瓜分好了，在瓜分中的『錯誤』，也已經因重新瓜分而改正了！

但是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黨（以俄國為例，則有民主立憲黨，社會民主黨與少數黨）發生瓜分官吏機關的事件愈多，則一切被壓迫階級，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被壓迫階級，便愈明白的認清他們對於整個資產階級社會利益上的衝突是不可調和的。因此，那些資產階級的政黨，甚至極端主張民主的「革命的民主黨」人，就必然

要加強他們壓迫的力量，來鎮壓革命的無產階級，並且使壓迫的工具——國家機關的權力——更加強固而有力起來。這種事變的經過逼使革命「集中一切破壞力量」來反抗國家的權力，並使牠認定了任務，不是要改善這個國家機關，而是要破壞牠、毀滅牠。

這樣一個任務的決定，並不是由於邏輯的推理而獲得，而是由於實際事變的經過，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活的經驗所產生出來的。馬克思對於根據歷史經驗之事實的基礎，其嚴格的程度如何，我們可以從他在一八五二年還沒有具體提出「拿什麼來代替那必須推倒的國家機關」這個問題的事實上面看出來。當時的經驗還沒有可以用來答復這樣問題的充分的事實根據，這個問題只到後來一八七一年間，歷史才把牠提出來。至一八五一年時，只能根據科學的歷史事變之觀察，來很正確的斷言無產階級的革命已經達到了這樣一個階級：此時「集中一切破壞力量」以反抗國家政權，和破壞這個國家機關是牠的任務了。

此處可以發生一個問題：是否可以把馬克思這種經驗，觀察和結論普遍的應用到

比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三年間的法國歷史更大的範圍上去？爲要答覆這個問題，我們先得把恩格爾斯的一段解釋回憶一下，然後再來研究實際的事實。

恩格爾斯在第三版『十八日政變記』中所著的序言說：

『法國這個國家，牠在歷史上的階級爭鬥，較之其他任何各國都要多些，每一次階級爭鬥終得到一個很決絕的結果，更迭着改變的政治形式（在這種政治形式之中進行着階級爭鬥，而且表顯了這種爭鬥的結果），在法國也表現得最爲特色。法國在中世紀時代是封建制度的中心；從文藝復興時代以後，牠是一個統一的模範君主國；當大革命一起，法國便撲滅了封建制度而創立起資產階級的統治，這樣一個純粹的模範式的資產階級之統治，實爲歐洲其他國家所不能及的。』

同樣，法國革命的無產階級反對統治的資產階級，亦爲其他各國所未見』（一九〇七年版第四頁。）

最後的一句話，現在已經陳舊了。因爲自從一八七一年以來，法國無產階級的

革命爭鬥中發生了停頓。雖然這個停頓也會很長久，可是絕對不能說在未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中，法國就沒有成爲階級爭鬥到底的一個模範國家之可能的。

現在我們試把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各先進國家的歷史來作一個概括的觀察，我們便可以看見同樣的過程發現於很廣大的舞台上，進行得比較遲緩而且複雜：一方面「國會制」不僅在共和國（如法，美，瑞士，）而且在君主國裏（如英吉利，和達到相當程度的德國，意大利與及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諸國）都發展起來了；另一方面呢，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黨爲搶奪政權以及瓜分各種官吏位置而互相爭鬥，但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基礎却毫無變動；此外，「行政權」以及牠以下的許多官僚和軍事機關，都完善並且鞏固起來了。毫無疑義的，這些便是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在其最新的進化階段上的普通現象。在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的三年中，法國取一種迅速的銳利的集中形勢，表現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所有那一切發展的過程。

特別是在帝國主義時期，財政資本時期，偉大的資本主義壟斷的時期，由單純壟

斷的資本主義進到國家壟斷的資本主義的時期，這時期表現着「國家機關」之異常的鞏固，官僚和軍事機關的空前的增長，同時加於無產階級之壓迫亦隨之而加劇。這些現象，在君主國裏與在最自由的共和國裏都是一樣。

世界歷史現在已無疑的進到了一個比一八五二年還廣大得多的階段，這是趨向無產階級革命之「一切力量之集中」以「破壞」國家機關的一個新階段。

至於無產階級用什麼來代替這個國家機關——對於這個問題，巴黎公社已經供給我們很豐富的材料了。

第三節 一八五二年馬克思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

一九〇七年梅林 (Meinings) 把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馬克思致惠第麥 (Weidener) 的一封信的摘要披露於「新時代」雜誌 (第廿五卷第二期一六四頁) 上，那封信裏含有下面這樣一段可注意的議論：

「至於講到我呢，其實發見現代社會中有階級的存在，和發見各階級間有互

相的爭鬥，這種光榮並不能都歸功於我的，在很久以前，資產階級的歷史學者已經解釋過階級爭鬥之歷史的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也解釋過各階級的經濟結構。我所做的新工作是在下列各項：

(一) 階級之存在僅僅是同一歷史上的爭鬥相關聯的，而這種爭鬥就是生產發展之特質；

(二) 階級爭鬥必然要進到無產階級專政；

(三) 這個專政不過是消滅一切階級，進到無產階級社會的一個過渡。」

在這一段話裏面，馬克思很明顯很充分的表示出來：第一是他的理論和資產階級最前進最聰明的思想家的理論之主要區別；第二是關於他的國家理論之實質。

一般人常常說馬克思學說中之主要理論便是階級鬥爭。其實這種說法是錯誤的，而且這箇錯誤異常中途發生了許多機會主義對於馬克思主義種種斷章取義的論調，

是馬克思以前的資產階級爲着本階級而創造出來的。普通說來，這種理論是資產階級所能接受的。僅僅承認階級爭鬥的人，還不能算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也許還未脫離資產階級의思想和政策的鎖鍊。把馬克思主義僅限於階級爭鬥的學說，便是縮小了馬克思主義，摧毀了馬克思主義，使牠成爲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只有把承認階級爭鬥擴大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主義和一般資產階級的理論家的大區別就在這一點。我們必須在這一塊試金石上，去試驗對於馬克思主義是否真正了解和認識。不僅一切機會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而且所有的攷茨基主義者（他們是介於馬克思主義者與改良主義者之間的人們）都否認「無產階級專政」，變成了可憐的庸俗的下流癡子與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歐洲的歷史把這個問題擺在工人階級的面前是沒有什麼奇怪的。攷茨基所著一九一八年八月（即在此書第一版刊行了很久以後）出版的「無產階級專政」那本小冊子，便是小資產階級摧毀馬克思主義，和口頭上虛偽的承認馬克思主義，而實

實際上完全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例子（見我的小冊子「無產階級專政與叛徒攷茨基」，莫斯科一九一八年出版）。今日機會主義之主要的代表，而爲去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攷茨基，完全是被上面所說的資產階級思想之特質所籠罩了。因爲這個機會主義承認階級爭鬥的範圍，只限於資產階級關係範圍以內的（而在這個範圍以內，沒有一個受過教育的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在「原則」上會否認階級鬥爭的！），機會主義沒有把承認階級鬥爭這一點一直引伸到最主要的一個焦點，一直引伸到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引伸到推翻資產階級以至完全消滅資產階級的一個時期。

在實際上，這個時期必然的是一個階級爭鬥非常劇烈的時期，所以這個時期的國家也必然的是一個新的民主國家（是代表無產階級和一般貧民的），也就是一個新的專政國家（是反對資產階級的）。再則，只有那些能夠了解一個階級的專政，通常不僅爲任何階級社會所必需，不僅爲推翻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所必需，而且亦爲劃開資本主義與「無產階級社會」與共產主義的整個的歷史時代所必需的。只有能夠了

解這些理論的人，才能領會馬克思國家學說之實質。

資產階級國家的形式雖然非常複雜，可是牠的本質只有一個，就是說分析這個國家最後所得的結果，必然都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專政。

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自然也不免有極豐富且極複雜的政治形式，可是牠的本質也必定只有一個，就是：

「無產階級專政」！

第三章 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經驗：馬克

思的分析

第一節 巴黎公社社員的偉大在什麼地方

大家都知道，一八七〇年秋（巴黎公社幾個月以前）馬克思曾經警告巴黎的工人們，向他們證明推翻政府的企圖，將變爲失望的蠢動。但是當一八七一年三月最後的決戰已逼到工人們頭上來，使他們不得不出而應戰，暴動已成爲事實的時候，雖然當時有種種不利益的朕兆，然而馬克思却以極大的熱忱來歡迎無產階級革命。馬克思並不持一般誇學的迂腐先生們對於一個「時機未熟」的運動，只知非難和譴責的那種態度，他們不像俄國特別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的叛徒樸列哈諾夫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寫了一些鼓動工農奮鬥的文字，可是到了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以後，他却大喊自由主

義者的口號：「你們不應借助於武裝」。

馬克思不僅熱烈的頌揚巴黎公社社員們的偉大，如他所說的：「衝破了天空」；而且這次羣衆革命運動雖然沒有達到目的，馬克思却在這當中看出了一個極偉大和極重要的歷史上的經驗，他看到這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一個向前的進步，這是較之幾百條政綱和幾百次討論尤其重要的一個實際的進步。分析這個經驗，從經驗中學得策略上的教訓，重新審察自己理論上的基礎，這些便是馬克思自己所認定的任務。馬克思對於「共產主義宣言」認爲有唯一的必須「修改」的地方，他也已經根據了巴黎公社的革命經驗而實行改正了。

在德國新版的「共產主義宣言」上最後的一篇序有兩位著者的簽名。該序是一八七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所作的。兩位作者——馬克思和恩格爾斯——在這篇序言中，說「共產主義宣言」中的政綱，「有幾點現在已經過時了」。

他們又說：「巴黎公社明白的指示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的奪取現成的國家機關

，而運用牠來完成自己的目的」。

在引號中的後一句話是從馬克思的「法國內戰」一書中摘引出來的。所以馬克思和恩格爾斯把巴黎公社的事件中一個基本的主要的教訓看得異常重要，因此竟把牠特別介紹出來，作為「共產主義宣言」的一個極重要的修改。

非常顯著的一件事，就是被機會主義者所曲解了的，也正是這一個「共產主義宣言」中的修改。讀者即使沒有百分之九十九，大概也有十分之九不明瞭這個修改的意義。我們以後要特闢一章對於這種曲解更詳細的加以討論。

現在我們要充分的注意到機會主義者對於馬克思著名的學理之平庸流行的「解釋」，根據這個解釋，似乎馬克思在這裏是特別表現一種逐漸發展的觀念，這種觀念正是與突然奪取政權的思想相衝突的。

實際上正和這種解釋相反，馬克思所說的是工人階級應當破壞並搗毀這個可以利用的現成的國家機關，而不是僅限於佔有這個機關。

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正是巴黎公社的時候——馬克思寫給庫格兒曼(Kugelmann)的一封信裏說：

『如果你讀到我的「拿破崙第三勃魯梅爾十八日政變記」一書的最後一章，你就可以知道關於法國革命以後的企圖。我是這樣說的：並不是要把官僚和軍事的國家機關從一部分人的手裏轉遞到別一部分人的手裏——像今日以前的情形——而是要把牠來破壞掉。這是歐洲大陸上任何一個真正的民衆革命所必需的一個先決條件，也正是我們偉大的巴黎公社同志們的企圖』。（見『新時代』第二十卷第一期七〇九頁）

「破壞官僚和軍事的國家機關」幾個字，已經把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對於國家問題的任務之重要教訓，很簡明的表白出來了。流行的政教基派，在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中所忘却了的，並且完全修改了的，也正是這個教訓。

至於馬克思在「拿破崙第三政變記」所提及的話，我們已經在上面把牠完全摘錄

出來了。

在我們所摘錄的句子中，有兩點是這裏特別要提出來講的：

第一，他的結論只限於歐洲大陸，這在一八七一年的時候自然是很明白的，那時正當英國還是在純粹資本主義國家的模型中，牠尙未具備軍國主義的表現，而就大體講來，也還沒有官僚主義。

因此，馬克思便把英國除外，就是因為在當時英國的革命，甚至於民衆的革命，即使不做到破壞「現成的國家機關」這一個先決條件，也是有實現的可能。

現在是一九一七年，是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的時代，馬克思所說的這種除外，到現在已成爲不正確的了。最大而最後的那兩個非軍國主義和官僚政治的「恩格羅」和「撒克遜」「自由」的代表——英國和美國——至今已完全捲入普及全歐之軍國官僚制度的血漿泥濘的污坑中去了，牠們要把一切都壓服下去，把一切都踏在牠們鐵蹄之下。在今日的美國和英國「任何真正的民衆革命」，其先決條件便是破壞和搗毀

這個「現成的國家機關」(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之間，這些國家已經依着歐洲帝國主義的原則完成了。)

第二，馬克思一番含有極深刻的意義而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說話，就在他說破壞軍事和官僚的國家機關是「任何一個真正的民衆革命」之先決條件。「民衆」革命這一個思想，在馬克思的嘴裏說出來，似乎有點奇怪。俄國樸列哈諾夫派，少數派以及斯托羅夫(Storov)的信徒們，他們都想自尊爲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馬克思這樣的一種解說，在他們看來認爲這是馬氏的一種語病。他們曾經把馬克思主義變爲一種空虛簡陋的自由派那種牽強附會的論調，以爲除了「資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之間的矛盾點而外，其他什麼都沒有，而且就是對於這種矛盾點的觀念，在他們看來，也只是一個絕端無生氣的理論罷了。

如果我們舉幾個二十世紀革命的實例來看，當然就要承認葡萄牙和土耳其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可是這兩個革命却都不是民衆革命，因爲最大多數的民衆在這兩次

革命中間都沒有積極參加，也沒有獨立提出他們政治和經濟的要求。反之，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的俄國資產階級革命，雖然沒有獲得像葡萄牙和土耳其革命那般「蔚然」的成績，可是毫無疑義的，牠却是一個「真正民衆的」革命，因為最大多數人，在重重壓迫和剝削之下的最下層的民衆，都自動的站了起來，在革命的全部過程中提出了他們自己的要求，而且表現着種種的企圖，爲着自己的利益，圖在已破壞了的舊社會的廢址上建設起一個新制度來。

在一八七一年的時候，歐洲大陸上，無論那一個國家中，無產階級都尚未成爲民衆的大多數。所謂民衆的革命——實際上把大多數的民衆捲入革命漩渦中的民衆革命——只是包含無產階級和農民羣衆在內的一種革命，這兩個階級組成了當時的「民衆」，這兩個階級由於受「軍閥官僚的國家機關」的壓迫，踐踏，和剝削的那種環境而一致聯合起來了。搗毀這個機關，破壞這個機關，便是大多數「民衆」——大多數工人和農民——的真正要求，便是貧農羣衆和無產階級自由聯合的「先決條件」。

要是沒有這一個聯合，德謨克拉克西是不會穩固的，社會主義的改造是不會成功的。

大家都知道，巴黎公社雖然因為許多內部和外部環境不利的因素，沒有能達到他的目的；可是牠確是向着這個聯合方向走的。

因此，說到「真正的民衆革命」，馬克思絲毫也沒有忘却小資產階級的特質（關於他們，馬氏是常常而且很多說及的），而且他很嚴密的注意到一八七一年那個時候，在歐洲大陸上的多數國家中各階級間的實際關係。而在另一方面，他又證明破壞這個國家機關是工人和農民的利益上所要求的，而這個共同的要求使他們聯合起來，使他們面前擺着一個破壞着「寄生蟲」的機關，而代以一個新組織之共同的任務。

但是到底拿什麼來代替呢？

第二節 拿什麼來代替破壞了的國家機關

對於這個問題，馬克思在一八四七年的「共產主義宣言」中，還只能給一個完全

抽象的解答，切實些說，他只是指出對於這個問題的任務，而沒有提出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無產階級組織起來成爲統治階級」和以「德謨克拉西之勝利」來代替，這便是當時「共產主義宣言」的答覆。

這一個以無產階級爲統治階級的組織應取什麼具體的形式；用什麼具體的方法來使這個組織成爲最完備，最徹底的「德謨克拉西之勝利」的組織呢？對於這些問題，馬克思爲避免墮入烏托邦的危險計，他便期待着從一個羣衆運動的實際經驗中，來獲得一個答案。

巴黎公社的經驗雖然是很細小，可是馬克思在他的「法國內戰」一書中，却把牠分析得十分精密。現在讓我來把牠最重要的幾段摘錄出來：

「在十九世紀時，發端於中世紀時代的集中的國家政權及其在各方面所設立的機關：如常備軍，警察，官吏，教士，和審判官等等機關，都發達起來了。

因爲勞資間階級衝突的發展，國家就愈弄愈明顯的表現着以壓迫勞動者爲專務的

一種公共機關之性質，換言之，就是說愈明顯的表現着一種階級統治的機關之性質。在每一次革命之後，終表現着階級鬥爭的進步，於是國家政權之含有純粹壓迫的性質，也更見其明顯了。在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那次革命以後，國家的政權遂成爲「資本進攻勞動的戰爭中之一個國家武器了」。而第二帝國（法國拿破崙第三的帝國稱爲第二帝國——譯者）更鞏固了這個武器。

「直接與帝國處於反抗地位的便是巴黎公社。牠是共和政體一個特別的形勢，牠不僅要消滅一般共和政體中階級統治之帝制形式，並且要推翻這個階級統治的本身。」

無產階級的社會共和國之特別形式，是怎麼一種樣子的呢？巴黎公社曾經着手創造的又是個什麼樣子的國家呢？

「巴黎公社所發表的第一次法令，便是廢除常備軍而代之以人民的武裝……」這一個要求，在現今無論那個自命爲社會主義的政黨之政綱中，都有規定着的。

但是這種政綱的價值，對於那些社會革命黨和少數派却等於零，因為他們的行動表現很明顯，他們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革命之後，還拒絕把政綱中的這一個要求實施出來！

「巴黎公社是依照普選制，由巴黎各區所選出來的城市代表所組織的。他們是完全負責的，並且隨時可以撤銷他們代表資格的。他們的大多數自然是工人，或是被工人階級所承認的代表：」

「……警察從來只是政府的一個工具，現在把牠原來一切的政治職務都立刻革除了去，而變為隨時可以更換的公社負責機關了。」

「……同樣，對於其他一切的行政機關的各部官吏，巴黎公社也應用這種方法。從公社社員起直至最低下的工人止，自上而下的，凡在公共機關中服務的人員，都給以與普通工人同等的工資。一切政府最高官吏的特權，以及賜與政府代表的特權和酬金，現在都跟着這些官吏本身之消滅而同歸於盡，……把舊政府

所有物質上的武器，常備軍和警察等等既盡行消滅之後，公社就又毫不遲疑的集其注意於破壞精神上壓迫的武器，就是教士的權力。……審判官也失去了他們那種虛偽的獨立性。……以後審判官應該公開的選舉出來，要對人民負責，並且人民有隨時撤銷他的權力……」

因此，巴黎公社代替那破壞了的國家機關，似乎「只不過」是一個更完善的德謨克拉西而已：例如取消常備軍，實施全體官吏之選舉和罷免權等都是事實。但是須知這一個「只不過」，事實上是代表以原則上根本不同的一個制度，來代替一個舊制度的「一種偉大改革」。

這裏我們便看到「由數量變到質量」的一個實例：要實現得像一般人所理想的那樣十二分完美徹底的德謨克拉西，便是由資產階級變為無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而由國家（一階級壓迫另一階級的特殊力量）變為實際上已非真正國家的一種形式。

壓倒資產階級與制服牠的反抗，都是必要的任務。而這對於巴黎公社尤其是必

要的，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之一，便是沒有十分堅決的來做這件事。

但是這個壓迫機關，在公社裏是在大多數人民的手中，與在奴隸制農奴制和工錢勞動制度之下那樣爲少數所佔有的情形，迥然不同。可是一經到了民衆的大多數壓倒了他們的壓迫者時候，這種壓迫的「特殊力量」便再沒有必要了。在這種意義上，國家便開始消滅了。大多數的民衆代替了享有特權的少數人（特權的官吏，常備軍的將領）的特殊組織，他們自己便能直接來執行一切職權，國家一切行政的職權愈是落到多數人的手裏去，則這個國家權力的需要便愈少了。

巴黎公社對於這一點所採取的手段，而經馬克思所加重說明的，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取消政府代表的一切酬金，和官吏的一切優厚的薪俸；以及把國家一切服務人員的薪俸都減低到「工人工資」的水平線。從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變到無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的這一個破壞，在這裏比在任何地方都要表現得明顯些，從壓迫階級的德謨克拉西，變爲被壓迫階級的德謨克拉西；從以壓倒別一個階級爲目的的階級統

治「勢力」，變爲用大多數的民衆——工人和農民——的整個勢力，來在倒壓迫者的一種統治。而馬克思學說中被人忘却了的也正是這一點，這最明顯的一點，就是關於國家問題之最重要的一點。在很多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註解中，都完全沒有提及過這一點的。對於這一點的緘默，大家都成爲習慣了；正好像基督教達到了國教地位的時候，便忘記了原始基督教之「真純」，及其革命的德謨克拉西的精神一樣。

——減低國家高級官吏的薪俸，似乎僅僅是真純的原始德謨克拉西之一種「單純的」要求。最新的機會主義「創造者」之一，柏恩斯坦(Bernstein)——他以前是一個社會民主黨黨員——曾屢次盡其才能，用資產階級那種嘲笑的口吻，來嘲笑「原始的」德謨克拉西。他同其他一切的機會主義者，和現在的攷茨基派一流人一樣，他他就完全不懂得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非有幾方面回轉到原始的德謨克拉西的現象，是不可能的。（如果不然，試問我們能用什麼方法，使國家各種職權轉移到大多數民衆和每個人民的手裏去？）其次，他沒有了解建築在資本主義和資本主

義文化的基礎之上的「原始德謨克拉西」，與太古時代或資本主義以前時代的原始德謨克拉西並不是一件東西。資本主義的文化已創設了大規模的生產制度，有了工廠，鐵路，郵政，電報等等大規模形式的建設。在這個基礎之上，「舊式國家」大部份的職權已大大地簡單化了，在實際上，這種職權已進化到很簡單的手續，如登記，填表和檢點號碼等一類的事務了。而這一類的職務，每個識字的人都很能夠勝任的，而且做這種工作，只要付以普通工人的工資，也就可以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切的官吏機關和任何的特權官職也都可以（而且應該）取消了。

對於一切官吏的完全選舉制，和隨時可以執行的撤消權，降低官吏的薪俸到普通工人的工資一樣的程度——這是很簡單而且明顯的德謨克拉西的辦法，而這種辦法正是與一般工人和大多數農民的利益完全相適合的，同時牠也就是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一道橋樑。

這些辦法都是關於國家的，也就是關於社會之純粹的政治改造的；不過這種辦法

的完整的意義，祇是在實現或準備「沒收掠奪者」的時候，就是從資本家之生產工具的私有財產過渡到社會公共的所有權的時候，才能完滿地表現出來。

「巴黎公社實現了一切資產階級革命的「廉潔政府」的口號，因為牠革除了國家的兩大支出——軍隊和官吏。」（馬克思）

農民也同其他小資產階級一樣，他們當中僅僅只有很少數的人「爬上了高位」，而且在資產階級的意志之下「鑽進了社會」；這就是說，他們或者變成了上層資產階級的富豪人物，或者升遷為享有特權的高官大吏。

在有農民階級的各個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是這樣的），大多數農民是受着政府的壓迫，他們希望推翻這個政府，而期待着一個「廉潔政府」。這一個希望，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夠實現，在實現的過程中，無產階級同時並且向前要進一步，即走向國家之社會主義的改造上去了。

第二節 議會主義之消滅

第三章 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經驗

馬克思說：

「巴黎公社不應作爲一種議會的集團，而是立法和行政同時兼任的一種工作機關。」

「從前統治階級的議員們每三年或六年改選一次到議會中去「代表」人民和鎮壓民衆，現在不然，在公社組織之下的民衆採取普選制以吸收所有爲公社中一切企業所必需的工人，監工，辦事人員等等，這正像單獨的企業主應用他個人的選擇權來吸收工人職員到他自己的企業中去，是一樣的情形。」

馬克思對於議會主義這一種可注目的批評（在一八七一年批評的），正是被現在佔優勢的社會愛國派和機會主義者所「忘却」了的。現在一般內閣的關員們，議員的職業家們，「實際的」社會主義者，以及無產階級底叛徒們，把一切對議會主義的批評，都諉之於無政府主義者；他們便站在這樣巧妙的一個立場上來宣言，說一切加諸議會主義的批評，都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批評。在很多「先進」的議會政治的國

家中，無產階級因為痛惡像謝得曼(Scheidemann)達徹特(David)李謙(Lesien)珊伯(Sembar)列拿特爾(Renaudel)亨特爾遜(Henderson)萬合威爾特(Vandervelde)斯道寧(Stanning)柏蘭廷(Branting)畢沙拉底(Bissolati)等輩一類的那種「社會主義者」，所以逐漸逐漸地去同情於無政府派的工團主義，雖然後者也祇是機會主義的同胞兄弟而已，這種現象實在是絲毫不足為奇的。

但是，革命的辯證法對於馬克思，決不是像樸列哈諾夫，考茨荃等一輩人所慣用的那種空虛而時髦的華詞與廢話一樣的。

馬克思能夠毫不容情的與無政府主義者決裂，因為無政府主義者甚至在他們所處的環境不是一個革命形勢的時候，也不知道去利用資產階級議會主義的「豬圈」；可是同時，馬克思又對於議會主義加以一種真正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批評。

每隔數年把統治階級裏那些憑藉議會來欺凌壓迫人民的分子來決定一次——這便是資產階級議會主義的本質，不僅在國會制的君主立憲國家是這樣，即在最德謨克拉

西的共和國家中也是這樣。

但是，如果我們提到國家這一個問題，如果我們把議會主義看作是國家的一個組織，那麼，從無產階級在這一方面所應有的任務之觀點上來說，則除了議會主義之外還有什麼出路？怎樣能夠不要議會主義？

我們要再三反復地聲明：馬克思根據對於巴黎公社事件研究所得的教訓，完全被人們忘却了；以至於現代的社會民主黨人（應該讀作「現代社會主義的叛徒」），除了無政府主義或反動派對議會主義的批評而外，便完全不知道任何別的批評了。

關於議會主義的出路，當然，我們的方法並不是取消代表機關和廢除選舉制，而是要把「談話會」式的代表機關變為實際的「工作」的團體：「巴黎公社不應作為一種議會的集團，而是立法和行政同時兼任的一種工作機關。」

「不是議會的而是工作的機關——很明顯的，這是對準着現代的議會主義，和主張議會主義的社會民主黨的「小狗們」講話的。我們舉任何一個實行議會制的國家

來作例子：不論是美國或瑞士，法國或英國，挪威等等的國家，牠們政府裏的「國家大事」都不過是在後台先解決好了，然後由內閣的各機關，法官們和部員們來執行罷了。而在議會裏僅僅是藉空談的形式，來達到他們愚弄「普通人民」的特殊目的而已。

這在俄羅斯共和國裏也是如此，在我們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共和國，雖說一個真正的議會還沒有實現，但是所有議會主義的真正趨向，却已經明白的宣示於民衆了。這些腐肉似的英雄們，如斯可比賴夫 (Skobeleff)，采雷太爾，威爾諾夫和奧克遜切夫 (Aksenteff) 等，甚至於還要設法來腐化蘇維埃，使蘇維埃成爲最腐敗的資產階級議會主義的一個模型，使蘇維埃成爲專供空談的談話處。

這班有權力的尊貴的「社會主義」的閣員部長們，在蘇維埃裏面用種種語言和決議案來愚弄那些信任他們的農民。在政府裏面，他們不斷的玩着一種對偶式「跳舞」(Quadrille) 的把戲，一方面他們就想盡可能的去拉社會革命黨人和少數黨人來分

享這個「肉饅頭」，來多佔一些有利而高貴的位置，另一方面他們還可以藉此來移開人民之注意。實際上所有真正的「國家」大事，都是在事務處和參謀部中進行着的。

統治政黨（社會革命黨）的機關報「民事」（*Delo Naroda*）最近在一篇論文中十二分直白地承認在「好社會」中的人們，全體都在從事於政治上賣淫的勾當，甚至在那「社會主義者」（恕我用這個名詞的失當！）的內閣各部中，所有官吏的機關都依舊一樣的存在着，牠們的工作也同從前一樣，牠們也同從前那般毫無顧忌的來阻撓每一個革命的企圖。其實，即使沒有他們這一種的承認，難道社會革命黨人和少數派之參加政府的實際，歷史就不能證明這些事實了麼？這不過證明了當時在內閣集團中的民主立憲黨人（*Cardels*）如威爾諾夫，孫齊諾夫（*Zensinoff*）路桑諾夫（*Pourassanoff*）以及民事報編輯部的諸位先生們，把廉恥都完全喪失乾淨了，所以他們就毫不害羞的來宣佈，說在「他們的」內閣的各部中，萬事一皆如舊：一若這是一件瑣

層的小事一般。用革命民主一類的話來欺騙一般鄉民，用官吏和政府機關的裝飾品來爲資本家謀利益——諸位在這裏就可以見到現在「負有盛譽」的聯合內閣的本質了。

巴黎公社採用了新的制度，以代替資本主義社會之賤賤的議會主義，在這種新的制度之下，思想言論的自由，就不只是一句欺人的謊話了。因爲代表們必須自己工作，必須自己執行他們自己的法律，必須自己來檢察實際行動中所得的結果，而且還必須自己直接來對選舉者負責。

代表制此時還是存在着，可是議會主義作爲一種特別組織，作爲立法和行政兩種職能的分工組織，以及作爲議員們設置一種特權位置的組織等等的情形，現在却統統沒有了。

沒有代表制，我們不能夠想像有一個德謨克拉西的存在，甚至也不能有一個無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存在；但是，如果我們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批評不單是空言，如果

推倒資本家的統治是我們的重大和真實的目的，而不是爲獲得工人們投票的「選舉時的口號」，如少數派和社會革命黨人謝得曼，李謙，珊伯和萬台威爾等輩所做的那種行爲一樣，那麼，我們可以而且應該實現一個沒有議會主義的德謨克拉西。

當我們講到巴黎公社和無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所需要的那些官吏們之職務時，馬克思拿這些官吏來與「其他各種雇主」的工人們相比，就是說與普通資本主義各種企業中的工人，工頭，職員等人相比，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馬克思絕對沒有一點烏托邦思想的痕跡，他絲毫沒有要發明或幻想一個「新的社會」。他絕對不是這樣的。他把從舊社會誕生新社會，從前者的形式過渡到後者的形式，作爲一個科學的歷史發展的過程來研究。他利用無產階級羣衆運動的實際經驗，兩端力設法去從這經驗中取得實際的教訓。

他從巴黎公社中「學得」經驗，正如同所有過去偉大的革命思想家們，毫不恐懼地去學習許多被壓迫階級廣大的革命運動的經驗一樣的。他從來不向他們講過一句

迂腐的「訓語」，如像撲烈哈諾夫說：「他們不應該訴諸武力」，又如采雷太爾說「一個階級必須知道自己約束自己。」

關於把各處所有的官吏制度立刻徹底消滅這一點，我們是談不到的。這是一種烏托邦。但是一舉而把舊的官僚機關打破，而立刻開始建設一個新的組織，使我們漸次能夠消滅官僚制度——這並不是一個烏托邦，這是巴黎公社的經驗，這是革命的無產階級之直接的必然的任務。

資本主義把「國家」的行政任務簡單化了。牠給予我們以推翻這種專制的統治而急轉直下的造成無產階級的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用全社會的名義來僱傭「工人，監工，職員」等等之可能。我們不是烏托邦者，我們絕不任意夢想如何把一切的管理機關和一切的從屬立刻廢除掉去；這些都是由於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缺乏了解而發生的一種無政府主義的夢想。他們根本上對於馬克思主義全然是門外漢，而事實上他們祇是把社會革命延遲下去，「直到現在的人類變更之後」。我們不是這樣，我

們是要用現在的人類來從事於社會革命：現在的人類要是沒有從屬，沒有管理，沒有「監督員和事務員」，便一切事體都不能進行了。

但是，對於被掠奪階級和勞動羣衆的武裝前路——無產階級——是必須服從的。國家官吏之特別的「指揮權」，是可以並且必須——于二十四小時內——立刻用管理員和事務員的簡單職務來代替牠，這些職務已經是一個普通市民的能力所能勝任的，並且給予和工人的工資相等的薪金，也就可以完滿的執行了。

我們必須在資本主義已爲我們建設起的生產組織之上，來組織大規模的生產。

我們勞動者要依靠我們勞動者自己的經驗，我們必須自動的建設起一個堅固不拔的鐵的紀律，而用武裝工人的政權來支持牠；我們必須把國家官吏的職務減輕到只是執行我們的訓令的一個地步；他們必須是負責的，可以撤消其職務的，而且是報酬微薄的「管理員和事務員」（自然技術上的智識有各種不同的類別和程度）。這是我們無產階級的任務。當我們完成了無產階級革命之後，我們可以而且必須開始執行這一個

任務。

有了這樣一種以大規模生產爲基礎的執行任務之始基，所有的官吏制度便將自然而然地漸趨於凋殘，使一個新的制度逐漸地創造出來；在這個新制度之下，沒有類似工錢奴隸制的存在，在這個制度之下，監督和登記一類的職務不斷的簡單化，這種職務將由社會全體人員輪流去執行；將來這種工作都將成爲習慣，到了最後，人類的特殊階級的特殊職務也就沒有了。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一個聰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曾稱「郵局」爲社會主義制度的模型。這是很對的。現在的郵局是在國家資本主義壟斷下組織起來的一種企業。帝國主義正在逐漸地把所有的托辣斯變爲同一形式的組織。在那般工作過重，而還是挨着飢餓的「普通」工人們之上，也存在着同樣的資產階級的官僚。但是社會的管理組織，現在已經預備好了。我們祇須去打倒資本案，用武裝工人的鐵手去壓服這些剝削者的反抗，去打破現代國家的官僚機關——而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已

經存了一個沒有「寄生蟲」束縛而高度技術化的機關，這機關可以由團結着的工人們親自來管理，他們可以僱用他們自己的技術顧問，他們自己的監督，他們自己事務員，而付給這一切的「國家」官吏以普通工人的工資。這是關於所有托辣斯的一個具體的，實際的，而且立即可以實現的任務。這個任務能夠解除工人們的剝削，能夠把巴黎公社所給予我們的經驗（特別是關於國家改造的工作中的經驗），實際的應用出來。依照郵局的制度去組織我們整個的國民經濟，而要使所有的技術專門家，管理員，事務員以及一切被僱傭的人們，都不能得到超過一個工人的工資數目的薪金，並且要使社會全體人員都在武裝的無產階級統率 and 領導之下——這便是我們眼前的目的。這樣的一個國家，和這樣的一個經濟基礎，才是我們所需要的。這樣才能破壞議會主義而依然保留着代表制度。這樣才能從資產階級的賣淫制度之下來解放勞動階級。

第四節 國民統一的組織

「……在巴黎公社的國民組織之短短的綱領上（這個綱領，公社當時沒有時間繼續發揮下去）十分明顯地說：公社應該成爲一種政治形式甚至是一個極小的村落的政治形式。……從公社中應該選出巴黎的「國民代表」來。……」

「……當時中央政府還保留着爲數不多，而意義很重大的幾種職務，是不應該廢除的（這個說法實在是有意的欺騙），而應該轉交給公社的人員——就是能夠嚴格負責的官員們。……」

「……國民統一是不應該破壞的，反之，牠是應該藉公社制度的方法組織起來的。國民的統一要在國家政權破壞之後，才能成爲事實。這個國家政權自認爲是國民統一之體現，牠却願意離國民而獨立，並且願意超立於國民之上，實際上這個國家政權不過是國民身上的一種寄生的贅疣罷了。……」

「我們的任務是這樣：在把舊政府的純粹的壓迫機關截去了四肢的時候，我們要從超越社會之上的政權方面，把合法職權奪取過來，交給社會負責的公衆們

現代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者，對於馬克思這些話不了解——或者可以更正確些說不願意了解——到怎麼一種程度，關於這一點在叛徒柏恩斯坦所著的「社會主義原理與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書中說得最明白了。這本書同是海羅斯拉託斯（H. Gerodtstratus）的著作一樣著名的，一樣不名譽的。柏恩斯坦所說的正是關於上面所引的一段馬克思的話，他在自己那本著作上這樣說：這個政綱「就其政治的內容上，從牠所有的重要點上看來，很類似普魯東的聯邦主義……不管「小資產者」的普魯東（柏恩斯坦把小資產者一字括以引號，在他的意思以為藉此以示諷刺）和馬克思的不同之點有多少，可是在這幾點上，他們兩人的思路是幾乎完全相同的。」柏恩斯坦接着又說：「自然市政自治制的重要現在正在增長着，但是『我覺得很懷疑，是否德謨克拉斯的第一個任務，是將現代的國家機關照馬克思和普魯東所想像的那樣，把牠來消除了；將牠的各種組織也像馬克思和普魯東所想像的那樣，來把牠完全變更了——依牠

們兩人的意思，就是說由各省和各區的議會代表組織國民會議，而省和區的議會却又是由公社的代表來組成的，——這樣便能把國民代表制的舊方法完全消滅了。……

』（見一八九九年德文版原書第一三四至一三六頁。）

這樣把馬克思關於「破壞寄生蟲式的國家」這一個主張來和普魯東的聯邦主義混爲一談，這真是令人駭怪！

但是，這並不是偶然的，因爲機會主義者的頭腦裏，從來沒有想到馬克思在這裏並不是說以聯邦主義來反對中央集權制，而是說要破壞存在於所有資產階級國家裏的資本家之政府機關。

機會主義者所能想得到的，不外乎「市政自治制」，這是他們在自己周圍的資產階級的公民社會裏，和「改良主義」的淤積中所能看得到的東西。至於無產階級革命，機會主義者簡直不知道怎樣去想像。

這是很可笑的。然而這裏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關於柏恩斯坦所說的一點，從

未有人起來爭論過。很多駁斥柏恩斯坦的人，——特別是在俄國文壇中的樸列哈諾夫和西歐文壇中的致茨基——從來沒有對於柏恩斯坦這一個對於馬克思的曲解，加以一些辯駁過。

機會主義者關於怎樣站在革命方面去着想，和怎樣去思念革命，已經忘却完了，以致於把「聯邦主義」來誣諸馬克思，並且把馬克思和無政府主義的開山祖普魯東來混合爲一；雖然，他們也熱烈地願意做正統派的馬克思主義者，並且擁護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但是致茨基和樸列哈諾夫對於這一點始終是不置一辭！這就是致茨基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不同點，所持的最庸俗的理論根源之一。而關於這一點，我們以後還要加以討論的。

在上面所摘引關於馬克思論及巴黎公社經驗的一段文字裏，並沒有一點聯邦主義的痕迹。馬克思真正同意於普魯東的幾點，機會主義者的柏恩斯坦完全沒有看見，而馬克思和普魯東之間的不同點，柏恩斯坦却認爲相同。馬克思與普魯東相同的

地方，就在於他們都主張「破壞」現時的國家機關。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普魯東和巴枯甯都在內）這一種相同的見地，機會主義者和攷茨基都不願意知道，這就是因為關於這一點，機會主義者和攷茨基主義者是與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的。

馬克思在聯邦主義（並不講到無產階級專政）一點上，和普魯東與巴枯甯都有區別，聯邦主義在原則上是無政府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思想之直接的產物。而馬克思是一個中央集權主義者。在上邊所摘引的一段議論中，他並未離開中央集權的立場。只有那些充滿了資產階級對國家的迷信觀念的人們，才能把資產階級國家的破壞誤認為中央集權的破壞。

但是，假使無產階級和貧農把國家的政權握在他們自己手裏，把他們自己都組織在公社之內，將所有公社的行動聯絡一致，藉此以向資本進攻，以壓服資本家的反抗，以至於把鐵路，工廠，土地以及其他的私有財產交給全體國民，全體社會，難道這不是中央集權制麼？難道這不是最確實的民主的中央集權制麼？難道這不是無產

階級中央集權之所在麼？柏恩斯坦僅僅不能理會到有自動的中央集權之可能，有由許多公社自動結合而組織一個國家之可能，和有由無產階級的公社自動的聯合起來，從事於破壞資本家的統治，和資產階級的政府機關之可能。

柏恩斯坦同一般的俗學之輩一樣，他所能夠想像的祇是一種由上而下的中央集權，只有官僚主義和軍國主義才能維持的一種中央集權制。

馬克思好像預知他自己的思想有被曲解的可能一樣，而特意加重地說：凡是非難公社，以為公社要破壞國民統一和取消中央集權，這便是一種故意的奸詐。他特意地用「組織國民的統一」一句話，要把覺悟的無產階級之民主的中央集權制，來與那資產階級的軍事的，官僚的中央集權制相對壘。

但是沒有一個人會比不願意聽的人更響些。現代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者，却無論如何不願意聽關於國家的破壞和寄生蟲的消滅這一類的理論。

第五節 寄生蟲式的國家之破壞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已經引用過馬克思的話了，現在我們再把牠來補充一些。

馬克思說：「歷史上新的創設，普通所遭遇的命運常是這樣：牠每每被人指爲抄襲舊的，又因那些新的創設多少有些與舊時的社會形式相類似，因此牠就甚致於被人誣爲社會生活中之已死亡的形式。因此這個破壞現代國家政權的新建設的公社，也就被人看作中世紀時代的公社之復活，或被人看作許多小國家的一個聯邦（如孟德斯鳩和基郎特黨人 Girondins 等所夢想的），或被人看作古代用以反對過渡的中央集權的一種誇張的爭鬥形式……公社的組織法要把一切寄生在社會上妨害社會自由發展的寄生蟲——即所謂「國家」——所併吞的勢力，仍舊都歸給社會。如果能夠做到這樣，法國的革新便可以促進了。……」

「公社的組織法要使鄉村的生產者受各區主要城市之精神上的領導，並且從城市工人中間獲得代表他們利益的自然的保衛者。公社本身的存在當然包含着地方自治；但是在性質上這裏的地方自治，已經不是用來對抗國家政權了，因爲

國家政權這時已經成爲殘餘物了……」

「消滅國家政權」，消滅「寄生的贅疣」式的國家，「斬截國家的四肢」「破壞」國家，以及「國家的政權現在已經成爲殘餘物了」，……這些都是馬克思在估量和分析巴黎公社經驗時，關於國家問題所慣用的一類詞句。

這種種詞句，都是馬克思在半世紀以前所寫的，現在人們應該把牠開掘出來應用，以便把真實的馬克思主義介紹成爲羣衆的智識。當馬克思在世的時候，他從上次大革命的觀察中所獲得的結論，已經在這正當無產階級大革命到來的時代，被人們忘却了！

「對於巴黎公社解釋之繁多，及其所表顯的利益之分岐，證明了公社是一個十二分柔弱易御的政治組織，可是一切舊時的政府，在本質上都是壓迫人的組織。公社之真正的意義是在：牠在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反對佔有階級的鬥爭的結果，是最後發見而能完成勞動階級本身的經濟解放的政治形式。

「要是沒有後面這一個條件，公社的組織法便沒有實現的可能，而且是一個幻想。」

烏託邦社會主義者忙着想去「發明」一種使社會主義的社會改造可以實現的政治形式。無政府主義者則對於任何政治形式的問題都迴避不談。現代社會民主黨的機關主義者，採用了資產階級議會主義的德謨克拉西國家的政治形式，而認為不可超越的界限；他們在這個偶像之前祈禱，碰破了他們的額頭，並且把每一個破壞這種政治形式的企圖，都斥之為無政府主義。

馬克思從社會主義和政治爭鬥的全部歷史中推斷出來，國家是必然會消滅的，而國家消滅之過渡時期（從有國家到沒有國家的過渡時期，）的政治形式，就是「無產階級組織起來成為統治階級」的政治形式。但馬克思並未會去從事「發明」一個未來時期的政治形式，他只是對於法國歷史及其分析，以及從一八五一年所得的結論

——現在的發展是向着資產階級國家機關之破壞的道路上走——加以精確的觀察罷了——當無產階級的民衆運動爆發的時候，雖然這個運動是失敗的，短命的，而且彰明較著是孱弱的，然而馬克思却開始去研究這種運動所發見什麼政治形式的這個問題了。

公社便是無產階級革命「最後發見」的政治形式，在這個形式之下，勞動者的經濟解放是可以進行的。

公社是無產階級革命打破資產階級國家的第一次的企圖，並且成立了「最後發見」的政治形式，這個政治形式是可以而且必須來代替已破壞了的國家機關的。

我們在後面可以看到俄國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在不同的環境之中，和各異的條件之下，已經繼續了巴黎公社的工作，並且證實了英才馬克思的歷史分析實在一點不錯。

第四章 恩格爾斯補充的說明

馬克思關於公社的意義，曾給我們一些基本的觀念。恩格爾斯對於這一點也再三加以申說，來闡明馬克思的結論和分析，有時又把這問題的另一方面解釋得明瞭而有力，使我們不得不對於這些解釋，特別加以討論。

第一節 「居住問題」

恩格爾斯在他的「居住問題」一書（一八七二年出版）中，就已經估計到公社的經驗，他再三地申說革命對於國家的任務問題。我們看來覺得很有興趣，在這樣一個具體的問題上，很明白地表示給我們看：一方面，無產階級國家的特徵與現代國家的特徵有許多類似之點，因了這些類似之點，就使我們把這兩種都稱為國家；而在他方面，無產階級國家又有一些不同的特徵，或者可以說牠是消滅國家的一個過渡

時期。

「怎樣才能解決居住問題呢？在現代的社會裏，解決這個問題是完全與其他任何社會問題一樣的，就是說，要用使經濟上的供給和需求漸漸均等的方法來解決的。可是這種解決問題的方法，自身不斷地在那裏產生新的問題，就是說，牠並不能解決任何的問題。社會革命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不僅是要看時間和空間的情形而決定，而且這問題還與那些更深遠的問題相聯繫的。在這些深遠的問題當中，最主要的一個便是消滅城市與鄉村間的差別。我們既然不願用烏托邦的空想，來談論關於將來社會的構造，就用不着在這一點上浪費時間了。不過有一件事是確實無可疑的，就是現在的大城市中，住宅是很充足的，是可以滿足一切實際的需要，只要人們應用得合理。但是很明顯的，要實現這一點，必須把現在的房主趕走，將他的屋子讓出來，叫那些沒有房子住的或住在房客過多的屋子裏的工友們搬進去。當無產階級一旦得了政權之後，這種以社會利

益爲基礎的辦法，立刻就像現代國家之實行一切剝奪和佔據房屋一樣的容易執行了。（一八八七年出版德文版第二二頁）

這裏我們所觀察的，並不是國家形式的變遷，而只是講牠的活動的內容。沒收和佔領房子，即在現時的國家也用命令來實行過的。無產階級的國家，從牠的形式上看來，也要下令沒收住宅和佔領房屋的。但是很明顯，那舊的執行機關，那與資產階級官僚的勾結主義，一旦到了無產階級國家的命令施行時，就完全都不適用了。

「在這裏我們必須說明，勞動民衆的真正奪取一切勞動工具及一切生產機關，是與普魯東派的『贖取』完全相反的。依照普魯東的制度，每個工人都變爲一所住宅，一個小有產者的一塊土地，以及勞動工具的主人；但在前一種的制度之下，却是勞動民衆整個的變爲一切房屋，工廠，和勞動工具之集體的所有者。這些房屋，工廠等等的使用權，無論如何，在過渡時期以內，是難以給予個人

或私人團體而不徵租金的，根據同樣的理由，所以取消土地私有權就不一定要取消地租，不過用不同的形式將地租交給社會罷了，所以勞動羣衆雖實際上佔有了

一切勞動工具，可是租讓權的保存却並未因此廢除』（六十九頁）

我們在下一章將討論這裏所提及的問題，就是關於國家「衰亡」之經濟基礎的問題，恩格爾斯關於這一點表示很慎重。他說無產階級的國家「無論如何在過渡時期以內」，是「難以」把房屋分配給私人而不收租金的。租賃全國國民所有的房屋與某家，而課以一定的租金，這樣租賃房屋就可以徵收得這筆租金，同時也就必須有一定的管理權，並且須有一定的標準來指揮房屋的分配。凡此一切，都要求一個某種形式的國家，可是這並不是說，就要一種特殊的軍事和官僚機關，以及一般站在特權地位上的官僚們。所以在達到租房屋可以免費的那個地步，就要非等到國家完全「衰亡」不可。

講到布朗吉主義 (Blanquisme) 在公社革命後，從經驗中得着教訓，而接受馬克

思主義一般的原則這一點，恩格爾斯約略的把這些原則說來有如下面的一種方式：

「無產階級的政治行動以及無產階級專政，是到無產階級以至於國家消滅的過渡階段中所必需的」。 (五十五頁)

那般愛好作吹毛求疵的批評的人們，或是那般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之劊子手」，對於承認「國家之廢除」，和拒絕上面所述之關於「反對杜林」的引證中的那種定則之間，在他們看起來也許是矛盾的。假使機會主義者把恩格爾斯也列入無政府主義者的行伍中，這也並沒有什麼奇怪——橫豎現在一般社會愛國派誣國際主義者爲無政府主義，也日益普遍起來了。

至於講到階級之消滅，國家亦將隨之而消滅——這是馬克思主義所常常告訴我們的。從「反對杜林」一書中所摘取關於「國家衰亡」的一段最著名的引論，不是僅僅指斥無政府主義者之主張廢除國家，而是指斥他們宣傳廢除國家這回事，可以「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完成的那種謬論。爲要明白今日盛行的社會民主派關於馬克思主

義對無政府主義關係的學說，以及關於廢除國家這門問題的學說之完全曲解起見，我們就得回憶起馬克思和恩格爾斯對無政府主義者的一次論戰，這是於我們特別有益處的。

第二節 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這次論戰是發生於一八七三年，馬克思和恩格爾斯在意大利一種社會主義評論中，曾登載過一些論文攻擊普魯東主義的自治派或非權力派。到了一九一三年，這些論文才有德文譯稿發見於新時代報上，

馬克思譏諷無政府主義者之否認政治行動，他說：

「假使工人階級的政治爭鬥採用一種革命的形式；假使工人們建立自己的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以替代資產階級的專政，那末，他們就犯了一種反原則的可怕的罪惡了；因為他們爲要滿足那些可憐的粗俗的日常需要，和爲撲滅資產階級的反抗計，就不能放棄他們的武裝，亦不能廢除他們的國家，而予國家以一種革命

的過渡的形式」。 (新時代雜誌一九二一—二四年，第一卷第四十頁)

這樣的一種國家之「廢除」，是馬克思在駁斥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中所竭力反對的。馬克思並不反對階級消滅，國家也隨之而消滅的理論；或階級廢除，國家也隨之而廢除的理論，而只是反對那主張工人們應該拒絕自己的武裝，應該拒絕自己的武

力組織，即是說應該拒絕運用國家的力量來「撲滅資產階級之反抗」的一種提議。

馬克思特意指出那「革命的過渡的國家形式」對於無產階級是必要的一點，以勸人們把他對於無政府主義爭鬥的真正意義加以曲解。無產階級需要國家，只是短時期的，我們完全沒有反對無政府主義者以消滅國家為最後目的的意見。但是我們肯定的說，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暫時的使用國家政權的武器和手段去反對剝削者；同樣，為要消滅階級，也必須暫時的建立被壓迫階級專政。馬克思選擇了一種最銳利最明顯的說法，來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立場。剛從資產階級的羈絆下解放出來的工人們，應不應該就「放棄」他們的武裝呢？ 應不應該就利用他們的武裝，來反對

資產階級，以撲滅他們的反抗呢？假使一個階級有組織的來使用牠的武裝，去攻擊別一個階級，那不是「過渡形式的國家」是什麼？

讓每一個社會民主黨人自己問一問自己：在你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中，你對國家問題所提出的主張是不是這樣的？第二國際領導之下的大多數社會黨，對於這個問題所提出的主張是不是這樣的？

恩格爾斯將這同樣的意思發揮得更加詳盡，並且更加通俗，他首先深刻的指出普魯東派的錯亂思想，這班普魯東派自稱是「非權力主義者」，這就是說，他們是反對一切威權，一切服從以及一切權力的。恩格爾斯說：拿一個工廠，一條鐵路或一隻海船來說，是不是很明顯的，如果沒有某種服從機關和某種權能或權力，能不能把那建築在機器之應用，和許多人有計劃的共同合作之上的複雜的技術事業運用起來呢？

恩格爾斯又說：「假使我們用這種理論來反對那些完全失望的非權力主義者，那時他們只能用以下的答詞來強辯：「哦，那固然是的，但這問題是，我們所給我們的

代表的，不是什麼威權，而是某種委員會」。這些人以爲一件東西只要改了名字，便連內容也變更了」。

恩格爾斯既然這樣表明了，說威權與自治不過是相對的名詞，這些名詞的應用範圍是依照社會發展的各方面而有變更，若把牠們看做絕對的名字便完全不對了；他又加上說，大規模的生產和機器應用的範圍是日見擴大；以後他就從威權問題的一般討論上進而論到國家的問題。恩格爾斯說：

「如果自治派單單是說，將來的社會組織，只有在產業的條件所必然需要的限度之內，纔允許威權的存在；那末，我們還可以跟他們談一談，要他們了解。但是，凡是需要威權的事實，他們都瞎着眼睛不睬，他們只是狂熱的反對一個名詞而已。

「那些非權力主義的先生們，爲什麼不限制他們自己，單單的高呼反對政權，反對國家呢？一切社會主義者都承認，在將來社會革命成功以後，國家以及

政權通通要消滅，這就是說，公共的職權將要失掉了他們的政治性，而要變成與社會利益有關的單純的管理職權了。但是非權力主義的先生們，都要求應該把國家一下就廢除，甚至在產生國家的社會關係尚未廢除以前，便要廢除國家。他們要求，社會革命的第一個舉動就是廢除一切威權。

「這一些大人先生們，他們究竟看見過一次革命沒有呢？革命毫無疑義的是最有威權不過的事情。革命是一種行動，在這種行動中，一部分民衆用長槍，刺刀，大砲，這就是說，用最有威權的方法強迫別一部分人服從他們自己。

戰勝者必然要拿武裝威嚇反動派的方法以維持其政權。假使巴黎公社不靠着武裝人民的威權去反對資產階級，他能夠支持一天以上麼？其實巴黎公社並沒有充分的使用這種威權，這個我們不可以責備牠麼？所以，那些非權力主義者或者不明白他們所說的是什麼，那樣，他們就越發糊塗；或者他們明白他們自己所說的是什麼，那樣，他們就是出賣無產階級。無論哪一樣，他們只不過是侍候

反動派的眼色罷了」。(三十九頁)

在這討論中已經提到了新的問題，這些問題必須和國家「衰亡」時候的政治上與經濟上相互關係的問題（下一章便談這問題）一同探討。這便是公共職權的性質的轉變——從政治的到單純管理的——以及「政治的國家」之性質的轉變問題。「政治的國家」這個名詞特別容易引起誤會，牠是表示國家「衰亡」的過程：垂死的國家，在牠凋殘的某一時期，便可叫做非政治的國家。我們所引用恩格爾斯著作中的最顯著的一點，也就是恩格爾斯用來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態度。社會民主黨人，想要做恩格爾斯的門徒，從一八七三年以來就和無政府主義者爭辯了數千次了，但是他們一點不像馬克思主義者所能爭辯所當爭辯的。無政府主義者關於廢除國家的觀念是混淆的，是非革命的——這就是恩格爾斯批評的話。無政府主義者所不願意看的，正是這種革命的發生與發展，以及其與暴力威權，權力，及國家有關係的特殊的問題。現代社會民主黨對於無政府主義者通常的批評，純粹是中產階級的小氣話：「

第四章 恩格爾斯補充的說明

我們真的承認國家，而無政府主義者却不承認」。這樣的小氣話自然不得不讓任何稍有思想的革命的工人討厭了。

恩格爾斯的意見就完全不是這樣，他堅定的說：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承認國家的消滅是社會革命的結果。隨後他就提出革命的具體問題；這個問題正就是機會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人平時所避去，而專門讓給無政府主義者去「解決」的問題。恩格爾斯很果斷的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公社是不是應該更多的使用國家的革命政權，也就是說，使用武裝的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政權呢？

現代佔優勢的正派的社會民主黨人，對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之具體的任務問題，平常不是發出一種虛浮的下流的譏諷，至多便是用下面的一個遁辭來搪塞說：「我們等一會兒再看罷！」因此，無政府派就抓住了把柄來攻擊這班社會民主黨人——責備他們放棄了在革命中教育工人階級的責任。

恩格爾斯利用最近這一次無產階級革命的經驗，就是爲了要從這經驗當中，獲得

關於無產階級對於銀行與國家應採取何種行動，以及怎樣去採取這種行動這些問題之最具體的知識。

第二節 給培培爾的信

下面所摘錄的是恩格爾斯在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至二十八日給培培爾的信中的一段，是要算馬克思和恩格爾斯關於國家問題的著作中最顯著的一段議論了。我們要附帶的說明，就我們所知，這封信第一次是由培培爾刊印於他的『我的生活』那部回想錄的第二冊中的，這部回想錄是刊行於一九一一年，也就是說，在這封信寫就及郵寄之後的三十六年。

恩格爾斯在那封給培培爾的信中，批評到馬克思在致勃拉克 (Bracke) 的有名的信中所曾批評過的哥達綱領的草案。而且他把國家問題特別地提出來講，他這樣說：

「……自由人民的國家變為自由的國家了。從這幾個字的文法的意義上講，

自由的國家，就是國家在牠對於公民的關係上是自由的，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專制政府的國家。其實我們最好把這一切關於國家的空談都丟開不提，尤其是在巴黎公社以後可以不談。因為從國家這個名詞的原來的字義上講，牠當時已經不是一個國家了。無政府主義者每每拿「人民的國家」這句話來塞我們的嘴，雖在馬克思及普魯東的著述中，以及共產黨宣言中，早已經十分顯明的說過，國家是要隨著社會主義的社會結構之開創而自行解體 (Zihsauflöset) 和消滅的。既然國家不過是我們在革命的爭鬥中，以使用強力來壓服敵人的一種臨時的過渡組織，那末，說什麼「自由人民的國家」實在是荒唐之至的。在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期中，牠並不是爲了自由的利益，而是爲要壓倒牠的敵人；到了人們真正能夠說到自由的時候，這樣的一個國家就已經不存在了。所以我們提議無論在何處都用 (Gemeinwesen) 這個好的德國古字，來替代「國家」這一個名詞，這個德國古字的意思，與法文中的「公社」(Commune) 是相同的。

(見德文原稿第三二二頁)

我們應該記着，這封信是關係於黨綱的，而這個黨綱是被馬克思在別一封信中所批評過的，這信僅在恩格斯那封信的幾個星期（馬克思的信是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寫的）以後，恩格斯與馬克思一同在倫敦居住，因此，當他說「我們」，自然無疑的是恩格斯拿他自己和馬克思的名義向德國工黨的首領提議，將黨綱上的「國家」字樣取消，而代之以「公社」的字樣。

我們可以聽到迎合機會主義者之需要的，新式「馬克思主義」的首領們，將怎樣的叫喊着「無政府主義」，如果有人向他們提議在黨綱上做這樣的修改！

讓他們狂叫罷！資產階級還要褒獎他們呢！

可是我們還是要做我們的事。我們在審查我們的黨綱的時候，對於恩格斯和馬克思的忠告，是絕對應該注意到的，這樣，我們才能接近真理，恢復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洗清對於牠的一切曲解，以便使工人階級的解放爭鬥向着更正確的路綫進行。

第一章 恩格斯補充的說明

在多數主義者當中，一定是不會有一個人反對恩格爾斯和馬克思的忠告的。只是關於名詞上的困難，或許是在德文中有兩個字都解作「公社」，而恩格爾斯所採用的一個，並不是表示一個單獨的公社，而是表示全體公社之總和的一種公社制度，在俄文中沒有這樣一個字的，然而我們或者可以採用一個法文字（Commune），雖則這個字也有牠的不適當處。

「從字義上說來，公社已經不是國家了」。這是恩格爾斯最重要的理論的斷言。看了上面的解說之後，對於這種斷言就可以完全了解了。當被壓迫的不是大多數人民，而是少數人民（剝削者）的時候，公社就已經不是國家了，這時牠已經破壞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而人民全體自己已經起來登台，以代替一種特殊的壓迫勢力了。凡此一切，都已經離開了國家的原義。要是公社已經鞏固了的話，那末國家的殘骸，就將在這種情形之下自行「消滅」了，公社也就用不着國家的機關了：當國家機關到了無事可做的時候，牠的作用自然也就停止。

「無政府主義者每每拿「人民的國家」這句話來塞我們的嘴」，恩格爾斯講這句話的用意，大半是爲着巴枯寧及其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攻擊而發的。恩格爾斯認爲這種攻擊是很對的，因爲「人民的國家」與「自由人民的國家」是一樣的荒謬，距社會主義一樣的遙遠。恩格爾斯本擬將德國社會民主黨與無政府主義者的爭鬥之性質改變過來，使這種爭鬥，真正合乎原則，並且把那種機會主義者對於國家的偏見掃除淨盡。可惜呀！恩格爾斯這封信在書櫃中隱藏了三十六年之久。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到了這封信發表之後，考茨基依然很頑固地繼續重複那些恩格爾斯曾經警告的錯誤。

培培爾於一八七五年九月二十一日答覆恩爾格斯說：關於黨綱草案的批評，他是與恩格爾斯「完全同意」的，同時他又指斥李卜克納西的那種妥協態度。（見培培爾的傳記，德文版第二卷三〇四頁）。但是如果我們一翻培培爾的「我們的目的」那本小冊子來看，我們就可以看到對於國家問題有許多絕對錯誤的見解：他以爲「應

該把建築在階級統治基礎之上的國家變為一個人民的國家」（見一八八六年的德文版第十四頁），這是刊印在培培爾那本小冊子的第九版中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專門吸收這些不斷重複的機會主義者關於國家的見解，是不足為奇的，尤其是當恩格爾斯之革命的理解被藏匿着，而一切生活環境又都與革命「絕緣」的時候。

第四節 愛爾福特綱領草案的批評

在討論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時，一八九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恩格爾斯寫給致茨基的那個「愛爾福特綱領草案的批評」（這個綱領草案的批評是過了十年之後才在新時代雜誌上發表的），是不可忽略的，因為這個批評，主要的就是對社會民主黨關於國家的組織問題所持的機會主義觀念而發的批評。

其次我們可以看到恩格爾斯又指出了一個非常寶貴的經濟的要點，這一個指示，表現着恩格爾斯何等用心，何等深思的來研究最近資本主義之發展的種種狀態，同時他又多麼能幹的在某種程度以內，能夠預言我們的帝國主義時代的種種問題。這裏

有這樣的一個指示，是關於綱領的草案中所應用的「缺乏有整個計劃」等字樣，來說明資本主義的特質的，恩格爾斯說：

「假使我們觀察從股份公司到統治并壟斷許多整個的工業部門的托辣斯時，那末我們就可以看到，不但私人的生產停止了，而且缺乏整個計劃的那種缺點也消滅了」。（見新時代第二十卷一九〇一——二一年第八頁）

這裏已經有了最近的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之理論的估計，就是說，在這種制度之下，資本主義已變為壟斷的資本主義了。這個事實，我們必須加重說出來的，因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觀點之最普遍的一種錯誤，就是他們以為壟斷的資本主義，或國家的壟斷資本主義，已經不是資本主義了，已經可以稱為「國家的社會主義」，或其他同類的名詞了。一個完全計劃化的生產組織，當然托辣斯是從來沒有，而且永不會有的。但是，無論他們有何種整頓的計劃，無論資本主義的偉人們怎樣精密的能夠計算國內，甚至國際範圍內的生產規模的大小，無論他們怎樣有計劃的來調節他們的

生產，我們終還是生存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的人們；果然不錯，現在是資本主義之最後的一個階級，可是毫無疑義的，牠終究還是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接近，在無產階級的真正代表看來，應該認為是用來解說社會革命之行近，容易實現，以及急迫的需要的證據，而並不是一個拒絕社會革命的理由，也並不是一般改良派所慣施的美化資本主義的企圖。

但是，要是回轉來講到國家的問題，恩爾格斯曾經給考茨基三個非常有價值的指示：第一，關於共和國的問題；第二，民族問題與國家組織之間的關係問題；第三，是地方自治問題。

恩格爾斯以共和國的問題，拿來做他的「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批評的重心。要是我們還記得當時愛爾福特綱領在國際社會民主黨中的作用，以及牠怎樣的成爲整個的第二國際的模範，那末，我們可以毫不誇大的說，恩格爾斯在這裏批評了整個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恩格爾斯說「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個很大的缺點，有許多必須提

出的東西，牠都沒有說到」。

其次，恩爾格斯指明了德國的憲法僅僅是一八五〇年邦奇反動憲法的老本，德國國會正像李卜克納西所稱呼的，不過是「專制政體的一片無花果葉」（意即點綴品——譯者），在承認日耳曼各小國及小國聯邦之存在的憲法基礎之上，而想實現「所有生產機關變為公共財產」，這是一種很顯然的荒謬。

「提及這個問題是危險的」，恩格爾斯接着又這樣說，因為他深知，在德國要把「成立共和國的要求公開的載在綱領中，是不可能的。但是恩格爾斯還不以這種使「每人」都滿意的明顯的觀察為已足，所以他又接着說：

「但是無論用什麼方法，事情總還是應該向前進行的。到底這事的重要到了怎樣的程度，已經被現在大部分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上所廣佈的機會主義表明出來了。有些人恐怕那些反社會主義的法律的復活，或是回想起當那些法律有效的时候所發表那些不及時的宣言，于是就希望我黨承認德國現行的法制，以為

這樣可以用和平手段去實現我們一切的要求」。

恩格爾斯首先抬出德國社會民主黨害怕例外法律之復活，是一個最重要的事實，而且毫不疑慮的名之爲機會主義，他申言正因爲德國缺乏共和政體與自由，所以「和平」進行簡直是完全荒唐的夢想。恩格爾斯十分小心的，使自己在進行中不致把自己手束縛起來。他承認在一個共和國，或極自由的國家中，人們可以「想像」（僅僅是想像）和平發展到社會主義，但是在德國，他一再的說：

「在德國政府是幾乎有無上威權的，國會和其他的代表法團都沒有實權；德國的情形便是這樣，牠也沒有任何的必要把專制政體的無花果葉摘下來掩護牠自己的裸體」。……

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大多數正式的首領們，隱藏了這一個恩格爾斯的勸告，實際上就證明了他們是專制政體之真正的擁護者了。

「這樣的政策，其結局只是把黨引到邪路上去。他們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

問題置諸前列，而把那些最緊急的具體問題遮蔽起來使人不見，可是這些具體問題，在將來最先發生的重要事變和政治恐慌時期中，卻是必然要列入前列去的。

這樣一來，牠的必然的結果就是——當危急時期到來的時候，黨便完全束手無所施其技了；遇到了緊急問題擺在面前的時候，便會使黨內發生混亂和分裂，因為這些問題預先從來沒有討論過的』。

『這種爲着目前一時的利益，而忘却了重大的根本的考量，這種追求一時的成功，這種不預計未來的結果，而只顧着這種成功的爭鬥，只爲着現在而犧牲將來的運動的爭鬥，或者統統都是『誠實』的動機之結果。但是這種到底還是機會主義，而且也許『誠實』的機會主義是最危險的。……』

這裏有一點是絕對無疑的，就是——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能在民主共和制的政治形式之下才能取得統治權。這種政治制度，並且還是無產階級專政之特殊的政治形式，正像法國大革命所已經表現出來的一樣。……』

恩格爾斯在這裏特別加重的反複的說明一個基本觀念，這個基本觀念正像一根紅線似的穿過了馬克思的一切著作，這個基本觀念就是說民主共和政體，是跳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最近便的一塊跳板。因為這樣的一個共和政體，並沒有把資本的統治推翻，因此對民衆的壓迫和階級爭鬥是必然會更發展更擴大和更厲害起來的。因此，當那滿足被壓迫羣衆的根本利益之機會一旦到來的時候，這種機會就必然的會實現，而且只有取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以無產階級領導羣衆的形式實現出來了。對於整個的第二國際，這些也成爲馬克思主義中的「被遺忘了的語句」了。而這種遺忘，在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的頭半年中，少數派的歷史上是表現得異常明顯的。

關於國民的民族成分和聯邦共和國問題，恩格爾斯這樣說：

「應該用什麼來替代現在的德意志(牠有反動的君主憲法，還有一樣反動的許多小國家之分立，這個分立是足以鞏固和助長『普魯士主義』，而不能使牠在德意志國中淹沒下去的)呢？我的意見以爲無產階級只能利用一種整個而不分立

的共和國的政治形式。在今日美國廣大的境域上，那聯邦共和制整個的說來還是必需的；可是雖然這樣，牠在東部的省分內已經成爲一種障礙了。在英國聯邦共和制就成爲一種進步的現象，英國兩個海島上住着四種民族，而牠的國會雖只有一個，可是却並肩的存在着三種立法系統。在小小的瑞士國中，那聯邦共和制已經很久很久就成爲一個障礙物了；而牠之所以尙能存在於瑞士，只是在瑞士自己願意做歐洲國家制度中的一個純粹的被動分子之故。如果在德國而實施瑞士式的那種聯邦制度，那就成爲一個很大的退步。聯邦國家與統一國家有兩個不同之點，就是：聯邦國家每一個單獨的國家都有牠自己的民事和刑事的立法，有牠自己的司法制度；其次，與國民議院並肩而存的，還有一個國家代表組成的議院，在這個國家的代表議院中，每一個行政區不管是大或是小的，都得以投票選舉的。」

在德國聯邦制的政府，是達到統一國家的一個過渡階段，我們不要使一八六

第四章 恩格爾斯補充的說明

六年和一八七〇年的「上層革命」往後倒退，我們應該用「下層的運動」來完成革命。

恩格爾斯對國家的形式問題，不但毫不冷淡，而且還非常細心而盡力的去分析每一個過渡的形式，以便照着每一種形式的歷史的具體特點，來確定各種過渡形式之由來與趨勢。

恩格爾斯和馬克思一樣，用無產階級的觀念和無產階級革命的觀點，主張民主集中主義，主張統一而不可分離的共和國。他認為聯邦共和政體若非發展上的一個例外和障礙，便是君主政體與中央集權的共和政體之間的一個過渡政體，牠在某種特殊的條件之下，是一個相對的「進步」。而在這種特殊的條件中間，便發生了民族問題。

恩格爾斯和馬克思縱使鐵面無情的批評那小國家的反動性，和那利用民族問題的假面具來掩蔽這種反動性的那些具體的情形；可是他們無論在何處都沒有迴避民族問

題的傾向和痕跡——這種迴避民族問題的傾向，是荷蘭和波蘭的馬克思主義者所常犯的錯誤，雖然他們以爲那反對「他們的」小國家的資產階級，狹隘的民族主義的爭鬥，是絕對合法的。

就使拿英國來看，牠的地理的條件統一的語言，以及數世紀以來的歷史，似乎已經把牠所包含的各個單獨的小區域的民族問題解決了，——就使對於這樣的國家，恩格斯還認定民族問題尙未完全解決，是一件十分明顯的事實，他因此又認定聯邦的共和制也是一個「進步」。自然不言而喻的，這裏絕對沒有拒絕那對於聯邦共和制之缺點的批評，也沒有拒絕爲謀實現統一的，和民主集中的共和制而作的最堅決的鬥爭和宣傳。

但是恩格斯這一種民主集中制的概念，絕不是像那些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和小資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者所認識的那種官僚主義的制度。恩格斯認爲民主集中制，絕不是要把那廣大的地方自治除開，牠要把各個區域和公社聯合起來

，共同自動的維護國家的統一，以便把一切官僚主義和一切上層的「號令」都徹底消除去。

恩格爾斯從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問題的政綱觀點上發揮出來，他這樣說：

「所以我們要求一個統一的共和政體；法蘭西的共和政體並非別的，只是一七九八年所建立的一個沒有皇帝的帝國而已。從一七九二年到一七九九年，法國的每一個縣郡和每一個鄉區都享有美國式的完全的自治權；而這也是我們所應該有的。應該怎樣組織地方自治政府，怎樣能夠達到地方自治，而免去官僚主義的發生，關於這些，美國和第一個法蘭西共和國已經指示給我們看了；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其他英國的殖民地，現在也正在指示給我們看了。這樣的一種省和區的自治制，是要比瑞士的聯邦制自由得多，在瑞士的聯邦制之下，誠然，那省區對於整個的聯邦是獨立的，但是牠對於縣和鄉區的關係也是獨立的。省區的政府任命州官和縣長，這是那些講英語的國家中所絕對沒有一種現象，而在我們

的國家中，這種現象將來我們必定要完全廢止，正像普魯士廢止『Landraete』和『Regierungsraete』（就是所有由上邊任命的那般委員，警官，省長等等的官吏）。』

根據了這點，恩格爾斯擬定下面關於自治綱領的一段詞句：『各省各縣各鄉區完全的自治機關，應由普通選舉所選出的辦事人來管理，應完全取消國家所任命的一切地方和省區的政治權力』。

在那被克倫斯基政府和他所謂『社會主義的』內閣所禁閉的實話報上（第六八號，一九一七年五月出版）我已曾指出關於這一點（自然其他還有很多的地方），我們那些自命為革命的德謨克拉西者，自命為社會主義的代表們，都是很無恥地離開了德謨克拉西的原則了。不用說，這批與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勾結的人們，對於這個批評當然是掩耳不聞的。

還有一點是特別重要值得注意的，就是恩格爾斯用一些很明確的實例，來駁擊那

種非常普遍的，尤其是在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中間非常普遍的迷信。他們以爲一個聯邦共和國，必然要比中央集權的共和國更自由些。這是錯誤的。恩格爾斯所舉關於一七九二到一七九八年法國的中央集權共和政治，和瑞士的聯邦共和制的事實，已足資證明了。真正的民主集權的共和制所給予的自由，較之聯邦共和制是要大些，換一句話說，歷史上最大的地方自由，要算是中央集權共和制，而不是聯邦共和制。

在我們黨的文字和宣傳中，還很少注意到這種事實，以及整個的聯邦制，集中共和制地方自治的問題。

第五節 一八九一年爲馬克思著的「法國內戰」一書而作的序言

恩格爾斯在「法國內戰」第三版上所作的序言中（這個序言是一八九一年三月十八日所作，原文在新時代上發表過的），論到許多有興趣的國家問題。同時，他翻

於公社的教訓又做了一個很顯著的撮要。這個撮要被公社以後二十年來的經驗所證實了，而且牠是特別用來攻擊那些盛行於德國的「對於國家的迷信」，這個撮要可以很正確的看作馬克思主義對於國家問題的「最後」的詞句了。

恩格爾斯指出來說，法國在每次革命之後工人都曾經武裝起來的：

「因此，資產階級得到了政權之後的第一個先決問題，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裝。因此，在每一次由工人取得勝利的革命之後，一種新的爭鬥遂跟着爆發起來，其結果是工人失敗……」

這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經驗之結論。這個結論是既簡短而又明瞭。整個問題的實質——同時在國家問題中亦然，就是：「被壓迫階級有不有武裝？」的問題，在這裏是顯著的表現出來了。正是關於這一個重要的實質，是那些被資產階級的思想所影響的大學教授以及那些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所默不作聲的。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中，少數派有一位所謂「馬克思主義者」采雷太爾（Tsereteli）曾很光榮的（

加文耶科 Carvaigue 式的光榮)洩漏了這個資產階級革命的祕密。采雷太爾在他六月九日的「歷史上有名的」演說中，曾很昏昧的宣言資產階級已決定解除彼得格勒工人的武裝，他並認為這個決定對於國家是十二分需要的。

采雷太爾六月九日這次歷史的演說，當然是每一個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歷史家所可引來作為一種最好的證據，去證明那采雷太爾先生所領導的少數黨與社會革命黨的聯合，已經跑到資產階級的營壘中去，來反對革命的無產階級了。

恩格爾斯又提出另一個與國家問題也有關係的要點來，這便是宗教問題。人們都知道德國社會民主黨開始日益腐敗和日益機會主義化的時候，就漸漸對於那有名的公式陷于一種錯誤和虛偽的曲解了，這個公式就是：「宗教是私人的事業」。依照他們這種解釋，好像是說即使對於革命的無產階級的黨，那宗教問題也是私人的事業了。恩格爾斯對於這種正式背叛無產階級革命政綱的行爲，曾經加以反抗的。他在二八九一年只是看到了他自己黨內的機會主義很微細的萌芽，因此他就十分謹慎地

對於這問題表示他的意見：

「在公社中差不多祇有工人或工人階級所承認的代表。因此牠的律令都表現着他們堅毅的無產階級的特性。這些律令是在乎謀一些會被怯懦的共和政治的資產階級所摒棄的改善。但是，牠同時又為無產階級的自由行動造成了一個必要的基礎（因此實現了這樣的一個原則：對於國家而言，宗教僅僅是一種私人的事情了）。公社宣佈了這些法令，或者是直接有利于工人階級的，並且在相當的程度以內，牠還給舊的社會組織以一個深刻的傷痕」。

恩格爾斯是有意格外着重於「對於國家而言」這幾個字，這對於德國機會主義者不僅是一個暗示，而且是一個當頭棒喝；因為他們公然的宣說對黨而言，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因此把革命的無產階級的黨，貶降到那最平凡的資產階級「自由思想者」的行列上去了。他們一方面準備承認一種非宗教的國家，但是卻又拒絕黨來反對麻醉人民的鴉片似的宗教之一切鬥爭。

第四章 恩格爾斯補充的說明

後起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歷史家，研究牠在一九一四年之可恥的破產的根本原因，他們可以在這個問題中找到很多有趣味的材料：首先從黨的組織、首領考茨基論文中，開着大門接受機會主義的推諉的宣言開始，以至於一九一三年黨與宗教分離運動爲止。

但是我們來看一看恩格爾斯在公社二十年後給予無產階級戰士們的公社教訓的總結。

下面就是恩格爾斯認爲第一重要的教訓：

「以前的中央集權政府的壓迫政權：軍隊，警察，官僚，都是拿破崙在一七九八年所手創，而爲以後一切新政府所利用，來作爲壓迫敵人的最如意的統治工具。以前破壞於巴黎，現在在法國到處也一樣的要破壞的，就正是這個政權。

「公社不能不承認，一旦工人階級得到了政權，就不能再去使用那舊的政府

機關了；而且工人階級爲要避免失去其已得的政權計，第一，就不能不剷除那從前反對過牠的一切舊的壓迫機關；第二，就該提防牠自己的代表和官員們，向他們宣言：他們的職權是隨時可以褫奪的撤消的，沒有任何例外的；藉此以發揚公社的本身」。

恩格爾斯一再再而三的鄭重說明，不僅是君主政體，就是在民主的共和國裏，國家依然是國家，就是說，牠還保留着牠那根本的特殊的性質和現象，就是：把供職的人員變爲「社會的公僕」，和把牠的機關變爲社會的統治者。

「爲避免使國家和國家機關從社會的公僕轉變爲社會的主人起見——這種變化在一向所有的政治制度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就使用兩種有效的方法。第一，牠把所有行政，司法，和教育的職位統統都用普通選舉法選舉出來；同時選舉者得隨時決議撤消被選舉者的職位。第二，牠給予那些官員的薪金，不分職位上下，都與其他勞動者所領取的工資相等。公社所規定的最高薪金是六千佛

郎。這樣，那些獵官職和鑽營的人們就遇着了一重障礙，甚至爲代議機關的議員們創製了一種不可抵抗的命令。

恩格爾斯這裏提及了一個很有趣的「界限」，就是德謨克拉西一方面變爲社會主義，而他方面牠又要求社會主義。因爲，爲消滅國家計，必須把那些國家機關的職能變爲簡單的管理和登記的工作，這樣簡單的工作是大多數的人民所都能擔任的，到後來全體人民也都能夠擔任了。再則，爲了要完全免除政治野心家的發生，必須把那些雖然不支薪水，而却在公共機關中佔着「名譽」職位，以企圖在銀行或股份公司中佔據優越地位的人們（這些在一切最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都是常常發現的）沒有實現企圖的可能。

但是恩格爾斯沒有陷入近來少數馬克思主義者關於民族自決權問題所犯的那種錯誤；他們以爲民族自決權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是不可能的，而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卻是不必要的。像這樣似乎很聰敏，而實在完全錯誤的論調，隨便那一個德謨克

拉西的組織都會重複應用出來的，就是關於對官吏適度的薪金之支付這一點，牠們也要應用這種論調的；因為一個徹底的德謨克拉西在資本主義之下是不可能的，而在社會主義之下，一切的德謨克拉西都是要消滅的。

這是一種詭辯，正像『如果一個人把他的頭髮一根一根地丟去的話，那末，到什麼時候他才會變成禿子呢？』這個問題一樣的滑稽！

發展德謨克拉西到底，研究這種發展的形式，拿實際情形來試驗等等，這就是社會革命爭鬥中的基本任務之一。單獨的來看，沒有一個德謨克拉西主義是能夠產生社會主義的，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德謨克拉西主義從來不會『單獨來看』，而一定是和其他事物『總合起來』看的，牠怎樣影響到經濟以助成經濟的改造，同時反過來牠自己又受經濟發展的影響等等。這就是實際歷史之『辯證』的過程。

恩格爾斯繼續的說：

『這種舊的政府機關的崩敗 (Sprengeuns)，和一種新的真正德謨克拉西的

第四章·恩格爾斯補充的說明

機關之替代，在『法國內戰』第三章中已經很深刻的描寫過了。但是關於這個替代，這裏還有一兩點是有簡單加以重述之必要的，因為在德國對於國家的迷信已經從哲學方面，轉移到那整個資產階級，甚至于很多工人的意識中去了。依照哲學家的學說來說，國家就是『觀念的實現』，如果用神學的術語來講，國家便是上帝在人間的皇國，國家是真理和正義永古長存的場所。因此就產生了一種對於國家，以及一切與國家有關的東西之偶像的崇拜，這種崇拜很容易的隻在一般人們的意念中種下根子，他們從小就想像着那些整個社會的公共事業與利益的處置和保護，除了由現存的國家及高級官吏來辦理外，便沒有別的方法。這班人以爲假使由世襲的君主政體轉變到了民主的共和，已經是很不小的進步了。可是實在呢，我們知道國家並不是別的，無非是一個階級壓迫別一階級的壓搾機關。這一點，在民主共和政體中比在君主政體中，絲毫也不會有所出入的。說得好聽些，牠是一個無產階級在牠爲階級統治的爭鬥中勝利之後，所承受下

來的一個禍根，勝利的無產階級和公社一樣，必須立即斬截這個禍根的極惡害的方面，直到那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之下培養出來的，新起的一代人，能夠把所有那些老舊無用的國家組織，拋到拉圾堆上去的時候為止。」

恩格爾斯曾經警告過德國人，要他們在共和替代君主之後，不要忘記社會主義對於一般國家問題之基本原則。他的警告現在好像是特別對采雷太爾和契爾諾夫（Chernoff）那班先生們的一個教訓似的，他們在「混合的」政策中，曾表示他們對於國家的迷信和偶像的崇拜！

還有兩點要提出來講的：第一，當恩格爾斯說在民主共和政體之下和在君主政體之下，國家一樣的是「一個階級壓迫別個階級的壓榨機關」，「絲毫也不曾有所出入的」；可是這並不是說壓迫的形式變更對於無產階級是不相干的，像一般無政府主義者所宣傳的一樣。一個更廣大，更自由，更公開的階級壓迫和階級爭鬥的形式，是大大地能夠幫助無產階級來作消滅一切階級的爭鬥的。第二，為什麼只有新時代

的人才能夠完全消滅國家的一切古舊的殘餘——這個問題是與德謨克拉西的廢止問題相連繫的，下面我們就要講到這個問題了。

第六節 恩格爾斯對於廢止德謨克拉西的見解

當恩格爾斯講到「社會民主」這一個名詞之科學的錯誤問題時，他就連帶的說到了德謨克拉西廢止這一點。他在一八七〇年代關於各項問題，尤其是有國際性的問題的文集的序言中（這個序言是在一八九四年一月三日，就是恩格爾斯逝世前一年半作的），他說在他所有的論文裏面，他都用「共產主義者」這個名詞去代替「社會民主黨」，因為當時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是法國的普魯東派和德國的拉沙爾派（Lassallean）所採用的。

恩格爾斯繼續的說：「馬克思和我一樣，都認為用這樣有伸縮性的名詞，來表明我們自己的特殊的觀點，是絕對不可能的。到了現在，情形不是這樣了，社會民主黨這個名詞或者勉強可以過得去的，雖然牠對於那經濟綱領不僅是一般

的社會主義的，而且還是真正共產主義的一種政黨，牠對於那最後的政治目標，在於消滅一切國家，亦即消滅一切德謨克拉西的一種政黨，仍然是不很恰當的。

但是「真正」政黨的名稱（「真正」二字恩格爾斯用特體字母寫的），絕不會完全與黨的實際行動相適合的；黨發展了，可是名稱也許依然仍舊。

辯證法家恩格爾斯，直到他臨終的一天，依舊是忠實於辯證法的。他說，馬克思和我對於黨，嘗有一個巧妙的科學的而且切當的名稱，但卻沒有一個真正的黨，就是說沒有一個廣大無產階級羣衆的黨。現在到了十九世紀的末葉，我們已經有了一個真正的黨；但是牠的名稱在科學上說來是不正確的。不要緊，「牠是可以過得去的」，只有讓牠去發展了，只要不要讓他那科學上不正確的名稱去掩蓋他的面目，並且不要去阻礙牠向着正確方向前進的發展就是。 諧談家也許可以照恩格爾斯那種方式的論調引來安慰我們布爾塞維克：我們已有了一個真正的黨，牠很顯赫地在那裏發展着，即使像「布爾塞維克」這樣的一個無意義而又野蠻的名稱，也是「可以過得去的」。

第四章 恩格爾斯補充的說明

」，雖然這個名稱所表示的只是一九〇三年倫敦北京的大會上我們得到了大多數，這一個全屬偶然的事實。或許現在因為一九一七年七八月間，我們的黨被共和黨人和「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黨人所迫害，遂使「布爾塞維克」這個名稱非常普遍非常光榮了。此外，這種迫害，又表示了我們的黨在牠實際的發展上，完成了歷史上的極大的一個進步，現在就是我自己或許也要遲疑不決，不敢去重提我四月間變更黨的名稱的提議了。或許我要向同志們做一個「妥協」的提議：我們叫自己的黨為共產黨，同時把「布爾塞維克」這個名詞置諸括弧中。

但是黨的名稱問題，遠不及革命的無產階級對於國家的關係問題那樣重要。

平常在國家問題的爭辯上，人們往往不斷的犯着那恩格爾斯在這裏所警告我們，而我們也已經在上面提及的錯誤。就是說，人們每每忘記了國家的破壞，也就是德謨克拉西的破壞，以及國家的衰亡，就是德謨克拉西的衰亡。

初初一看，這種肯定的說法似乎是十分離奇而不可了解的。甚至有些人也許要

開始這樣恐怖：我們將不能期待這樣一種社會組織的到來，在那裏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亦將消滅無餘，因為所謂德謨克拉西者，就是承認這種原則的制度。不，德謨克拉西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並不是同一的東西。德謨克拉西是承認以少數服從多數的一種國家，就家說牠是一個階級，或一部分人民有組織的應用暴力，以壓迫別一階級或別一部分人民的一種組織。

我們把消滅國家這一事業作爲我們最後的目的，就是說，我們要消滅一切有組織的，有編制的暴力，一切壓迫人們的暴力形式。我們並不期待那不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的社會制度之來到。但是我們爲社會主義而奮鬥的人，深信社會主義是要進化到共產主義的。到了那個時候，所有對暴力的需要，一個人服從別一個人以及一部分人民服從別一部分人民的一切需要，都將隨之而消滅；因爲人們將不需要任何強力和任何壓迫而能習以爲常的遵守社會的基本條件了。

爲要着重的說明這個習慣的原素，恩格爾斯講到那「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之下

第四章 恩格爾斯補充的說明

培養出來的新起的一代人們，能夠把所有老舊無用的國家組織拋到垃圾堆上去——這裏所謂國家組織，是指任何一種的國家組織，德謨克拉西的共和國也包括在內的。爲要講明這一點，我們必須研究國家衰亡的經濟基礎。

第五章 國家衰亡之經濟基礎

這個問題在馬克思所著的「哥達綱領批評」（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給勃拉克 B. R. Achse 的信，此信遲至一八九一年始見刊登於新時代上）中講得最爲詳盡。這篇顯赫的著作中的論戰之部，包含着拉沙爾派學說之批評，因爲牠遮蔽了積極的一部，就是說，遮蔽了共產主義之發展與國家之衰亡兩者間的關係之分析的一部。

第一節 馬克思對於本問題的提出方法

從表面上把馬克思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致勃拉克的信拿來與恩格爾斯一八七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致培培爾的信相比較，似乎馬克思要比恩格爾斯「國家派」的成分較多，兩人對於「國家」這個問題也有顯然不同的主張。

恩格爾斯向培培爾提議拋去一切關於「國家」的廢話，在政綱中完全廢去「國家」的字樣而以「公社」代之。他甚至又宣說「公社」實際上已經不是「國家」的原

惹了。馬克思則不然，他曾經甚至講過「將來共產社會中的國家」，這就很明顯地表示他承認，即使在共產制度之下亦必需要「國家」的。

但是這樣的觀察根本是大錯的；如果更深刻的研究下去，便知道馬恩兩氏對於國家及其衰亡之見解，是絕對一致的，而上面所引的馬克思的說法，僅僅指着正在衰亡下去的國家組織而言的。

很明顯的，將來「衰亡」的正確日期，是誰都不能決定的。可是牠終必是一個長時期的過程，這是必然的。馬克思和恩格爾斯間明顯的差異，是由於他們所研究的題目之不同，和探討的目的有所區別而發生的。恩格爾斯之意，在以簡潔明瞭的方式，把普通對於國家的荒謬的迷信，不亞於拉沙爾所具有的迷信，從大體上向培培爾表明。至於馬克思則不過是順便提及，而主要的意義是側重在另一題目：共產社會之發展。

馬克思的全部理論是以最有序，最完整，最精密，而又最充實的形式，來應用

於現代資本主義中去的一種進化論。他自然要把這個理論應用到正在發生的資本主義的破產，和日後共產主義之未來的發展上去的。

日後共產主義之未來的發展有什麼一種實際的基礎呢？牠所建築的實際基礎，就是共產主義在資本主義之內，就有牠的根源了，牠是從資本主義中開始牠的歷史的發展，牠是資本主義所產生的社會力量作用之產物。馬克思沒有一點兒企圖創造一個烏托邦，憑空懸想一件不可推測的東西的色彩。他的研究共產主義問題，正像自然科學家研究一種新的生物的進化問題一樣；他知道了一物之來源，又知道此物之如何變化。

馬克思最初便把哥達綱領中，關於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問題混亂不清之處，先行掃除乾淨，他說：

「現代的社會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牠存在於從中世紀制度解放出來的一切文明國家之中，這種中世紀制度的形式，是依着每一個先進國家發展之特殊的歷史

條件而多少有所不同的。而「現代的國家」則不然，她是跟着國家的領域之不同而不同的。普魯士德意志帝國與瑞士完全不同，英國與美國也絕對的不一樣。所以所謂「現代的國家」實在是一種虛構。

「不管各個文明國家中的各種不同的「國家」形式如何的分歧，可是牠們卻有一點是共同的——牠們都是建築在資本主義多少發展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之上的。所以牠們終有某幾個基本的現象是共同的。在這一點意義上，我們才可以說到『現代的國家』是與將來當牠的根基——資本主義社會——消滅了的時候絕然不同的。

「現在的問題就是這樣：在共產主義的社會中國家是怎樣的一種形式呢？」

換一句話說，在那個時候，還將遺留着那些與現在的國家職能相符合的這個問題，只能藉科學的方法才能夠答覆得出來；雖然幾百千回的把「人民」這個字與「國家」去連接起來，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還是毫無幫助的……」。

馬克思這樣的議評了這一切「人民國家」的談論之後，他就提出問題來，並警告我們說，爲要得到對這個問題的科學的答案，唯有堅定地依據實在的科學事實，才能成功。

整個的進化論，整個的一般的科學已經完全正確的確定下了第一個事實——這個事實是爲烏托邦派所忘記，而且現在又爲畏懼社會主義革命的現代機會主義者所忽略的——這個事實就是就歷史的發展上講，從資本主義轉到共產主義的一個過渡時期，一個特殊的階段是必然要來到的。

第二節 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

馬克思繼續着說：「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化到後者的革命的過渡時期。一個革命的過渡階段是與這個時期相符合的，而這個時期中的國家，除了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之外便不許有別的形式。」

這個結論是馬克思根據無產階級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作用之分析，根據這個

社會的發展事實，以及無產階級與資本階級利益矛盾的不調和性而獲得的。

從前這個問題是這樣提法的：無產階級爲要得到解放，牠必須推翻資產階級，奪取政權，並且建立起牠自己革命的專政。可是現在這個問題的提法已經多少有些不同了：從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共產主義——發展到共產主義的社會，如果不經過一個「政治的過渡時期」是完全不可能的，而在這個時期內的國家形式，也祇有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

那末，這個專政對於德謨克拉西的關係到底是怎樣呢？

我們知道「共產主義宣言」只是相並地提出了兩種概念：『無產階級之變爲統治階級』和『德謨克拉西之勝利』。根據了一切上面所說的話，我們就可以更正確地斷定，在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中，德謨克拉西是怎樣變化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在最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的條件之下，我們可以有一個多少是完整的德謨克拉西，這個德謨克拉西是取民主共和政體之形式的。但是這個德謨

克拉克是常常受着資本主義剝削之狹窄的框子所限制的，因此實際上他常常是爲着少數人，爲着有產階級，爲着富有者的利益。資本主義社會裏的自由，多少常常是像古代希臘共和國裏的一樣，就是說，在那時自由派是爲着奴隸主的。現代的工錢奴隸由於資本主義的剝削條件之故，被貧乏和窮困壓榨到了這樣的一種程度，以致「不能來顧及德謨克拉西問題」，「也沒有時間來興問政治」；以致在平常和平情境之下，大多數的人民是不允許參加到社會的政治生活中去的。

這種申述之正確，也許可以用德國的實例來十分明確地證明牠，就是因爲在這個國家裏，立憲的行使已經存在得很久長，已經很穩固地存在了半世紀（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四）了；在這個時期當中，社會民主黨能夠利用「合法」來把大部分的工人階級組織成爲一個政黨，這是任何別的國家所不及的。

那末，要問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所看到的，有政治覺悟和能有政治活動的工錢奴隸之最大的比例有多少呢？一千五百萬的工錢奴隸中間、有一百萬是社會民主黨的黨

員！在這同樣的一千五百萬當中，有三百萬是組織在產業中的！

利於極少數人的德謨克拉西，利於富有者的德謨克拉西，——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德謨克拉西。若是我們更精密地來看資本主義德謨克拉西的結構，我們就隨時可以看到一些關於選舉權問題之煩瑣的規定（什麼戶口調查，婦女除外等等）關於組織代表機關的技術，關於集會權之實際障礙（所有公共的建築都不是為「窮人」用的）以及關於把所有的報章日刊都成為純粹資產階級的組織等等，我們從這種種方面可以看出對德謨克拉西原則的層層限制。這種限制，例外，除外以及對於窮人的種種束縛，看來似乎不關重要，——尤其是在那班自己從來不曉得有什麼貧乏，也從來沒有同那些在艱難困苦中過活的被壓迫階級的人們接觸過的那些人之心目中（這種人在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和輿論家隊伍中，如果不佔百分之九十九，至少也要佔十分之九）更覺得是不關重要。但是算起總賬來，就知道這些限制都是要將窮人摒出於政治之外，並且使他們不能積極參加德謨克拉西。馬克思把這一種資本主義德謨克拉西的

本質很巧妙地抓住了。當他分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也曾說：「被壓迫者每數年得到一次允許來決定壓迫階級中誰將到國會裏去代表他們，欺壓他們！」

資本主義的德謨克拉西必然是褊狹的，毫無顧惜的將窮人排除出去，因此牠是偽善的是欺詐的，但是從現在的制度進步到「逐漸擴大的德謨克拉西」，這一種進展，決不是像一般自由派的教授先生們和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者所想像的那樣簡單，直捷，和平穩的。決不如此，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那種進步的發展，是要經過無產階級專政的，而且非此決不成功，因為要破壞剝削人的資本家之抵抗，除了無產階級專政之外，便沒有其他方法。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被壓迫者先鋒隊的組織居於統治階級的地位去鎮服壓迫者——不是僅僅擴大德謨克拉西的範圍，同時這種德謨克拉西之無限的擴大——第一次變成了貧民的德謨克拉西，民衆的德謨克拉西而非一般富人們的德謨克拉西了——無產階級專政要對於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的自由，加以許多限制和例外的規律。

我們爲要使人類從工錢奴隸之下解放出來，我們必須壓倒這班人。對於這班人我們必須用武力破壞他們的反抗；凡是要用鎮壓用暴力的地方，便沒有自由和德謨克拉西，這是很明顯的。

讀者當能記起恩格爾斯在他給培培爾的信中曾很顯著地講明了這一點，他說：

「無產階級需要『國家』其利不在於自由，而是爲要打倒他的敵人；到了可以講自由的時候，這樣的國家，就將不存在了」。

爲廣大的民衆所有的德謨克拉西以暴力加之於人民的剝削者和壓迫者，就是說把這種剝削者摒於德謨克拉西之外，——這便是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時期中的德謨克拉西之改變。

只有到共產社會的時期，資本家的反抗已經徹底地消除，資本家也完全消滅了，階級也從此不復存在了（就是說，社會分子在生產關係中不復有差別了），只有那時「國家方失其存在而人們始能講自由」。只有那時真正完全的德謨克拉西才成

可爲能，能夠實現，並且沒有任何的例外。而且只有那時，德謨克拉西也就開始衰亡了，因爲資本主義的奴隸制已經解放了，一切資本剝削之下的醜惡，野蠻，狂妄，以及無限量的卑鄙無恥之行，都已掃清了，人們將逐漸慣於遵守社會生活的日常規律。這種規律已爲人所熟知數十年了，而施諸實際也不止數千百次了，人們極不勉強，絕不用壓迫，絕不用強力相迫，大家都能夠慣於遵守生活的常規，因此用來作爲強迫和壓制的那個特殊的工具所謂「國家」也者便也用不着了。

「國家衰亡」一語，是用得很巧妙而適當的；因爲他既能表明徐徐變動的過程，又能表明這種過程之自然性。惟有習慣才能夠，而且毫無疑義的能夠產生這樣的結果。因爲我們已經在我們的周圍，看到了不知幾百萬次關於人們對社會生活之必要的規律，是易於習慣的。只要沒有剝削，只要沒有引得起憤恨，反抗，叛亂的原動力，亦沒有什麼鎮壓的必要就行。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我們看到一種殘缺的慘惡的，假冒的德謨克拉西，只爲着少數的富人們的德謨克拉西。到共產主義的過渡

時期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第一次所產生的民衆大多數的德謨克拉西，牠同時要對少數剝削者予以無情的鎮壓。唯有在共產主義之下，才能實現真正完善的德謨克拉西，但是牠越完善，便越成爲無用，以至於自己衰亡爲止。

從另一方面言之，在資本主義之下，便有真實意義的一種國家，就是說，牠是一階級鎮壓別一階級，少數人壓服多數人的一個特殊機關。

要完成這樣的一種以少數剝削者壓服多數被剝削者的任務，很明顯的，一種極端兇惡和殘酷的壓迫是必要的；汪洋般的赤血，也是不可少的；要經過這種兇殘的壓迫和流過汪洋的赤血，才能夠從奴隸制，農奴制，和工錢勞動制的境遇之中，奮鬥出他們自己的道路來。

再則，當由資本主義進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中，鎮壓的手段還是必需的，但是這是多數被剝削者加於少數剝削者的一種鎮壓。一副特殊的鎮壓器具和一個特殊的壓迫機關——國家——仍是必要的，這祇是一種過渡的國家，和普通一般國家的意義

迥然不同了。因為以大多數的舊日的工錢奴隸去鎮壓少數的剝削者，是一件比較簡易而順乎自然的事情。而且其中流血的事件也必然比較從前鎮服奴隸、農奴，和工錢勞動者的叛亂時要大大地減少。同時人類所受的損失，亦將大大地減輕，這樣廣大的德謨克拉西，包含着極大多數民衆的德謨克拉西，後來逐漸對於那個特殊的鎮壓機關之需要，也將完全消失了。剝削者既沒有一種極複雜的特殊的鎮壓民衆的機關，自然沒有力量壓迫民衆；但是民衆鎮壓剝削階級的人們，是只要用一個很簡單的「機關」——甚至於還用不到什麼「機關」用不到什麼特殊的工具——只要簡單的用民衆武裝的組織（例如工農代表蘇維埃——我敢在這裏預言），就夠了。

總之，只有在共產主義之下，國家才完全成爲廢物，因為那時再沒有人是需要壓迫的——這裏所謂「人」，是指某一階級而言的，是指向某部分民衆作有系統的鬥爭的那個階級而言的。我們不是烏托邦派，我們絕不否認個人有越軌行動之可能與必然，亦不否認有制止此種行動的必要。但是首先須認定，對於這些絕對用不到一個

特殊的鎮壓機關，也用不到一種特殊的工具去制止牠。武裝的民衆即負有此種責任。這種責任的輕易，正好像在現在社會中一羣文明的人們去和解兩個鬥毆者，和禁止強姦婦女那一類的行動一樣的輕易和簡單。更有進者，破壞社會生活之規律的越軌行動，其主要原因，是由於剝削民衆，使民衆陷於災患貧困所致。一旦這個主要原因剷除掉了，越軌行動也就必然會消滅的。消滅的速率和程度如何，雖不得而知，但牠終歸於消滅乃是必然的結果。到了這種越軌行動消滅了，國家亦就隨之而消滅了。

馬克思并不陷於烏托邦的思想，他更詳細的指出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之最低和最高的兩種形態之區別（這兩種形態是指着發展的程度和階段而言的）。

第三節 共產社會的初期形態

在「哥達綱領批評」中，馬克思很詳盡地駁斥了拉沙爾的觀念，以為在社會主義之下工人可以獲得他勞動之「毫不虧損的」「全部的」產物。馬克思指明從全部的

社會勞動的產物中，必需有一部分是應作爲公積金的，這種公積金是用來擴大生產，補償「已損壞」了的機器等等；然後再從這個集體的產物中，取出一筆爲行政的消耗，學校，醫院，養老院等等的設立而用的款項。

馬克思不像拉沙爾那樣應用那種含糊不明的籠統的語句——「工人可以獲得他勞動的全部產物」——他對於社會主義的社會應該怎樣進行他的事業這一點，有一個很嚴正的估計。馬克思把一個沒有資本主義痕跡存在的社會的生活條件，拿來做一個具體的分析；他說：我們這裏（是指在分析黨的政綱時）所要討論的，並不是一個已經在牠自己基礎之上發展着的共產主義社會，而是一個初初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因此這個社會在經濟，道德，和知識各方面都還遺留着舊社會——雖是從這個舊社會的胎胞中產下來的——的痕跡」。

這樣的一種共產主義社會——初初從資本主義的胎胞中產下來，而各方面還遺留着舊社會的痕跡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就稱牠爲共產主義社會的「初期」，或最

第五章 國家衰亡之經濟基礎

低形態。生產工具在這時已經不是個人的私有財產，而是屬於社會全體的了。每個社會分子做某一部分社會的必需工作，就從社會領得一個證書，證明他已經做了若干時間的某種工作，根據了這個證書，他就得從公共的消費品的貯藏所中，去領得相當的生產品之數量。除去了他的勞動之應歸入公積金的一部之外，每一個工人因此就可以向社會獲得他所給予社會的勞動的產物了。

似乎「平等」是有最高威權的樣子。但是當拉沙爾觀念中已經有了這樣的一個社會制度（即一般所稱的『社會主義』，但是馬克思稱牠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初期形態）而說這是一種『公平的分配』，又說這『是每一個人對於他所獲得的勞動產物相等的一份的一種平權』時，拉沙爾是錯誤的，馬克思在下面解釋他的錯誤：

『我們在這裏確實是有平權的；但是這還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權利」，牠像別的權利一樣，早就包含着一種不平等在裏面的。一切「權利」都是同一規度之施行於事實上各不相似又各不相等的人們身上；因此所謂「平權」，實際上就是平

等的破壞，亦就是不公平。^{（實證）} 他就可以獲得社會生產物（除了上面所說應儲作公積金的一部分之外）之相等一份。雖然，各個人之間還是不平等的：一個人強些，第二個人弱些；一個是結婚了的，另一個人卻沒有結婚的；又有一個人兒女較多，其他一個却只有很少的小孩，諸如此類，各個人都是不同的。

講到這裏，馬克思就這樣的做他的結論：

「所以，相等的勞動和因此而從消費品的公共貯藏所中領取相等的一份，這樣實際上可以使一個人所獲得的多於其他的人，使一個人能夠比另一個人富些；爲要免除這一切，「權利」是不應該平等，而應該不平等的。」

所以在共產主義的初期形態中，還不能實現公道與平等；貧富的差別，不公平的差別還依然存在的，但是人剝削人已經是不可能了，因爲那時要把生產工具，工廠，機器，土地等等攫奪來據爲私有財產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說破了拉沙爾那種小資產階

級關於一般的「平等」「公道」的混淆不明的語句之後，他同時便指示出其產主義社會發展的路綫，這個發展首先就把唯一的「不公平」——生產工具操在私人手中的這個不公平——破壞不可。當時還不能夠立刻破壞進一步的不公平，即由依照「所做的工作」而決定的消費物品之分配（而不是依照需要而決定的）而構成的不公平。

庸俗的經濟學家——包含資產階級的教授先生們（像「我們的」圖甘巴郎諾夫斯基（Tugan-Baranovskiy先生）常常譴責社會主義者忘記人類間的不平等，和「夢想」消滅這個不平等。這樣的一種譴責，就我們看來，祇是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之極端無識。

馬克思不僅十二分仔細地估量了人類間不可避免的種種不平等，而且還認定僅僅把生產工具轉變為社會全體的公共產業——意思就是一般所公認的「社會主義」——還是不能夠除去「資產階級的政權」之那種不公平和分配的缺點，這點缺點，在生產品

依照「所做的工作」的數量來分配的時候，還是繼續存在着的。馬克思又繼續說：

「但是這些缺點，在共產主義社會的初期形態中，在牠經過了長久的分娩的苦痛之後，初初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下來的形態中，是斷不能免避的。

公平永遠不能超過牠的經濟的發展的階段，和經濟結構所決定的社會的文化程度」。

因此，在共產主義社會的初期形態中（一般叫做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的法權」並不是完全消滅，而只是一部分，只是對於所獲得的經濟形式之改變，就是說，對於生產工具而言的一部分。「資產階級的法律」承認生產工具是個人的私有財產，社會主義把牠們變為社會公共的產業；到了這樣的程度，而且也只有到這樣的程度，「資產階級的權利」纔死去。

但是牠（資產階級的權利）的其他部分，依然是繼續存在着的，牠存在着作為一種社會分子間之生產品分配與勞動分配的調節者（指揮者）。「不做工的人，便得不

到·衣·食」，這·個·社·會·主·義·的·原·則·這·時·已·經·實·現·了·。「等·量·的·勞·動·可·以·獲·得·等·量·的·生·產·品」，這·個·社·會·主·義·的·原·則·也·已·經·實·現·了·。然·而·，這·還·不·是·共·產·主·義·，而·且·還·沒·有·消·滅·了·「資·產·階·級·的·法·權」·。——這·法·權·使·不·相·等·的·個·人·，做·了·不·相·等·的·（實·際·上·的·不·相·等·）工·作·，而·得·到·相·等·的·生·產·量·。

這·是·一·個·「缺·點」——馬·克·思·說——但·是·這·在·共·產·主·義·的·初·期·形·態·中·是·不·可·免·的·，因·為·，只·要·我·們·不·陷·於·烏·托·邦·思·想·，我·們·就·不·能·空·想·，以·為·推·倒·了·資·本·主·義·之·後·，人·們·就·立·刻·會·知·道·，去·為·社·會·勞·動·而·不·需·要·任·何·的·法·規·；實·際·上·，資·本·主·義·的·消·滅·並·不·是·立·刻·就·把·這·種·變·遷·的·經·濟·基·礎·設·置·好·了·的·。

而·那·時·除·了·「資·產·階·級·的·法·權」之·外·，還·沒·有·別·種·的·法·規·。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中·，一·種·國·家·的·形·式·還·是·必·需·的·，這·種·國·家·保·持·着·生·產·工·具·的·公·共·所·有·權·，保·持·着·勞·動·的·平·等·和·生·產·品·分·配·的·平·等·。

到了·既·經·再·沒·有·資·本·家·又·沒·有·階·級·，而·因·此·對·任·何·一·個·階·級·的·壓·迫·也·不·可·能·了·的·。

時候，國家也就「衰亡」下去了。

但是國家還沒有全部死亡，因為那時還留存着「資產階級的法權」的保護，牠制定了實際上的不平等。必須在完整的共產主義實現的時候，國家才完全全的消滅了。

第四節 共產社會的最高形態

馬克思接着說：

「……在共產主義社會的最高形態中，在由於人類受制於分工的原則而造成
的奴役人類消滅之後；同時，勞心和勞力之間的差別也就隨之而消滅；這時勞動
是不僅成爲謀生的手段，而且還是生活的第一要務；那時每個人的能力多方面大
大地發展，生產力也就隨之而激增，一切社會財富的來源，也將急流似的湧現出
來——只有到了這個時候，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天空之籠罩才能夠完全脫離，而
社會也就得在牠的旗幟上：着寫「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第五章 國家衰亡之經濟基礎

現在我們才可以估定恩格爾斯的解釋之完全正確，他絕不容情地嘲罵把「自由」「國家」等字樣聯在一塊之種種荒謬。在國家還存在着的時期以內，自由是不會有的。一旦有了自由，國家就不會存在了。

國家完全死亡的經濟基礎，就是這樣的一種高度發展的共產主義，在這種共產主義之下，勞心與勞力之間的差別就消滅了，因此，跟着就消滅了現在社會的不平等之最主要的根源之一——這一個不平等的根源，僅僅靠生產工具之轉為公有產業，僅僅靠剝奪資本家的財產，是不能消除的。

這種剝奪，使生產力有極大的發展之可能。我們只要知道了現在資本主義怎樣的阻礙着這種發展，以及在現在所已經達到的技術基礎之上，可以怎麼快的向前發展，那末，我們就可以十二分自信的確切地說，剝奪資本家的產業，必然地會使人類社會的生產力得到一個極大的發展。但是，這個發展之前進的速度如何，何時才能夠達到打破分工，打破勞心與勞力之間的矛盾，以及何時能夠達到使勞動變為「生活的

第一要務」——這些我們是不知道，而且不能知道的。

所以，我們有權可以說的，只是關於國家之必然的衰亡，特別着重說到這個衰亡過程之久長性，牠是由共產主義的最高形態的發展速度來決定的；至於時期問題，或衰亡之具體的形式問題，還得留着去公開的討論，因為解決這樣的問題的材料現在還沒有。

當社會實現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規條之後，國家才會完全衰亡；就是說，當人們已經慣於遵守社會生活之基本原則，而他們的勞動生產力發展得很大，以至他們都自願的盡其所能的來工作的時候，牠才會完全衰亡。「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天空」逼得人們像謝洛克 (Stylock 吝嗇的猶太商人——譯者) 一般的冷酷，去斤斤計較什麼我比某人多工作了半小時，某人比我多賺了多少錢等一類的事——這樣的狹隘天空到了那時將完全消除了。社會對於那分配給每一個分子的生產品數量之精確的計算，在那時已經沒有必要，各人皆得自由的「盡其所需」以取之於社會。

第五章 國家衰亡之經濟基礎

從資產階級的觀點上看來，以為宣佈這樣的一種「純粹烏托邦」的社會秩序，是很輕易的事；他們譏笑社會主義者允許各人有權向社會取得多少松菌，多少汽車，多少鋼琴等等，而對各公民的勞動沒有任何的監督。即在今日，大多數資產階級的「學者」，還是應用着這樣的譏嘲，但是這種態度只是暴露了他們的愚昧，和他們擁護資本主義的物質利益而已。

他們的愚昧，——因為任何一個社會主義者的頭腦中，從來沒有「允許」共產主義最高形態之到來，不過偉大的社會主義者預知牠之必然到來，他們假設那時的勞動生產力與現在既截然不同，那時的居民也和現在迥乎有別，現在的人是可以揮霍社會財富的積貯，而要求不可能的事物的。

在共產主義的「最高」形態沒有達到以前，社會主義者是要要求社會和國家之嚴格的監督勞動和消費的；不過這個監督，是必須從剝奪資本家，從工人監督資本家開始的，而且不該由官僚的政府，而應由武裝工人的政府來施行這個監督的。

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和他們的食客，如：采雷太爾威爾諾夫以及他們的伙伴們等）對資本主義之爲自己利益的辯護，就是在他們把對遙遠的將來之爭辯議論，來代替目前政治上的重要而急不容緩的問題：剝奪資本家，把全體公民變爲一個巨大的「新提嘉」——整個的國家——中的工人和被雇用者，和把這個新提嘉中的全部工作都使之隸屬於一個真正德謨克拉西的國家——隸屬於工人兵士代表的蘇維埃國家。

實際上，當一位博學的教授和跟在他後面的一些俗學之輩如采雷太爾，和威爾諾夫先生們，講到不合理的烏托邦，講到布爾什維克之籠絡羣衆的允許，和把社會主義「搬進來」是不可能的時候，他們所注意的是共產主義的最高階段或最高形態，而這個最高形態不僅沒有人允許過，而且甚至沒有一個人想要把牠「搬進來」過，因爲無論如何，把社會主義「搬進來」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現在我們要講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科學上的區別問題，對於這個問題在我們上面所引錄的恩格爾斯論及「社會民主黨」這個命名的不適當的論辯中，已經提到過

初期或最低形態的共產主義和最高形態之間的政治上的區別，自然因時期的不同而迥異的；可是在目前資本主義之下，來加重注意這種區別，實在是很可笑的，也許只有幾個無政府主義者把牠看作一等重要的問題（如果無政府主義者當中，還有人一點也不懂得樸列哈諾夫式的把克魯泡特金格拉佛（Graves），柯爾業利遜（Cornelius）等輩的無政府主義的「明星」，變作社會愛國主義的話——這是一位保持着無政府主義者的尊榮和良心的無政府派蓋氏所說的）。

但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之科學的區別是很明顯的。一般所說的社會主義，馬克思名之爲共產主義社會的初期或最低形態，就生產工具之變爲公共產業這一點而言，共產主義這個名詞在此處也是可以適用的，不過我們不要忘記，這並不是完全的共產主義。馬克思的解釋之最大的意義是在：此處他還是一貫的應用唯物辯證論，進化論，而觀察共產主義是一種從資本主義中進化出來的產物。馬克思絕不用那些學究們所想像和吹噓的「學術的」定義，和許多字面上的無意義的爭論（「什

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共產主義」，他只是對於「何謂共產主義之經濟發展的階段」問題加以分析而已。

在最初形態或最初階段中，共產主義還不能達到經濟上的成熟，亦不能完全脫除資本主義的一切習俗和一切痕跡。因此我們看到，在這共產主義的最初形態中，保留着「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天空的有趣味的現象。資產階級的法權」，就其對消費品之分配而論，當然需要一個資產階級式的國家，因為如果沒有一個能夠強迫人民服從的機關，這法權便等於零。

因此，在共產主義之下的某一段時期以內，不僅是資產階級式的法權，甚至資產階級式的國家，也許可以留着的，但是這時資產階級已經沒有了。

這在一般人看來，似乎是奇論謬說，或者祇是一種辯證的玩意兒；馬克思主義被一班人常常用這樣的名詞來唾罵的，這班人自己已雅不願用些功夫去研究馬克思主義之異常深淵的內容。

第五章 國家衰亡之經濟基礎

但是實際上，舊組織的殘餘遺留在新組織中的事實，無論在自然界或在人類社會中，在人生每一步的旅途上，我們都可以看得到的。並不是馬克思自己的意願要把一兩段的資產階級法權，滲入到共產主義當中去；他只不過指出在一個從資本主義的胎胞中所產下來的社會，政治上和經濟上所必不可免的事實罷了。

德謨克拉西在工人階級反對資本家的解放爭鬥中是有極偉大的意義的。但是德謨克拉西却決不是一個不可超越的界限；牠祇是從封建到資本主義和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進化過程中的階段之一。

德謨克拉西包含着平等的意義。如果我們能夠從消滅階級的意義上去了解平等，則無產階級爲平等與平等的口號而爭鬥有何等重大之意義，也就不言而喻了。但是，德謨克拉西的平等祇是形式上的平等而已；所以在社會全體份子對於生產工具使用平等獲得了之後，也就是說在勞動的平等和工資平等的獲得了之後，在人類的跟面前必然的立刻會發生一個從形式上的平等到實際上的平等的更進一步的問題，也

就是說，發生一個實現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為原則的平等問題。要經過怎樣的階段，應該用那些實際方法，人類才能夠達到這一個最高的目的——這些我們是不知道，而且也不能夠知道。但有一點頗關重要的，就是我們應該說明平常資產階級對於社會主義的無限制的撒謊，在他們觀念中，一若社會主義是一件無生命的，死僵的，永古不變的東西，殊不知事實上卻只有在社會主義時代，才開始發生迅速的，真正的：實際的人羣進化。在這進化運動之中，起初有大多數人民，繼則全體人民都來參加了，這種進化是社會和個人生活的各方面都在進行着的一種運動。

德謨克拉西是一種國家的形式——是他的各種形式中之一。因此，同一般的國家一樣，她也是一種強力加於人類之有組織，有系統的實施。這是從牠的一方面講的。可是從另一方面來講，德謨克拉西是在形式上承認一切公民的平等，就是說，一切公民都有平等的權利，來決定國家的建設和國家的行政。而從這一點又跟着發生了德謨克拉西發展的一個階段，牠首先就使無產階級緊密地聯合起來，成爲一個革

命的階級以反抗資本主義，而且使牠有機會能夠去打毀和破壞資本主義而使之成爲片層般的，並且從地面上掃除一切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不管牠是共和政體的）：常備軍，警察機關，和官僚機關；而代之以一更德謨克拉西化的機關，可是這依然是一個國家機關，不過牠是由工人階級的武裝羣衆所組織成的，這個武裝組織到了那時，已經成爲全體人民參加軍事的組織了。

此時就發生「從量改變到質」的情形了。德謨克拉西發展到了這個階段時，牠就脫去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框子，而開始牠的社會主義改造。假使真正全體人民都來參與國家行政的話，那末，資本主義便不能持續下去。而事實上，資本主義之發展，已經親自創造好了使真正的「全體」人民都能參加國家行政的一切先決條件。例如普及教育一端，我們可以把牠歸爲這些先決條件之一，牠已經在許多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實現了；再則由巨大的複雜的和已經社會化的機關如郵政，鐵路，大工廠，大商業，銀行等等訓練整千整萬的工人，使之受到「教育和紀律化」。

有了這樣的一種經濟的基本條件，便可以在二十四小時以內推翻了資本家和官僚，而用工人武裝或全民武裝的組織來代替從事於監督生產和分配的事業，計算勞動和生產品的分配的事業；不過監督和計算的問題不能與受過科學教育的工程師，農業技師等等的問題混為一談的。這些先生們雖然今天還在資本家的號令之下討生活，可是明天他們便會更好的來替武裝的工人階級服役的。

簿記和監督，是進行得平穩而正確的共產主義初期形態中所必需的兩件主要事務。所有的公民在這裏都變成國家的雇員了，他們在那時都是武裝的工人。所有的公民都變成一個全民國家「新提嘉」中的雇員和工人了。那時所有的事情，就只是在使一切人民都做平等限度於工作，一切都按規則遵守工作的標準而得到同等的報酬。這必要的簿記和監督（或管理）已經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達到了絕端簡單化的地步，到後來牠們簡直變成了異常簡單的工作，如檢查，登記和開發收據等等，這些工作，只要能夠閱讀能夠書寫，和懂得加減乘除的起碼算術的，任何人都能夠擔任的。

（註）當國家大部分的職務部簡單化，由工人階級自己來幹這種簿記和監督工作的時候，國家就失了牠政治的性質，那時『社會公共的機關就由政治的變爲簡單的管理機關了』。（參閱本書第四章第二節『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當大多數人民到處起來親自管理這種簿記並監督資本家（現在他們也已經變爲被雇用的服務人員了）和知識階級的先生們（這些先生們現在保留着資本主義社會的習氣）的時候，那時這種監督將真正成爲普遍的，一般的，和全民的了，那時牠將成爲『遍地皆是』而誰也逃不掉這種監督（或管理）了。

整個的社會將成爲一個監督機關和一個工廠，大家同等的勞動獲得同等的工資。

但是這個『工廠』的紀律，無產階級在征服了資本家和推倒了剝削階級之後，要擴大的應用到全社會去的紀律，絕不是我們的理想，而且與我們的最終的目的相距還遠得很，牠只不過是爲要達到徹底肅清社會上一切資本主義剝削的卑鄙粗野與醜惡，

和使我們能夠繼續向前進展所必需的一個階段而已。

當全體，或甚至僅僅大部分的社會，已經知道了管理國家的方法，已經把這些管理的事務執住在自己掌握中，已經組織起來監督極少數的資本家，監督願意擁護資本主義的惡習的紳士先生們，和監督那些因資本主義而深深墮落了的工人們的時候——從那個時候起，對於任何形式的國家之需要遂開始消失下去了。德謨克拉西愈是完備，則與牠變成廢物的日子相距便愈近，由武裝工人所組織的「國家」愈是德謨克拉西化（這時從國家的原義上講，牠已經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了），則一切形式的國家開始衰亡也便愈速。因為當大家都知道管理，而且已經實行管理社會化的生產的時候，當大家都已經實行管理登記和監督那般蛀虫們，貴人們，騙子們，以及與這些相類似的「資本主義習俗的擁護者」的時候，——到那時候要規避這種普遍的登記和監督或管理，就自然而然地日益困難了；一切企圖規避的計劃必然會很迅速的被發覺出來，而受到嚴厲的處罰（因為武裝的工人都是很重實行的人，而並不是富感情的

第五章 國家衰亡之經濟基礎

知識分子可比；他們不願與任何人開玩笑），這樣，使人們遵守一切社會生活的簡單的基本規條的必要，也就成爲一種習慣了。

到了那時，從共產主義社會的初期形態到牠的最高形態的過渡的門戶已經大開，而國家也就完全全地死滅了。

第六章 被機會主義者所糟蹋的馬克思主義

國家對於社會革命，和社會革命對於國家的關係問題，同一般的革命問題一樣，也是第二國際（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最著名的理論家所完全忽略的。但是在那機會主義逐漸長大的過程中——使第二國際在一九一四年破產的一種過程——最顯著的事件就是：他們即使到了真正接觸到這個問題的時候，還是竭其全力來規避牠，或者故意裝着不注意的樣子而任牠過去。

從大體上看來，我們可以說，把無產階級革命與國家的關係問題避開不談，對於機會主義者自然是有利的，而且這種規避還滋養了機會主義者的生命——可是其結果就造成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以至於完完全全地糟蹋了馬克思主義。

爲對這個可憐的機會主義長大的過程加以說明（縱使這個說明是很簡短的）計，我們就拿馬克思主義之最赫赫有名的兩位理論家樸列哈諾夫和致次基來說一說吧。

第一節 樸列哈諾夫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樸列哈諾夫在一八九四年曾爲討論社會主義對無政府主義的關係問題，特地刊發了一本德文的小冊子，命名爲「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

在研究這個問題時，樸列哈諾夫把那最致命最可爭論的一點，把那與無政府主義者的爭鬥在政治上所最關重要的一點：革命對於國家的關係問題和一般的國家問題，完全擱開而不置一辭！他的小冊子可以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歷史的文藝，其中包含着許多關於蕭蒂納（*Stinner*）普魯東及其他一輩人的思想的有價值的歷史材料；第二部分是庸俗而粗陋的論調，其中包含着一篇論文，牠的題義是說無政府主義者與強盜並無區別的一種拙笨的論調。

這類論調聯結起來，便是樸列哈諾夫在俄國革命的前夜，以及革命時期當中，整個行動的最珍奇，最特出的表現。在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七年中間，樸列哈諾夫自己表示着一半是學說家，一半却是庸俗的學者，政治上他又老是在資產階級的尾巴後面

跟着罷。

我們已經看到馬克思和恩格爾斯在他們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中，很徹底的說明他們對於革命與國家的關係的觀念。當一八九一年馬克思著的『哥達綱領批評』一書出版時，恩格爾斯曾經這樣寫着說：『我們（即馬克思和恩格爾斯——著者按）那時正在同巴枯甯以及跟着他的無政府主義者作最猛烈的戰鬥——那時距第一國際的海牙會議還不到二年。』

無政府主義者曾經企圖把巴黎公社宣播爲他們『自己的』，就是說要把公社當作他們學說的證實，這樣可以表示他們對於馬克思所指出的公社的教訓，和對此教訓的分析，是絲毫也不會懂得。對於那些具體的政治問題：如我們要不要去破壞舊的國家機關，和破壞之後我們用什麼來代替牠等等問題，無政府主義者簡直沒有說出一個接近於真理的解決辦法來。

但是談論『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而把整個的國家問題撇開不講，並將馬克

思主義在公社前後之全部的進展都置諸不顧，那就不可避免的會墮入到機會主義的深坑中去的，因為這正是機會主義所要求的——把我們上面指出的兩個問題擱開不講，這樣已經表示了機會主義的勝利了。

§ 第二節 考茨基與機會主義者的論戰

關於考茨基的著作，俄文的翻譯自然比任何別國文字都要豐富得多。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嘗說笑話，說俄國讀考茨基著作的人要比德國多些，於此可知這也並非無因的。（而且我們可以放在括弧裏面說，這句笑話還含有很深切的歷史意義，為最初說這話的人們所豫料不到的。因為一九〇五年俄國的工人異常有力而迫切的要求世界最優的社會民主黨的著作，因此在俄國這些著作的翻譯品和出版物，其數量之多誠為其他各國所未聞，這樣就把先進的鄰國之豐富的經驗，移植到我們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幼稚的領土中來了。）

除了對於馬克思主義之通俗的解釋以外，考茨基與機會主義者，與以伯恩斯坦為

「機會主義者」論戰，在我國也是特別出名的。然而有一件事實差不多是沒有人知道的；假使我們要明白考茨基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的大恐慌時期中，為什麼會墮落到不要臉的泥坑中去，代社會愛國主義辯護的道理，那末，我們對於那個事實就不能保持緘默。這個事實就是：當他站出去反對那最著名的法國機會主義的代表（米雷蘭 Millerand 和耶來斯 Jaures）和德國機會主義的代表（伯恩斯坦）之前，考茨基自己就已經表現着非常的動搖。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所創辦的「黎明」雜誌——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在斯都格爾出版，是擁護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的雜誌——曾經已與考茨基爭辯過，而且宣佈他在一九〇〇年巴黎的國際社會黨大會上所提出的決議案是「橡皮性」的，因為這個決議案對於機會主義者的態度是曖昧的柔和的和妥協的。還有一些用德文出版的考茨基的信札，也足以證明他在攻擊伯恩斯坦之前，態度是非常之動搖的。

然而這裏還有一個含有無可限量的嚴重意義的情形，就是在考茨基與機會主義者

第六章 被機會主義者所糟蹋的馬克思主義

的辯論中，在他提出問題的過程中，以及在他研究這問題的方法中，要是我們去研究考茨基最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叛變之歷史時，我們便可以觀察到他的有系統的傾向於機會主義，就是說他對於國家問題之有系統的傾向於機會主義。

現在且拿考茨基攻擊機會主義的一部大著，他的『伯恩斯坦和社會民主黨的政綱』一書來看吧。考茨基很精密地駁擊伯恩斯坦。但最特出的地方是在這裏：伯恩斯坦在他著名的『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一書中，他指斥馬克思主義爲白朗基主義（Blanquism）——這種指斥，是俄國自由資產階級和機會主義者數千百次的用來攻擊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之代表布爾什維克的。關於這一點，伯恩斯坦特別注重於馬克思著的『法國內戰』，而且竭力想把馬克思對於巴黎公社教訓的觀念去與普魯東的觀念混而爲一（我們已經知道他這種企圖是完全沒有成功的）。他也特別注意於馬克思的結論，這個結論是馬克思在一八七二年對『共產主義宣言』的序言中所特別加重說明的；序言中說：『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把現成的國家機關拿在自己手中，而爲着自己

的目的去利用這個國家機關。」

伯恩斯坦很「喜歡」這段箴言，所以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應用到三次以上，可是完全以機會主義的意義來把牠曲解掉了。

我們已經知道馬克思的意思，是說工人階級應該破壞擊碎和掘去（恩格爾斯所應用的字眼是「Sprengen」——「破裂」）整個的國家機關。可是在伯恩斯坦的意見，以為馬克思是用這幾句話來警告工人階級，來反對工人階級在奪得政權之後的過分的革命情緒。

誰也不能再想像一個比這更粗野更醜惡的一種對馬克思思想的曲解了。現在要問到底考茨基在他對伯恩斯坦的詳盡的駁辯中，採取怎樣的態度呢？

他把機會主義在這一點上對於馬克思主義之全部曲解的淵奧之處，都避開不講；他引用了上面所摘引的恩格爾斯和馬克思的「法國內戰」所作的一篇序言中的一段，就說依照馬克思的意見，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關，但是一般的講來

，牠是能夠掌握的——考茨基所說的話就盡於此了。馬克思從一八五二年就把「破壞」國家機關認作無產階級革命之真實的任務，而伯恩斯坦把馬克思的思想解作恰恰相反的一種意義——關於這一切，考茨基却不置一辭。

其結果是這樣：馬克思主義與機會主義之間，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問題的差別就被抹煞了！

考茨基寫道：「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之解決（這是他寫來反對伯恩斯坦的——著者），我們可以泰然的以待諸來日。」（見德文版第一百七十三頁）

這並不是攻擊伯恩斯坦的論戰，而實質上是向他讓步，是向機會主義投降；因為現在機會主義者所要求的也不會高於「把一切關於無產階級革命之任務的根本問題完全泰然的待諸來日」的。

馬克思和恩格爾斯從一八五二至一八九一年——四十年間——教誨無產階級，說明牠應該破壞國家機關；可是考茨基在一八九九年目睹了機會主義者對於這一點完全

背叛馬克思主義的事實，他使用欺詐的手段把「破壞這個機關是否必要的問題」，提出來代替破壞國家機關的具體的形式問題，而自己却隱藏到「無可辯駁的」（沒有結果的）庸俗的真理之幕後去，以為關於具體的形式問題，我們在目前還不能預先知道的。

在馬克思和考茨基之間，在他們各人對於無產階級的政黨如何去準備工人階級革命的問題所持的觀念之間，實夾着一條遼闊的鴻溝。

現在我們再拿考茨基比較成熟的著作來看，這部著作大部分也是用來駁擊機會主義者→錯誤的。這就是他那本命名為「社會革命」的小冊子。考茨基在這本書中把「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統治力的問題」作為牠特選的題目。他在這裏供給許多有價值的材料；但是恰恰把這個國家問題忽略過去了。統覽全書，著者到處都說到奪取國家政權這一點，而全書所談的亦盡於此而已。這就是說，他對那個問題（奪取政權的問題——譯者）的講法，就是向機會主義讓步，因為他承認不必破壞

國家機關而奪取政權是可能的。馬克思一八七二年在「共產主義宣言」的綱領上曾經宣佈爲「陳腐」的東西，到了一九〇二年恰恰被考茨基所復興起來了！

那本小冊子中又包含着「一節特別關於『社會革命之武器與形式』的話。在這一節當中，他所講到的是關於政治的總同盟罷工，國內戰爭，以及『現代一些強大國家之統治勢力的工具，如官僚政治和軍隊』等等問題；但是關於巴黎公社所已經給予工人的教訓，他却一字不提。很明顯的，恩格爾斯關於反對『迷信的崇拜』國家所下的警告——特別是對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人所下的警告——並不是沒有根據的。

考茨基提出這樣的意見：勝利的無產階級『將實現德謨克拉西的政綱』，隨後他又把這段話加以解釋。可是一八七一年所給我們的新教訓，關於以無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來代替資產階級的這一點，他却不一置一辭。考茨基用以下這樣的「確實」動聽的家常俗套來處置這些問題：

「很明顯的，在現在的制度之下，我們是不能得到政權的。革命本身是需要一

個長期的深遠的鬥爭，這個鬥爭不斷前進才會改變我們政治和社會的構造。」

毫無疑義的，這是「很明顯的」，這正好像馬吃燕麥，窩瓦河流入裏海的真理一樣的「很明顯」。所可惜的只是他用那種空洞而浮誇的「深遠的」鬥爭一類的話，而把那關係於革命的無產階級之最主要的問題忽略過去了。這個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對於國家和德謨克拉克西問題上，無產階級革命之「深遠」性，及其與過去那些非無產階級的革命之區別點究竟何在的問題。

忽略了這個主要問題，考茨基事實上對於這最重要的一點，就實行向機會主義讓步了。同時在口頭上却儼然可畏的宣言對機會主義者宣戰，又加重地說出「革命理想」的意義（如果人們怕得拿這種具體的革命理想到工人羣衆中去宣傳的話，那末這個「理想」的價值究有多大呢？）；他或者又說到「革命的理想主義爲首要」，或者竟宣佈說「現在英國工人的數量不多於小資產階級。」

「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考茨基寫道——可以並肩地存在着形式十分不同的企

業：有官吏的，（??）職工會的，合作社的，以及私人的企業。」

「舉例來說，社會主義的社會中有些企業是非官吏（??）的組織是不成功的，譬如鐵路事業就是這樣。這裏德謨克拉西的組織可以採取以下的一種形式：工人們選舉了代表，由這些代表來組織類似國會性質的機關，而這個國會性質的機關就決定一切工作的條例，並且監察那些官吏機關的行政。其他各種企業，有的可以交工會去辦理，也有的可以在合作社的基礎之上設立起來的」（見俄文版第一四八及一一五頁）。

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如果拿馬克思，恩格爾斯在七十年代從巴黎公社的教訓上所得的結論來一比，這種說法便還要退後一步。

從「官吏的」組織假設是必要的那種觀點來說，那末，鐵路事業和一切別的大企業（大的機器工業），大工廠，大的商業公司，和資本主義的農業的大企業之間都沒有絲毫區別。在這一切的大企業中，技術上當然是需要極嚴格的紀律，而在分配每

入工作的時候，在機器或生產品遭受損壞的危險之下，以及在整個企業停頓的危險之下，則又需要十二分精密的技術，在這種種的大企業中，工人們當然要「選舉代表而由這些代表來組織類似國會性質的機關。」

但是一切的樞紐關鍵就在這裏：這個所謂「類似國會性質的機關」，却不是資產階級國會機關那種意義的國會。一切的樞紐關鍵又在這裏：這個所謂「類似國會性質的機關」，却不祇是「決定一切工作的條例，並且監察那些官吏機關的行政」像考茨基所想像一般，他這種思想是不會超越於資產階級議會主義的範圍之外的。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這個「類似國會性質的機關」，是由工人代表組成，決定一切工作的條例和監察「機關」的行政，可是這個機關却並不是「官吏的」。工人們奪取了政權之後，就要破壞舊的官吏機關，他們要從根本徹底的毀滅牠，決不容許牠遺留着一塊舊的基石；而這般工人們和雇員們又自動的組織起新的機關來代替那舊的。

爲防止官僚主義化計，我們必須立即採取相當的辦法；這些辦法已被馬克思和恩格爾

斯分析得很詳盡了的：

(1) 他們不僅是被選舉的，而且無論何時都可以撤銷他們的職位；

(2) 他們的薪水不能高於普通工人所得的工資；

(3) 要很快的過渡到使社會全體都能夠來參加監督和管理的職務，這樣使全體暫時的變成了『官吏』，而因此就誰也沒有成爲『官吏』的機會了。

考茨基完全沒有考究馬克思的說話：『巴黎公社並不是一種議會組織而是一個工作的機關，而同時牠又是立法兼行政的機關。』

考茨基完全不懂得德謨克拉西（不是爲着民衆的）和官僚主義（反民衆的）聯合的資產階級的議會主義，與無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之間的區別；無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是要採取迅速的手段來徹底的剷除官僚主義，而且能夠把這種手段應用到底，直到官僚主義完全消滅爲止，直到代表民衆的德謨克拉西完全實現爲止。

考茨基在這裏又暴露了他對於國家的『迷信的崇拜』，對官僚主義的『盲目的相

信」。

現在我們再來看一看考茨基最後和最優的一部攻擊機會主義的著作，就是他那本『奪取政權之路』的小冊子（是一九〇九年出版的），這本小冊子表現了一個很大的進步，因為該書並不是廣泛的論到一般的革命政權問題，像一八九九年攻擊伯恩斯坦的那本小冊子一樣，也不講到社會革命的任務問題而不顧到這種革命的時期之成熟與否，像一九〇二年的『社會革命』那本小冊子一樣；講到具體的條件問題，這些條件逼得我們不得不去承認『革命的時代』已經到來了。

考茨基肯定地指出一般的階級矛盾之劇烈和帝國主義之長大，對於社會革命有特別重大的作用。在西歐的『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七一年的革命時期』之後，到了一九〇五年在東歐也就開始了類似的時期了。世界大戰進行得異常的快，『無產階級已經不能再說什麼時機未熟的革命了』。『我們已經走進到一個革命的時代來了』。『革命的時代已經在開始了』。

這些言論是十分明顯的。考茨基這本小冊子，我們可以拿來作爲一種材料，比較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前，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對於革命的約言和期望是何等的高大，而到了戰爭爆發之後，他們（考茨基本人也在內）的聲浪又怎樣的消沉，考茨基在那本小冊子的校正版內這樣寫着：

『現在的形勢（按：是指大戰時的形勢）有這樣的一種危險：就是我們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現在很容易被人超過我們的實際情形而認我們爲過於和平』。

但是事實告訴我們，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和平性和機會主義性，實在比表面上人們所感覺到的還要厲害些！

還有更特出的一點，就是除了這些肯定的言論，宣佈革命時期已經到來之外，同時他在那本小冊子裏，在那本他自稱爲專門分析『政治革命』的著作裏，却不完全拋棄了國家問題。

把這一切對於國家問題的規避，沉默，掩飾等等都總結起來算一算，其結果自然

是必然的完全投降於機會主義。關於這一點，我們立刻就要說到。

以考茨基爲代表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好像會這樣的宣佈着說：我保持着革命的觀念呢（一八九九年所說的）；我特別承認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一九〇二年所說的）；我承認新的革命時代到來了（一九〇九年的說話）；但是我不承認馬克思早在一八五二年所說的話，當無產階級革命對於國家的任務問題擺在我們面前的時候（一九一二年所說的）。

在他同班納科克（Pannekoek）的辯論裏，就把這個問題這樣的提了出來了。

第三節 考茨基和班納科克的辯論

班納科克出來反對考茨基。他是「急進左派」代表者之一，這一派包括盧森堡，拉狄克以及一般贊助「革命策略」的人們，他們一致承認考茨基已走向「中派」的一個方向去，而且毫無原則的在馬克思主義和機會主義之間動搖着了。這個估量，由歐洲大戰證明牠是非常正確。因在大戰期中，妄稱馬克思主義者的「中派」考茨

基主義已經表明牠本身是可憐而無望的了。

班納科克在他論及國家問題的一篇論文——「羣衆行動與革命」（一九二二年「新時代」第三十卷第二號）裏面，斷定考茨基的態度是一個「消極的急進主義者」，是一種「不積極的守株待兔的理論」，又說「考茨基並不願意看見革命的進展」（六一六頁）。這樣的提出問題之後，班納科克就談到了我們所注意的那個問題：即無產階級革命對於國家的任務問題。

他說：「無產階級爭鬥，不祇是單單爲奪取國家政權而反對資產階級的爭鬥，並且還是反對國家政權的爭鬥，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質是在於消滅國家之有組織的權力，並且要用無產階級組織的力量去破壞牠們壓迫的勢力（消融牠們的勢力）……只有在國家組織完全毀滅之後，這爭鬥方能終止。多數人的組織之勝利，只有破壞了少數人的統治組織的勢力才能表現出來」（見五四八頁）。

班納科克未曾把他自己思想表述的方式解釋得很精細，但是他的思想確是表現

得充分的明顯。我們來看考茨基怎樣去反駁他，這倒是一件有趣味的事。

考茨基說：「直到現在，社會民主黨人與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區別，是在前者要奪取政權，而後者却要破壞這個政權。班納科克呢，卻想兩者兼而有之。」（七

二四頁）

假設班納科克的解說欠缺了明晰和具體（他論文中的別種缺點不關乎這一個題目的且不談），那末，考茨基總算把他文中的主要點找住了；可是對於這個主要的原則問題，考茨基完全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而毫不掩飾的投降於機會主義了。他對於社會民主黨和無政府主義者的區別所下的定義是完全錯誤的，而且馬克思主義也終於被他曲解了，被他糟蹋了。

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之間的區別是在這裏：

（1）馬克思主義者的目的是在根本消滅國家；但是他們却承認，只有在社會革命消滅了階級之後，這個目的才可實現；國家死亡是社會主義實現後的結果。無政

第六章 被機會主義者所糟蹋的馬克思主義

府主義者却不同，他們要在二十四點鐘內把國家完全消滅；他們不懂得，惟有在什麼條件之下，這樣的消滅才能實行。

(2) 馬克思主義者承認，一旦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之後，就必須根本破壞舊的國家機關，而代以新的。這個新的機關是仿照巴黎公社規模的武裝工人的組織。

而無政府主義者却不同，他們儘管鼓吹破壞國家機關，但却完全不懂得無產階級應用甚麼去代替牠，也不懂得無產階級該怎樣去施用牠的革命的政權；他們甚至否認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利用國家政權，和建設革命的狄克推多的必要。

(3) 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利用現代的國家來準備無產階級革命，無政府主義者也否認這點。

在這個爭論當中，代表馬克思主義的是班納科克而不是考茨基。因為事實上，馬克思曾經教訓過我們，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不能簡單地把舊的國家機關轉入新主人的手中就算了事；他們應當徹底破壞，消滅那個機關，而換上一個完全新的。

考茨基背叛了馬克思主義，而走向機會主義，因為在他的頭腦中，破壞國家機關這一層是完全沒有影跡的，因為破壞國家機關是機會主義者所討厭的。考茨基這一輩機會主義者因此就為自己開了一條逃路來解釋「奪取」政權與大多數民衆的勝利這一點。

為掩飾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曲解計，考茨基便表示他的淵博，而引用了一段馬克思的話來搪塞。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曾經說過：「國家的手裏應有嚴格的集權」之必要；考茨基就用勝利的口吻問道：難道班納科克要破壞這個「集權主義」麼？這不是別的，不過一套巧妙的幻術而已。這也和伯恩斯坦用聯邦主義來代替集權主義，而把馬克思主義的觀念和普魯東主義的觀念相混合起來一樣。

考茨基引用了這句話，是一點意義也沒有的，新式的國家要集權主義正和舊的一樣；只消工人們自願的把他們武裝勢力集合起來，這就是集權主義。可是牠是建築在集中制政府的工具——軍隊，警察，和官僚——完全破壞的基礎上面的。考茨基

在此地所表現的行爲是騙子式的。關於馬克思和恩格爾斯對巴黎公社最著名的理論，此處他却一點也沒有引用。

考茨基接着又說：『或者班納科克要取消官吏對於國家的職務嗎？但是我
們在我們的黨和職工會的組織內，沒有職員尙且不行，何況國家的行政機關呢？
對於國家官吏，我們在政綱所要求的不是要取消他們，而是應由人民選舉。』

『現在我們所談的並不是關於將來國家所應採取的行政機關的形式問題，而
是關於在我們奪得政權以前（此語係考茨基特別用大寫的），我們的政治爭鬥是
不是要破壞國家的問題。內閣中有那一部及其官吏是應當廢除的？（於是他
列舉教育部，司法部，財政部，陸軍部等等）不，現在的內閣中沒有一部可以
因我們反對政府的政治爭鬥而能取消的，……爲避免誤解計，我再重複申說一遍
：現在所說的不是關於勝利的社會民主黨，對於將來的國家主張採取何種形式的
問題，而是關於我們的反對派怎樣去改變現在的國家的問題。』（七二五頁）

這完全是個騙術。班納科克所提出的是革命問題。在他論文的題目上，以及我們上面所引用他的一段文字當中，都可以明顯地看出這一點來。可是考茨基一跳到了「反對派」的問題止之後，他就由革命的觀點變為機會主義的觀點了。照他的說法，我們現在只應注意到反對派問題，等到奪取了政權以後，我們才能談旁的事。革命消滅了……便是機會主義者所要求的。我們所說的，不是「反對派」問題，也不是普遍的政治爭鬥的問題，而是說的「革命」。所謂「革命」，是在乎無產階級破壞「行政機關」以及整個的國家機關，而用一個新的工人武裝的無產階級政權來代替他。考茨基却表示着他對於行政機關各部的「迷信」，但是試問我們為甚麼不可用那在工人和兵士代表的最高權力委員會監督之下的，各種專門人才的委員會去代替內閣各部呢？

問題的本質，並不在使各部存在，抑或用「專門人才的委員會」，或他種組織來代替；這些可說都是絕不重要的。最緊要的問題，是我們將保存那舊的政府機關呢

第六章 被機會主義者所糟蹋的馬克思主義

（牠與資產階級有無限的聯繫，而且是極端腐敗的守舊的），抑破壞牠而代以新的機關呢？革命的本質並不在新起的階級利用舊的政府機關而施行其統治權，而是在破壞這舊的機關而用新的政府機關去統治一切。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念，而考茨基不是把牠隱藏起來，便是完全沒有去了解牠。

由他對於官吏問題的見解，又顯明地證實了他並不懂得巴黎公社的教訓和馬克思的理論。「即在我們的黨和職工會的組織內尚且沒有職員都不行……」

在資本主義之下，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之下，我們沒有官吏便不行。此時無產階級是被壓迫者，勞動羣衆是被資本主義所奴役。在資本主義之下，德謨克拉西變成了狹窄的，殘缺的，變相的；周圍都是工錢奴隸和一切貧乏困苦的民衆。須知爲什麼我們那些政黨和職工會組織內的職員們都變成廢化（或者說得更正確些，有一種廢化和官僚化的傾向），就是說特權階級的人們脫離了羣衆而高高的矗立於羣衆之上，其唯一的原因，便由於資本主義之下的生活條件使然，這就是官僚主義的來源，在資

本家的財產沒有剝奪掉，和資產階級沒有推倒的時候，多少一點「官僚主義化」的氣味即使在無產階級的職員之中也是不能免的。

從考茨基的說話看來，人們便會想，只要有選舉職員的事實存在，即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還是有官吏存在，而同時官僚主義亦便一樣的存在。這是根本錯誤的。馬克思曾經拿巴黎公社做例子，而明白的指示出來。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工人們的雇員已不是「官僚」，也不是「官吏」了——特別是因為除由人民選舉以外，人民還有隨時的罷免權，而官吏的薪資又與工人平等的，再者，議會的組織又代以實際工作的組織，牠是立法機關，同時又是執行機關。

總之，考茨基攻擊班納科克的一切理論，尤其是他自以為勝利的一點，「即使在我們的黨和職工會的組織內，沒有職員尚且是不行」這一點，完全表現出他把伯恩斯坦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老「論調」來重述一回罷了。伯恩斯坦那部背叛的著作「社會主義的基礎」，是反對「原始的德謨克拉西」，是反對他所謂「學理的德謨克拉西」

反對上司的命令和無報酬的職員，以及無權力的中央代表機關等等。爲了要證明這種「原始的」德謨克拉西的不中用，伯恩斯坦就借威伯（Webb）所解釋的英國職工聯合會的經驗來作基礎。他說在職工聯合會七十年間所謂「充分自由」的發展中（德文版一三七頁）證明了原始德謨克拉西畢竟是無用的，後來遂代以與官僚制度混雜的普通的議會政治了。

其實工聯並不是在「充分自由」的狀況中發展，而是在「整個的資本主義的奴隸制度」中發展的。在這種制度之下，自然對於統治者的欺騙，強權，惡行以及高級行政機關之排斥窮人等等，除了向他們讓步之外，再也沒有旁的辦法。至於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許多「原始的」德謨克拉西的成分是必然要復活起來的。因爲，那時是文明社會歷史裏面，第一次由平民羣衆起來，不但要參加投票和選舉，而且還要獨立地參加國家日常行政機關的各種事務。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一切的人將輪流來管理事務，因此，他們對於誰也不是統治者的這個觀念，就很迅速地成爲習慣。

了。

馬克思用他奇特的批評和分析的天才，看出了巴黎公社的實際行動中有一個革命的「裂痕」，這是機會主義者所害怕的，甚至或由於恐怖，或由於不願意與資產階級堅決地脫離，因此他們便不承認這一點；無政府主義者也一樣，或者由於過急的要求，或者由於對社會大變革的條件缺乏普遍的了解，因此也不願意去觀察這一點。

「我們不應該想去破壞舊的國家機關，因為假使沒有內閣的各部和官吏，我們又怎麼辦呢？」這是滲透了庸俗無識的思想之機會主義者辯論中的說法；他們（亦如俄國少數派和社會革命黨人一樣）不但不相信革命與革命的創造力，而且還抵死地害怕牠。

「我們只應該想到破壞舊的國家機關，而不去搜尋過去無產階級革命的「具體」教訓，而分析「用甚麼」和「怎麼樣」去代替那破壞了的東西」，這是無政府主義者辯論中的說法（當然此處是指一般最好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意見，而不是那些跟着克魯泡特金之流去步資產階級後塵的無政府主義者），所以無政府主義者的策略便變成了失

望的策略；而絕不是無情的，勇敢的來注意革命的具體的任務問題，同時也不顧及羣衆運動的實際條件。

馬克思却教我們要避免這兩種錯誤，他教我們大膽地去徹底破壞那個舊的國家機關，同時却又提出這樣一個具體問題來：巴黎公社在數星期間，已開始創造一個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機關，這就是上面所提到的擴大的德謨克拉西之實現。在這種德謨克拉西制度之下，官僚制度要根本剷除的。讓我們來效法公社先烈的革命勇氣吧！請看一看他們實際應用的方法中，有一個具體而立時可以實現的策略。若能採取這樣的方法前進，我們便能達到使官僚制度完全廢除的目的。

官僚主義是可以廢除的，只消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縮短了工作時間，提高了羣衆的生活程度，而創造了這樣的條件，使民衆的大多數個個都能夠（無例外的）執行『國家的職務』，那末，國家的一切形式就都要完全消滅了。

考茨基又說：

「總同盟罷工的目的，並不在破壞國家，而只是在促成政府對於某種要求條件的讓步，就是在使一個能優待無產階級的政府，去代替那仇視無產階級的政府。……可是無論如何，在無論何種條件之下，牠（無產階級反對仇視政府的勝利）永也不能引起國家的破壞。牠只會引起國家內部勢力的變動。……我們政治鬥爭的目的仍和從前一樣，是要藉在議會裏面獲得大多數的方法來實現奪取政權，並使此種議會，變成政府的統治機關」（七二六，七二七，七三二頁。）這真是最卑劣的機會主義的論調：他們口頭上承認革命，在實際行動上却放棄了革命，考茨基的思想不外乎要一個能優待無產階級的政府，比較一八四七年，當後共產主義宣言宣稱「無產階級組織成爲統治階級」那時候的，那班腐儒俗學們還要得多。

考茨基要與謝得曼，橫列哈諾夫，和萬台威爾各派實現親密的「結合」，他們都

是一致的奮鬥要求獲得一個能優待無產階級的政府的。

但是，我們是要和這班社會主義的叛徒脫離，而進行徹底毀壞舊的國家機關的爭鬥，務使武裝的無產階級本身，變成統治的政府。這是「兩個極大的區別」。同時，考茨基又要同李謙，達微特，樸列哈諾夫，巴脫萊沙夫，采雷太爾和威爾諾夫這般好伙伴們結合，因這班人全是主張「國家內部勢力的變動……獲得議會中的大多數，使議會成爲政府的最高權力」的。他們這樣一種極可寶貴的意見，正是完全適合於機會主義者的；而且完全逃不出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的共和國家的圈子之外。

但是我們要前進，要和這班機會主義者脫離關係，整個的覺悟的無產階級就會同我們一致爭鬥的。這個爭鬥並不是爲着「勢力關係的變動」，而是要推翻資產階級，要破壞資產階級的議會，要建設一個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共和國，或是一個工兵代表蘇維埃的共和國，也就是要建設一個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

在國際社會主義中，還有些比考茨基更右的傾向，例如德國的「社會主義月刊」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派] (李謹，達微特，苛而白 (Kohb) 等，以及瑞典，挪威的斯道寧 (Stanning) 和柏蘭廷 (Brandings) 法國和比利時的耶萊和萬台威爾的信徒，在意大利黨內的右派的代表們和杜拉蒂 (Turati) 和脫萊夫斯 (Trevass) ；在英國有費邊社派和獨立黨人 (名爲獨立工黨，其實是依靠自由派而存在的) ；在別處尚有其他類似的派別。這般先生們在議會裏和黨的出版物上，常有很大的作用——有時竟有統治的作用。他們堅決地否認無產階級專政，而實行他們不掩飾的機會主義的政策。在這般先生們的眼中，無產階級專政是違反德謨克拉西的！他們實在是和小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主義者毫無區別。

我們拿這種情形來加以一番研究之後，就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第二國際極大多數的正式的代表們，首領們，已經完全墮入了機會主義的泥坑中。巴黎公社的經驗，不但被他們忘記，並且被他們改變了。現在正應當給工人們一個活潑的印象，告訴他們：時候已經到了，我們應得破壞舊的國家機關，另用新的來代替牠，使工人

們的政治統治去造成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可是他們——第二國際的先生們——却教導羣衆以相反的理論，並且把『奪取政權』這回事，也滲雜了無數機會主義的見解在裏面。

當那些捲入帝國主義戰鬥的旋風中去的國家，利用擴大的軍備，變成爲吞食千百萬人民生命的大怪物，以解決德國或英國這個或那個財政資本的集團來統治世界的問題的時候，在這個時候，而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和國家的關係問題沉默起來，混淆起來；這自然是一件極關重大的事。

(完)



一九三〇年七月一日再初版

國家與革命 (全二冊)

定價大洋五角

原著者 N. Lenin

翻譯者 中外研究學會

總發行處 中外研究學會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版權所有

1
3
4)